



ISSN 3080-3039

eISSN 3080-3047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Modern Education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主办：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ISSN 3080-3039

01



9 773080 303002



2025

第1卷第2期

2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主管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主办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编辑出版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jyxb@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梅见华

编辑委员会

陈科存	孙文杰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版权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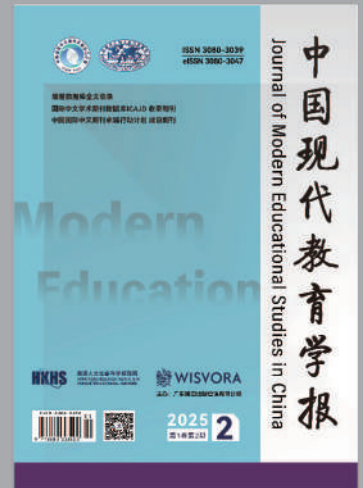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维普数据库
全文收录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
工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出版地: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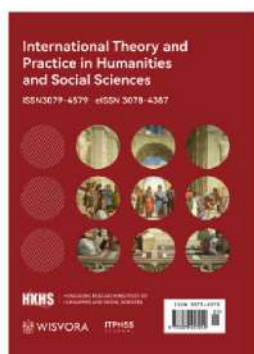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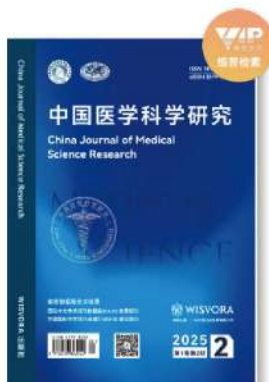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PHSS)



经济与管理学报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中国医学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与技术学报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Insights



Journal of Emerging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Research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中国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中的国际使命论演进和重要内容 - 赵怡婷 ····1-6

智媒时代传媒教育的转型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重构 - 刘骁, 王晨璐 ···· 7-10

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劳动者困境的法治路径探析 - 唐璐琪 ····11-15

高校舞蹈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建构与实践——以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为例 - 史建兴, 杨波 ···16-20

“双融合”视角下现代产业学院与产业研究院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以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平台共
建为路径 - 陈名凯, 邹鸣民 ···· 21-28

高考作文命题趋势的思考 - 翁心妍, 朱悠然, 黄馨澜 ···· 29-36

父母教育水平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基于 CGSS2021 的实证研究 - 于文丽, 牛雨谣, 王一
诺, 葛蒲, 张明晓, 李奇遇 ···· 37-44

以融促荣：青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贵州路径 - 廖家骏 ····45-51

深度学习视域下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研究 - 李薪 ···· 52-56

工作记忆容量、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 - 何承航, 蔡兰珍 ···· 57-64

基于校企合作教育项目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机制研究——以协同发展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实践路径
探索 - 邹鸣民 ···· 65-72

供应链可持续尽职调查——基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供应商年生产能力测算方法 - 马杰 ···73-79

“双能双效”导向的高校双师型教师动态培养机制研究 - 张程 李建峰 张蓉 唐艺文 牟灶燃 ··80-98

“四梁八柱”架构下现代产业学院构建路径研究 ——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导向的实践探索 -
邹鸣民 ···· 99-107

青少年家庭沟通、焦虑情绪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文献综述 - 于文丽, 陈安妮, 葛蒲 ····108-114

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三重逻辑 - 梁涛 ····115-118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WISVORA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学术出版商。我们相信，跨学科前沿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挑战至关重要。WISVORA出版社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将研究见解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有效的策略。

WISVORA 还致力于推动中文学术成果的全球传播，设立多个覆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艺术等领域的中文学术期刊，为中文作者提供更便利、更高效、更专业的发表选择。我们重视学术原创性与表达自由，采用快速审稿、开放获取、普惠版面费机制，努力构建一个包容、多元、国际视野下的中文学术传播平台，助力更多优质中文研究走向世界、服务社会。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10+

我们目前已成功运营10余本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管理、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我们运营的期刊数量

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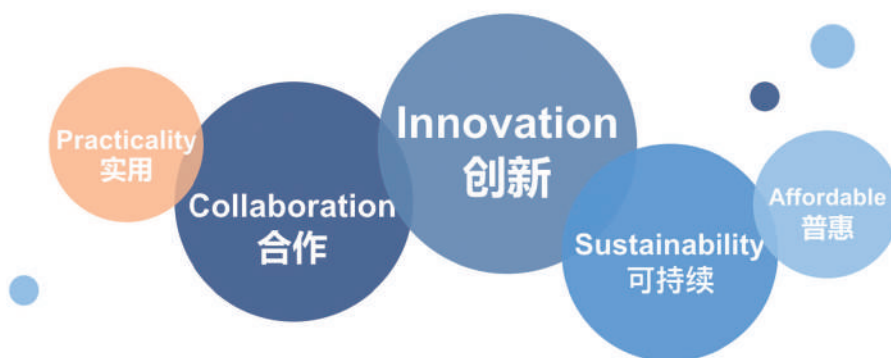
已有来自全球的300多位学者参与我们期刊的编辑、审稿与学术合作

我们的合作学者数量

10000+

我们的作者社群已超过3000人，汇聚青年学者、博士生与研究机构专家

我们的作者社群规模



愿景Vision

我们的愿景是成为全球领先的跨学科出版平台，推动知识创新与实际应用的融合。我们致力于创建一个汇聚全球专业知识的学术网络，促进跨领域的合作与知识共享。通过支持和出版以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研究成果，我们致力于推动政策、产业和社会的积极变革，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技术创新等全球挑战，构建更加繁荣、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

www.wisvora.com

中国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中的国际使命论

演进和重要内容

赵怡婷¹

(广西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 530000)

摘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中的“国际使命论”演进及主要内容。随着国际格局演变与全球性挑战加剧, 中国在全球人权治理中的角色逐渐深化。国际使命论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理论奠基阶段聚焦发展议题的核心地位,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全球治理观; 系统构建阶段通过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实践, 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实践深化阶段则通过参与联合国机制、提出国际倡议等路径, 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人权治理架构。中国主张以公平正义、多边主义与文明互鉴为价值导向,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 中国坚持主权平等原则, 主张人权保障与主权行使的协调统一,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致力于维护国际法治精神。中国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将人权保障与全球治理相结合, 既强调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又倡导通过对话合作解决人权领域分歧。这一理论框架为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 体现了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责任担当。

关键词: 国际使命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权治理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41

一、重要论述中的“国际使命论”的演进及阶段性分析

(一) 演进的国内外驱动力

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对中国和世界的人权事业有着积极的推动和指引作用。该重要论述的形成, 大概分为以下两点:

第一, 国际大环境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 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同。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深陷多重困境, 集中体现为理想目标与现实实践、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国际社会的利益关联与诉求交织日益紧密, 而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跨国性挑战的加剧, 进一步凸显了全球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国际共同体”这个概念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仍然存在争议。也就是说, 中国在现在的国际舞台上无法独善其身。近年来, 主要发达国家政策取向出现显著转变, 保护主义思潮与单边行动倾向日益凸显, 这种趋势对战后建立的国际多边架构产生系统性冲击, 尤其威胁到以联合国框架和 WTO 规则体系为支柱的全球治理秩序, 此类政策转向正在消解经济全球化数十年来的制度性积累, 使国际合作成果面临前所未有的退化风险, 中国作为国际上的发展中大国也被牵涉其中。^[1] 其次, 自二战结束以来, 西方国家主导建立了以西方资本主义为首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 西方国家内部出现资本主义困境, 牵连人权领域的全球治理也出现种种结构性困境。历史经验与现实发展共同揭示, 源于西方文明传统的人权理念体系在应对当代全球人权治理挑战时显现出双重局限性: 既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内在逻辑矛盾又构成了治理困境的深层诱因。这一认知促使国际社会必须探索替代性的人权治理范式。然而值得警惕的是, 某些具有体系性影响力的国家通过“人道主义干预”的正当性叙事和“人权外交”的话语实践, 实质上导致了人权价值的工具化扭曲。在此背景下, 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亟待进行范式革新, 这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世界贡献智慧,

作者简介: 赵怡婷 (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

正本清源。

第二,国内对外需求发生变化。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部战争和地区武装冲突频发,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以及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的威胁,导致全球人权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我国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大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且国家综合实力也不断攀升,在国际舞台上已然成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国,并在国际社会中有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从国际视角来看,现阶段我国在国际人权话语权与主导权方面,还没能达到与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掌控程度。在国际交往中,有关人权话语方面是我国的短板与薄弱部分,这显然与我国目前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国际人权领域各国之间交流互动以及推进全球治理进程中,能否掌握国际人权话语权和主导权,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指标。^[2]近年来,中国持续深化参与国际人权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机制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中国倡导构建一套兼具普适性与包容性的国际人权规则体系,既充分尊重各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又积极倡导人权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治理理念。这种治理创新不仅体现在对现存规则体系的完善建议中,更通过中国自身的人权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范本,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人权规则制定中日益提升的话语权与影响力。^[3]联合国与其人权机构是中国在倡导和阐释国际人权领域共同价值的最重要平台,在联合国的协助下,中国对人权领域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几大价值进行倡导、阐释、支持和维护,并在联合国的多次活动表决内取得显著成效。^[4]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人权领域共同价值的积极倡导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相应和附和,在此基础上,中国对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领域的“国际使命”将会从一而终的进行下去。

(二) 分阶段分析

1. 理论奠基 (2012-201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初步构建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一直处在不确定性中,在大国的干扰之下,战乱从未停止。自21世纪以来,中国洞察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多重困境与挑战,在立足对国际格局深度演变与历史演进规律的精准研判和统筹把握时代脉搏与历史方位的战略维度的基础上,展于2013年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随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迅速成为全球治理中的热词,不断被多国倡导阐释,同时被联合国写入多个决议。

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加快,全球在发展面临诸多困局且问题之间相互交织,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历史节点上,国际社会迫切呼唤国际关系范式的革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方案的关键维度,在于将合作共赢确立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准则,通过有效协调各国发展诉求、创新全球发展机制,最终建构起以互利共生为价值依归的新型国际关系框架。中方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度会议中提出“四个必须坚持”,“四个必须坚持”中提出了解决世界错综复杂问题的应对之策,这既可以视为亚洲国与国之间开展合作交流、解决冲突的基本准则,也展示除了当今世界国家之间本应有的相处之道。同年9月,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本质上是要开辟一条国家之间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博弈的国际发展新路径。这一范式不仅为维系全球战略稳定构筑新型安全框架,更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变革性力量,为国际社会探索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和平发展解决方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提出紧扣促进人类发展这条主脉络,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有效契合了各国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共同期盼。

2. 系统构建 (2018-2021): 全球倡议与全球人权治理的议题拓展

我国在实现全球人权治理的过程中恪守国际法治精神,严格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作。在推进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我国致力于构建更具公平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分享具有东方特色的人权发展经验,更提出了一系列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的解决方案。

在联合国大会多边治理平台,中国持续深化气候治理战略部署:2020-2021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国家主席郑重宣布提升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强化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转型支持、终止境外煤电项目扩建等战略决策;2021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府相继颁布《新发展理念引领双碳工作实施意见》和《2030碳达峰行动规划纲要》,系统构建中长期气候治理框架;2022年5月,《国家气候适应战略2035》正式出台,明确构建“监测预警-生态适应-社会应对-区域协同”^[5]四维治理体系;同年6月发布的《减污降碳协同实施方案》,创新性地提出将协同增效机制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关键路径,并确立其在“1+N”政策体系中的支柱性地位,加强生态环境准入管理、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这体现了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实践内容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积极贡献。

3. 实践深化（2022 以来）：深度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6]中国的三大全球倡议，以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和文明互鉴为三大支柱，为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范式。这一创新性理念将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将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价值相协调，从而为国际人权事业贡献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中国目前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一历史性难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农村地区 9899 万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这一成就意味着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少贫困人口目标。^[7]中国在推进人权事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遵循，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确定了 2021—2025 年我国立足人权保障的现实方位与发展规律，推动人权事业向更高质量、更富内涵的维度跃升，使中国式人权现代化的道路特色更加鲜明。

2023 年，中国正式推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国际主张强调不同文明间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包容互鉴的基本原则。该倡议积极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享价值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格局。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共识，已在多个国际合作文件中得到体现。该倡议不仅被纳入中国与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家的联合声明，还被载入中国同中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性组织的合作宣言及公报之中。这一进程充分展现了该倡议在国际社会获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充分表明中国理念和方案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并不断转化为全球行动。^[8]中国与希腊发起文明古国论坛，并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重要会议，为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更多平台，以及探寻全球性挑战的解决之道，促进各国人文合作。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提升文明交流机制化水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凝聚更强大的文明动力。

2023 年 9 月，中国外交部正式公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系统阐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立场与主张。该文件从国际安全治理、可持续发展推进以及人权保障等关键领域，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政策框架。当前，国际发展格局面临严峻挑战，突出表现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在减贫、粮食保障、基础教育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显著落差。由于国际社会对发展议题的投入远不能满足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不完善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一现状，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的实施，着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国际合作机制。在制度设计层面，中国推动建立了多层次的协调平台与合作框架，为破解全球发展困境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中国持续贡献公共产品：2022 年初，以凝聚国际发展共识为宗旨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组建，该多边合作机制截至 2024 年中期已汇聚 80 余国参与方。同年，中国同步实施两项战略举措：第一，对南南合作援助机制进行战略升级，转型为“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基金”；第二，创新设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构建起支撑倡议落地的“实体化运作平台+资源配置体系”双轨机制。2023 年，在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机制平台上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路径，既确立了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行动纲领，也为国际社会推进文明对话提供了价值坐标。

二、重要论述中的“国际使命论”的主要内容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强调发展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物质文明演进水平从根本上塑造着文明形态的历史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原则，其理论根基深植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这一价值追求为探索物质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性实践遵循。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人才、资本、技术等关键资源通过国际贸易与投资渠道实现全球配置，推动各国经济形成紧密依存的网络。从历史维度考察，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升，资本的内在扩张逻辑导致国际秩序呈现明显失衡。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仅服务于少数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这种结构性失衡使得国际交往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互惠。现代国际关系具有双重属性，可以说既是利益交织的复合体，也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对话协商为基础的伙伴关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期许。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坚持互利共赢原则，通过倡导新型国际关系赢得广泛认同。这种和平发展模式的确立，既体现了东方智慧的时代价值，也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二，在具体实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该理念主张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这种以科技驱动发展的路径选择，为促进国际社会形成发展共同体提

供了重要支撑和实践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指导思想,在国际交往原则层面,主张通过平等对话与协商合作取代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不同文明形态和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当享有同等地位与权利;在实践路径上,倡导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机制。这一理念的先进性不仅彻底否定了基于强权政治的旧秩序,也系统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治理模式。历史经验表明,奉行霸权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仅难以持续,更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深重灾难。当代国际关系应当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各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着对传统国际关系范式的超越。它既承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又强调全球治理的协同性,为破解当前国际秩序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引。这种将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的价值取向,正在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在发展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要义之一,特别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该理念要求各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运行机理,通过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实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生态价值观包含环境可持续性、低碳发展模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这一理念致力于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开创环境友好型发展新范式。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目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生态系统退化、淡水短缺、空气污染等问题持续恶化的多重环境挑战,同时核污染等工业文明衍生的环境灾难频发,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环境。战后全球人口激增与消费主义蔓延,更是进一步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中采取双重标准,通过“碳政治”将本应共同承担的生态责任不合理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种不公正的全球环境治理格局,早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背道而驰。^[9]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来看,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扩张与过度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中国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国际社会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提供了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地球是人类的生存载体,既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物质基础,也需要人类承担起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既是道德层面的必然要求,更是文明延续的客观需要。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超越了传统共同体形态的地域性、排他性特征,构建了一个为全人类谋福祉的新型文明框架。该战略构想了单个国家为本位的思维定式,将人类整体利益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其不仅体现了对全球治理规则的革新理论,更为处理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价值坐标。唯有构建起以清洁美丽、绿色低碳为标准的生态共同体,人类社会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呵护好人类的共同家园,维护和发展好子孙后代的共同利益。

(二) 主权平等与人权发展

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肩负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使命。当前全球人权治理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缺失。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国际人权议题被部分发达国家主导,进而出现将特定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普遍化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某些国家以人权保护为借口实施的单边主义行为,实际上违背了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集体人权原则。这种状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背道而驰。基于此,中国主张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人权治理架构,以确保各国在全球人权事务中享有同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权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逐渐占据核心地位,由此催生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迅速发展成为当代国际法体系中成果最为丰硕的规范分支。随着各类人权公约的签署、专门机构的设立以及监督机制的完善,人权保障的场域已突破国界限制,形成了国内与国际双重保护架构。在此框架下,缔约国必须履行其承担的人权保障义务,这意味着国家主权的行使需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要求。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体系决定了人权保障的主要实施路径:一方面,国际人权法律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与实质内容均源于各国国内法律体系的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另一方面,人权保护的具体落实仍主要依托国家层面的立法与执法机制。有些国家刻意制造人权与主权的二元对立,特别是片面主张“人权优先于主权”理论,不仅在法理层面存在概念混淆,更可能引发严重的实践风险。这一点在“人道主义干预”的争议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这是“人权高于主权”论的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后果,即其他国家可以对侵犯国内人权的行为进行干涉,以保护人权。人道主义干涉在理论上存在其合理部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法律和操作中的难题。首先,在现行法律渊源中,无法为某个国家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找到其合法的依据。在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授权的情况下,相关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明确源自宪章第42条规定,而非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理论。国际社会必须恪守主权平等这一根本原则,确保所有国家都享有自主选择政治体制、管理自然资源以及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可剥夺权利。当前国际实践中存在的将人权问题工具化、采取差别化标准,以及滥用各种手段干预他国内政的做法,实质上违背了人权保障的根本宗旨。任何以保护人权为由的国际行动,都应当在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框架的前提下,充分听取当事国及相关区域组织的立场和诉求。^[10]这一立场论证严密、依据充分,理应作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进程中协调人权保障与主权原则关系的重要准则。

从国际法治的规范框架来看,必须高度警觉某些国家以“普世价值”为名实施的话语霸权行为,这种策略通常包括选择性解读国际关系准则来确立道德优势地位,从而弱化不干涉内政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规范效力。在二战以后,人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从国际法实践来看,随着多边人权公约体系的完善、国际人权组织的设立以及监督机制的运作,人权保障的场域已突破国界限制,形成国内与国际双重保护架构。在此框架下,缔约国有义务履行其承诺的国际人权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的规范性约束。然而,这种约束关系绝不等同于某些国家所鼓吹的“人权凌驾于主权”主张。实际上,在当前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秩序中,国内法律体系仍承担着最主要的人权保障职能,同时国际人权规范的核心要素也源自各国立法实践与司法经验。刻意制造人权与主权的对立,特别是单方面夸大“人权优先”的论调,不仅在法理层面存在概念混淆,更可能造成严重的实践危害,“人道主义干预”的争议性实践即为明证。^[1]理论上来说,人道主义干涉有其合理的部分,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法律上的操作难题,从而导致这类干涉在实践中容易被滥用,沦为某些国家谋取利益的借口和工具。

(三) 公平正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取得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这是我国在人权发展道路上根本自信的来源。我国的人权法治保障事业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法治、实现人权。^[2]换言之,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要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稳步向前推进。

中国向来秉持多边主义立场,全力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威地位。我们恪守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平等协商准则,致力于联合国在维护国际正义、践行法治精神、深化多边协作以及推动务实行动等方面的领导效能。国际舆论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给予了以下积极评价:《秘鲁人报》专栏作家强调,中方长期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各项事业,坚定不移地践行多边主义原则,为巩固联合国权威、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出了卓越贡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分析指出,作为二战后建立的最重要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多边合作框架中占据枢纽地位。中国一如既往地捍卫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架构和基于国际法治的全球秩序,充分发挥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功能,并且通过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实践和倡导多边主义,有效应对本国资源环境挑战,为世界和平提供了坚实保障。^[3]当前保护主义思潮蔓延与单边行动加剧的国际形势,中国正日益成为推动全球协作的中坚力量。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构成维护多边合作体系的两大支柱,这些战略性方案不仅强化了国际社会的团结协作,更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架构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提供了关键支撑。

(四) 多边主义与文明互鉴

近年来,中国在人权保障领域取得的重大进步,与其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尽管当前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仍存在诸多不足,但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体制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仍然一定的积极作用。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国际社会应当继续秉持多边合作原则,在完善现有经贸规则的同时维护全球化发展大势,从而为世界各国人权的普遍实现创造更加坚实的物质条件。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都曾遭受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与掠夺,面临着谋求民族独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似历史使命。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呈现出多极化加速发展、全球化深度调整的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其全球经济占比不断提高,国际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在全球疫情持续影响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复苏进程呈现明显不平衡态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存在进一步加深乃至固化的潜在危机。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迫切渴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资源支持,强烈呼吁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代表权和决策参与度。在这一时间段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将为全球繁荣稳定奠定更为坚实的根基,同时发达国家也将从中获取发展红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在当前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长期掌控着人权理论构建与舆论导向的主动权,这一态势也对各类国际组织的日常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4]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治理智慧必将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1] 毛俊响.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的国际规范扩散[J]. 法学论坛, 2023, 38 (01): 16-26.

[2] 孙平华. 论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9, (03): 125-141+208.

[3] 张新平, 周艺晨.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研究的系统性与学理化展开[J]. 人权, 2024, (02): 1-27.

- [4] 常健, 高洁馨.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J]. 人权法学, 2024, 3 (01): 1-43+159-160.
- [5] 李淑云.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贡献[J]. 当代世界, 2024, (02): 18-25.
- [6] 黎娟.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贡献: 理念与实践[J]. 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 2024, (05): 30-33.
- [7] 孙振民, 孔垂裕. 追求公平正义: 全球治理的中国参与[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 (05): 35-42.
- [8] 吴晓丹, 张伟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学理逻辑与实践发展[J]. 国际问题研究, 2025, (01): 11-27+137-138.
- [9] 陈绍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辩证关系及实践进路[J]. 领导科学, 2025, (02): 5-11.
- [10] 廖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与主权内涵[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58 (06): 25-35+203.
- [11] 廖凡. 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构建[J]. 中国法学, 2018, (05): 41-60.
- [12] 张杰. 习近平加强人权法治保障论述的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 (05): 22-31.
- [13] 温煜明. 国际社会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认知与评析[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24, 26 (03): 15-28.
- [14] 柳华文. 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核心要义——基于习近平关于人权系列论述的解读[J]. 比较法研究, 2022, (04): 1-16.

The Evolution and Key Compon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 Doctrine in China's Discourse on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Zhao Yiting

Guangxi Universi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Nanning 530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volution and core tene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 Doctrine" within China's discourse on respecting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As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evolves and global challenges intensify, China's role in global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has progressively deepene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 Doctrine spans three phases: the theoretical groundwork phase focused on establishing development as central while advocating a global governance philosophy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shared benefits, and shared governance"; the systematic structuring phase advanced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rough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actices; and the practical deepening phase promoted establishing a more just and equitabl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UN mechanisms and proposing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China champions values of fairness, justice, multilateralism,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propos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DI),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SI), and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GCI) to foster collectiv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public health crises. In reform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 equality, advocates harmoniz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ith sovereign state practice, opposes politicization and instrument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commits to upholding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hrough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 integrate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ith global governance, emphasizing both nations' right to independently choose development paths and resolving human rights divergences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improving the global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system, demonstrating China's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Keywords: International Mission Doctr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智媒时代传媒教育的转型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重构

刘骁¹ 王晨璐¹

(¹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在 AI 技术迅猛发展与国家战略推动的背景下, 传媒教育正经历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本文聚焦 AI 技术赋能传媒教育的转型逻辑与实践路径, 分析政策导向与产业需求驱动下的专业结构调整, 探讨跨学科培养对人才升级与文化深挖的双重价值。提出传媒教育应在师资优化、产教融合与专业转型中平衡技术工具理性与文化价值理性, 培养兼具技术能力与文化底气的复合型人才, 助力文化遗产与国际传播能力提升。

关键词: 传媒教育; 智能化转型; 文化自信; 跨学科培养; AIGC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5 年贵州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跨文化语境下乡村品牌符号再生研究——构建“非遗智媒化”出海传播模型》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 10.70693/jyxb.v1i2.42

AIGC 自诞生以来, 以迅猛之势融入各领域。最初, 其技术尚不成熟, 应用场景有限, 仅在少数领域初步探索。随着技术进步与算法优化, AIGC 技术实现跨步发展, 正处于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的阶段, 在文本创作、内容生产等方面展现巨大潜力, 逐步适用于生活中各种场景, 呈现出从服务于专用领域和专业人士向通用领域和普通受众跃升的特征,^[1]为社会发展带来革命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总书记指出: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2]《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及《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条文相继出台, 为 AI 产业发展铸牢根基, 明确其发展边界,^[3]更体现其广阔发展前景。此背景下, AIGC 作为内容生产新力量, 肩负重要使命, 更应响应国家号召, 遵循绿色发展理念, 以高效生产模式、优质内容创作赋能我国传媒教育, 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传媒行业主要指通过提供影视传媒产品及服务, 并以此来创造经济价值的相关企业总和。^[4]传媒专业与现代信息技术交叉融合, 涵盖新闻、传播、广告等方向, 旨在通过系统专业学习,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职业素养和健全人格, 并掌握传播学、新闻学、网络传播学、新媒体传播等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因此传媒教育要立足应用型人才培养高度, 通过产学研结合与技术赋能方式, 瞄准产业、立足融合、分类探索、突出应用, 深化人才培养改革模式, 把产教融合与技术创新融入人才培养过程。2025 年 4 月 22 日,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 年)》, 增列 29 种新专业。^[5]其中, 智能影像艺术、数字戏剧等专业与传媒教育高度关联, 进一步强化专业设置对国家战略急需的快速响应, 凸显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趋势。在传媒行业加速变革的背景下, 新媒体迭代、数字内容生产持续创新, 迫切需要具有数字技术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此外, 全国多所院校陆续撤销广告学、服装设计等传统专业, 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满足行业转型的要求。为满足行业快速发展、人才需求持续变化的需要, 我国传媒教育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科改革道路, 促进传媒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一、时代之变: 传媒教育转型的政策逻辑与产业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创新”, 其教育与文化思想为高等教育专业改革提供了指导方

作者简介: 刘 骁(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艺术学;

王晨璐(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

通信作者: 刘骁

向。^[6]传媒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使命。这便要求高校在传媒教育专业调整时,不能仅着眼于文化素养培养,更要鼓励学生运用现代传媒技术进行创新表达。以传媒教育为例,过去注重采编播技能训练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要求。当前专业调整中增设的智能影像艺术、数字戏剧等专业,实质是将总书记的论述转化为育人实践,培养既懂行业底层逻辑又具备数字素养的新时代传媒人。

教育部近三年专业调整呈现“加减辩证法”特征。一方面,倡导高校开设新兴交叉学科专业,新增智慧应急、虚拟空间艺术、数字演艺设计等前沿领域专业。另一方面,近三年全国高校已撤销超 2000 个本科专业点,其中艺术类、管理类占比较高。2024 年至 2025 年撤销规模最大的 10 个本科专业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近百所高校撤销居首,产品设计与广告学等艺术专业及网络工程等工科专业均列前十。^[7]这种专业结构性调整背后,是产业需求导向的政策逻辑。在传媒行业,数字媒体工程师、AI 内容生成工程师等新岗位逐渐兴起,高校纷纷增设数字媒体技术、智能媒体技术等专业,也是为这些新兴产业培养专门人才。

二、融合之效:跨学科培养与技术创新的价值彰显

当今时代,学科间的边界逐渐模糊,体现产业跨界发展趋势。传媒作为新时代技术驱动的特色行业更是如此,单一学科背景的人才,已难以满足传媒行业日益多元化需求。因此,跨学科联合培养在传媒教育中势在必行。以教育部新增的智能视听工程专业为例,它涉及人工智能、艺术设计等多学科知识,以“智能技术+视听网络”为双核驱动力,通过跨学科学习,培养适应未来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全能应用型人才。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技术与数字霸权为我国带来严峻挑战。部分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和信息垄断,试图在国际舆论场中压制我国的声音,以削弱我国的文化影响力。^[8]面对这种传播失语的困境,我国急需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新发展格局。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场所,^[9]应通过优化传媒专业设置,培育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传媒人才,提升我国传媒行业的技术竞争力,在国际舆论场中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而摆脱外部霸权的桎梏,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以新增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为例,该专业打破传统艺术专业与理工科专业壁垒,构建起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聚焦于智能影像技术的核心内容,让学生具备扎实的影像艺术创作功底,满足影视行业对虚拟数字人制作、智能特效合成人才需求,游戏行业对高质量虚拟场景、智能交互剧情设计人才需求。长此以往,会减少我国传媒行业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提升行业技术竞争力。

我国产业结构正经历从传统密集型向数字智能型的深刻转变。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传媒产业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消费模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直播带货、虚拟偶像等新业态层出不穷,传统传媒产业格局被打破,新产业生态正在形成。高校通过增设新兴专业,如数字媒体技术、智能媒体技术、新媒体艺术等,为传媒产业的新兴领域培养专门人才,满足产业对新技术、新内容创作人才的需求,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教育与产业同频共振,助力传媒产业实现从传统向数字智能转型升级。同时,淘汰那些滞后于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够引导人才培养方向的调整,将教育资源集中到更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专业上,为传媒产业升级提供强大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三、隐忧之现:文化自信与技术教育的融合重构

在 AI 技术赋能传媒教育的过程中,尽管技术应用会提升工作效率、带来大量信息,但也会带来相应伦理问题,部分工作者被技术所裹挟,逐渐丧失自身思考,一味沉迷于技术虚构带来的便捷与环境中,文化根基弱化问题逐渐凸显。^[10]这既反映出传媒教育工作者对传统文化挖掘不够,难以将中华文化精髓融入 AI 教学。也暴露部分院校过度追求技术效率,忽视文化育人的初衷。这种倾向不仅导致传媒教育内容陷入同质、浅薄困境,消解传媒教育文化育人特色,更使学生在技术学习中逐渐弱化对本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难以形成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的思想。进而制约传媒教育培养技术过硬、文化自信的复合型人才,更会影响未来传媒从业者的文化传播能力,对我国传媒领域的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能力形成潜在阻滞。

面对 AI 技术应用时可能出现的文化根基弱化问题,在传媒教育中筑牢文化自信防线已成为当务之急。首先,需加强传媒专业教师的人文素质培养,通过对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系统性案例研究,提高其在教学设计中融入文化内涵的能力,促使他们主动担负起传授技能与传承文化的教育任务。其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媒体教育资源建设,通过对传统媒体典型案例、本土文化传播实践等资源数字化梳理和 AI 适配,提升智能教育系统对文献资料检索与整合运用深度。最后,推动 AI 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媒教育各环节的深度融合,在课程设计中明确文化导向,引导学生在技术实践中学会用数字化手段创新文化表达。同时,培养师生辩证看待外来传媒技术与文化的理性态度,吸取先进科技成果的同时,要坚持中

华文化立场,使数字技术真正发挥对本土文化传承和传播作用,为培养既有科技实力又有文化自信的传媒人才铸牢坚实基础。

四、破局之道:文化扎根与教育革新的实践探索

第一,教师是教育的中坚力量,其数字技术与职业素养的高低,会对人才培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为此,迫切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师资结构。师资队伍优化可从培养师资和引进人才两个维度进行。一方面,学校可以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培训为代表的各类培训活动,通过不断学习,让教师及时掌握新兴智能技术和数字能力,不断更新自身知识,将所学知识融入教学活动。同时,可以借助政策红利,吸引具有丰富行业经验和背景的专业人才加入教师队伍。他们既能将最新的学术思想带给学生,又能指导学生开展项目实践,培养兼备理论与实践的传媒人才,适应社会所需、市场所需、时代所需。

第二,我国作为科技大国,拥有天然的数据资源与技术平台,如何把这种优势转换成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成效,是提升教育效果是关键。可通过聘请专家授课,搭建校企合作平台等方式,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教学效果。一方面,邀请资深专家分享行业实战经验,讲解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便捷任务推进,用理论助力实践。这将使学生学习更具针对性,提升教学实践水平和实际操作性。另一方面,通过打造校企合作平台,为学生和教师提供项目参与机会,教师以课题或项目为纽带,带领学生参与行业前沿项目,让他们在实践中检验所学成果,打破理论与实践壁垒,使人才培养紧密贴合社会、市场和时代脉搏。

第三,在教育部专业调整背景下,专业发展应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探索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路径。若专业发展仍因循守旧,培养出的学生常是没有思辨能力的学习机器,难以适应行业变化。以新增的数字戏剧、数字演艺设计、智能影像艺术等专业为例,它们紧贴时代需求,为学生提供前沿知识与技能,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因此,各专业只有顺应数字化、智能化趋势,调整课程体系,引入相关前沿课程,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才能为学生创造更好的职业前景,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

教育部专业调整对传媒专业发展提供启示,体现出专业教育唯有紧跟政策号召与时代需求才能塑造全面人才。但培养过程中,要警惕技术至上主义。传媒教育不只是纯粹技术学习,更是正确价值观、世界观与道德观的塑造沃土,应持续在“四化”上下功夫、求实效,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未来已来,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新风险或许还会出现,但只要持续秉持科学与法治协同发展的理念,不断优化监管机制,AIGC必将在规范中蓬勃发展。有望产生更多创新应用方式,推动教育行业革新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自信增强,开拓我国数字时代发展新局面,在全球竞争里抢占先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参考文献:

- [1] 柴剑平,李芙蓉.传媒高等教育因人工智能而强:趋势、策略与路径[J].现代出版,2024,(07):1-8.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EB/OL].(2019-03-20)[2025-07-01].https://www.cac.gov.cn/2019-03/20/c_1124259365.htm?from=singlemessage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EB/OL].(2023-07-10)[2025-07-02].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1752.htm
- [4] 梁茂龙.影视传媒行业审计风险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22.
- [5] 中国教育网.2025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发布![EB/OL].(2025-04-22)[2025-07-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1752.htm
- [6] 央广网.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EB/OL].(2025-05-31)[2025-07-08].https://news.cnr.cn/native/gd/sz/20250531/t20250531_527191528.shtml
- [7] 中国教育网.这些专业,正在“消失”[EB/OL].(2024-07-22)[2025-07-06].https://www.eol.cn/news/guancha/202407/t20240722_2625290.shtml
- [8] 郑亮,周竹青.构筑基于中国国情的国际传播教育[J].青年记者,2021,(11):71-73.
- [9] 刘微微.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23.
- [10] 朱志勇,许心怡,严清颢,马雅楠.“赋能”抑或“全能”:关于“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政策的技术观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5,45(09):62-69.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practical path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media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Smart media

LIU Xiao¹, WANG Chenlu¹

¹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China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and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 media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an intellig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AI technology empowering media education, analyzes the professional structure adjustment driven by policy guidance and industrial demand, and explores the dual value of interdisciplinary cultivation for talent upgrading and cultural in-depth explor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media education should balance the rationality of technical tools and cultural values in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staf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ecialties,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with both technical capabilitie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Keywords:Media education;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interdisciplinary cultivation; AIGC

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劳动者困境的法治路径探析

唐璐琪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30)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了劳动力市场,由此引发税收失衡与保障缺位。技术替代导致传统劳动所得税基萎缩,失业保险因覆盖不足难以保障劳动者权益,因此需要构建新型税制与保障体系。全球治理探索表明通过创设机器人税等新型税种,对失业保险进行多元化改革,能够协同提升治理效能。税收调节、法律革新与社会保障的同步联动最终实现技术红利共享,促进劳动力市场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劳动保障;机器人税;失业保险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43

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升级,人工智能便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产物。^[1]随着大数据、互联网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渗入各个领域,劳动力市场亦不例外。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决策与自动化生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催生了规模空前的“技术性失业”浪潮。麦肯锡研究显示,到2030年全球约8亿个岗位可能被自动化取代,其中制造业、基础服务业及部分高阶白领岗位首当其冲。这种替代效应会引发税收体系失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真空。企业通过“机器换人”降低人力成本,却使以劳动所得税为核心的传统税基大幅缩水,资本在技术红利分配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劳动法律政策不适用、劳动矛盾纠纷处理难度增大等众多难题。面对社会分配失衡、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和法律政策滞后的多重挑战,如何重构税收制度与创新保障制度,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

一、人工智能重构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

(一) 就业和分配的失衡

人工智能全方位应用在各个领域,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同时带动了“无人经济”的发展。^[2]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企业生产模式向资本密集型转型,引发技术红利分配机制的深层变革。在这一进程中,企业通过自动化投资实现生产效率提升,而劳动力在价值分配中的话语权呈现弱化趋势。这种分配失衡催生出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差异,高技能劳动者因适配技术进步获得更多职业发展机遇,而低技能群体则面临就业岗位降级或职业转型困境,进而加剧收入的结构性差异。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重塑遵循技术替代的内在逻辑,即标准化、规则化任务的自动化边界持续拓展,传统低技能岗位因自动化替代而逐步缩减,智能制造、数字服务等领域催生出对复合型技能的需求,高技能岗位的市场供给缺口持续扩大。

除了对劳动者的冲击之外,人工智能亦对政府的财政能力产生负面效应。实际上,原先在传统劳动力基础之上建立的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将会在“机器换人”浪潮席卷之后失效。^[3]机器不需要纳税,这对政府税收来说是不小的损失,势必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同时,政府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须为被“机器换人”淘汰下来的失业者负责。为了保障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和其他社会福利,政府又必须增加财政支出。只减不增的收入和只会增不会减的支出,增加了财政稳健运行的安全隐患,极易造成租税国危机。一旦政府没有可靠稳定的税收来源,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将随之迸发。^[4]

(二) 法规和制度的滞后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推动了算法经济这一具有兼容性、开放性、市场灵活性、产业融合性的新型经济形态迅速占领了各行各业。^[5]工业时代确立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在人工智能环境下面临适用性挑战,算法控制的隐蔽化使得传统“从属性”认定要素的判断难度加大,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身份界定陷入去劳动关系化争议。远程劳动场景下的工时核算、自动化设备故障的责任归属等问题,暴露出既有劳动法律体系在调整新型劳动关系时的制度空白。

作者简介:唐璐琪(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

通讯作者:唐璐琪

在责任认定层面,人工智能系统的技术主体性尚未得到法律明确界定,导致因设备故障引发的劳动事故在责任划分时面临法理困境。

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要素重构对传统税制形成系统性冲击,劳动所得税基因人力要素的技术替代而呈现萎缩趋势,资本要素的税收贡献未能有效填补这一缺口,导致税收体系在技术变革中出现结构性失衡。从企业所得税看,自动化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保障目标的脱节,加剧了税基侵蚀效应。在流转税领域,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变动引发社会消费能力的连锁反应,间接影响税收体系的稳定性。税制设计的滞后性还体现在对新型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不足,平台经济中劳动者收入的税目归类争议、跨国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利润转移等问题,暴露出既有税制在应对技术变革时的规则漏洞,税收正义目标的实现面临制度性障碍。

二、全球治理经验与政策实验

面对人工智能重构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各国纷纷探索新的政策路径,以适应数字经济崛起、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引发的就业结构变动等新趋势。其中,税制重构与保障制度创新成为应对经济社会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

(一) 人工智能税收的全球探索

有观点指出,既然机器人是替代工人在企业内劳作,那么在工人劳动力基础之上所征得的税费,也理应对机器人征收。于是,作为一种化解人工智能冲击就业的时兴策略,“人工智能税”横空出世。而狭义上的人工智能税,也即直接征税模式专指国家根据税法规定,对人工智能设备的生产商、销售商和使用者等征收的一项具体明确的税种,如财产税、所得税等。

这一举措旨在确保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的企业,能够为国家财政做出相应贡献。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企业利用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多利润的同时,消耗了社会的公共资源,如技术研发环境、基础设施等。征收特别税,是对这种资源占用的一种经济补偿,有助于平衡不同产业间的税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在科技腹地硅谷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韩裔议员简·曾发起设立了一个“未来工作基金”,探索对整个加州的机器人征税的可能性,所征得税金将用于人类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和社区大学助学金等。^[6]她认为旧金山针对服务机器人征收税费,采取按台计征的方式,每月每台机器人需缴纳 200 至 500 美元不等,该税收定向用于职业培训,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

广义上的人工智能税泛指为应对自动化设备的负面冲击而采取的与税收有关的诸多措施,例如 2017 年韩国减免了自动化机器投资的税收优惠,^[7]给予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不施行或少实行有引导性的偏向政策,是一种间接调控模式。算法平台在数字经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凭借独特的算法技术,吸引大量用户,获取高额收入。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算法平台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自身技术创新,还得益于庞大的社会用户群体以及社会提供的网络环境等公共资源。对其征税用于社会福利,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曾提议科技公司应与用户分享部分利润,纽森提出一项“数据红利”计划,让消费者分享该州大型科技公司依靠用户数据创造的巨额利润。这种间接调整的制度,避免了直接税收带来的税收制度大幅调整的经济动荡,平稳地体现了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防止科技企业利润过度集中。也可以为因科技进步导致失业的工人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增强社会应对产业变革的韧性,保障社会民生。

(二) 失业保障制度的创新路径

在社会向人工智能时代迈进的过程中,失业保险制度要切实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要求,减少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对就业造成的冲击。^[8]在数字化和自动化浪潮下重构劳动力结构的当下,失业现象已经开始大量发生。失业保险制度作为在失业者失去收入来源的困难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能够给予基本生活保障,维持其生活水平不至于大幅下降,体现了社会对劳动者的关怀。中国在保障制度创新方面积极开展试点,针对新业态职业伤害提供劳动保障,如外卖骑手工伤保险试点,促进新业态的健康、稳定发展,体现了中国在社会保障领域对新兴职业群体的关注与制度完善。同时,德国二元制培训模式也是对失业保险制度的创新性探究。二元制培训注重实践与理论结合,学员在企业实践与职业学校学习交替进行,培养出的人才能够快速适应企业需求。通过这种方式,激励失业者参加再就业培训,提升自身技能,更好地融入新的就业岗位,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与提升,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我国制度构建的现存困境

(一) 机器人税的法理基础与实施困境

我国开征人工智能税面临的首要障碍在于法理基础的缺失,对人工智能税的研究起步较晚,学术方面的讨论十分匮乏,相关政策的出台量也屈指可数,这样的知识储备量和政策丰富度不足以支持我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税制设计。^[9]现行法律体系尚未赋予人工智能独立的主体资格。人工智能设备作为人类创造物,其法律属性仍被严格限定为客体范畴,不具备纳税主体地位。若强行征税,实质是对生产者、使用者或所有者课税,这将引发税种性质混淆。税收公平原则要求对资本利得进行再分配,但现行税法缺乏将人工智能税明确定性为资本税的法律依据。此外,国际税收竞争压力进一步制约政策落地。韩国减免自动化税收优惠的案例表明,单边征税可能引发产业外流,抑制本土技术创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高端制造业基础薄弱,若贸然课税可能重演英国《红旗法案》阻碍技术发展的历史教训。更复杂的是,人工智能定义尚未形成立法共识。现有概念多基于技术功能描述,缺乏针对税收目的的法律界定,导致征税范围模糊。这种法理与实践的双重困境,使得机器人税短期内难以纳入我国税制框架。

(二) 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的结构性缺失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全面改革时期,新的用工制度使劳动者流动起来,失业保险制度应运而生。^[10]自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已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部分规定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现行制度以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将灵活就业群体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新业态劳动者频繁流转于就业市场,其非固定化、临时化的工作特征与传统“职工”身份认定标准严重错配。随着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灵活就业群体不断扩大,他们往往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难以参加失业保险。而这正是失业风险较高的群体。^[11]当人工智能替代低技能岗位时,网约配送、自由职业等高风险群体恰恰最需要保障,却因缺乏用人单位缴费主体而无法参保。与此同时,失业保险基金依赖劳动者与企业的双边缴费,但人工智能设备无需缴纳社保费用,导致“机器换人”后基金收入锐减。失业人数激增加剧基金收支失衡,这种覆盖缺失与财务可持续性危机,暴露了现行制度难以适应技术革命下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的根本矛盾。现行失业保险制度在应对人工智能失业潮时表现出功能僵化,领取条件设定存在严重时代错位。基金用于职业培训的投入严重不足,人社部数据显示促进就业支出占比偏低,短期碎片化培训无法满足智能制造对数字技能的系统性要求。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制度目标失衡。失业保险本应通过技能重塑助力劳动力市场转型,但现行框架仍以生活保障为单一核心。当人工智能推动岗位从体力劳动向认知分析领域迁移时,劳动者因缺乏深度学习、人机协作等新技能培训而被永久排斥在就业市场外。这种待遇发放与能力建设的双重失灵,使失业保险难以承担技术性失业的缓冲器功能。

(三) 政策协同缺位下的制度创新困境

构建适应性制度体系面临系统性政策协同缺失。机器人税与失业保险作为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工具本应互补,但我国缺乏统筹设计。对人工智能设备使用者征税可补充失业保险基金,但税收立法滞后使该路径悬置。姜美琦提出的差异化费率方案虽具前瞻性,却因缺乏精算基础和数据支撑难以实施。更深层的矛盾在于部门职能割裂。税收政策由财税部门主导,而失业保险改革属人社部门职能,跨部门协调机制缺失导致政策碎片化。韩国通过税收优惠调整间接实现机器人征税的经验显示政策协同必要性,但我国税收激励与社保改革尚未形成联动。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与劳动保障政策亦存在目标冲突。国家为抢占技术高地大力补贴智能制造企业,此举客观上加速机器替代人工,与保障就业的社保目标背道而驰。这种缺乏顶层设计的制度困局,凸显我国在技术革命与社会政策协同演进中的治理能力短板。

四、新型制度的构建方案

(一) 构建全周期新型税收体系

短期试点期实行场景化定向征税,率先开展工业机器人专项税与数据采集临时税试点,工业机器人专项税按机器人运行时间、产量征税,机器人的使用成本由机器人使用的工业企业自行承担。设定梯度性累进税率倒逼企业考量技术替代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用以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促进企业不断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形成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就业稳定的新平衡,保护了数字时代下的就业安全。对依靠数据拓展市场的新兴社交平台类企业按企业使用及新增数据量以及数据的安全等级,划分为不同层级,对数据进行分类征税,促使企业构建符合要求的数据采集。税务资金用于支持数据安全技术的研发及监管系统的建设,为数字经济时代筑起数据隐私防护防火墙。中期深化阶段完善复合型累进税制,技术替代累进税率、数据价值累进税率和跨境数据流通过程中各国征税模式。量化企业技术替代率和数据价值高低两种类型税基指标,针对重技术替代、强数据垄断型企业征收高累进税率,调节这些企业所拥有的巨大垄断性超额利润,发挥征税利导作用,促使其在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过程中

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针对跨境数据流动税,在跨国企业开展数据跨境传输方面按数据流量和商业价值缴税,通过税制确保各国获取合理经济利益。长期拓展期要探索建立全球协同的税收机制,建立基于国际数字服务统一条款和技术创新及就业保护基金,以国际数字服务统一条款打破传统的税收规则,构建立足全球的数字服务企业收入统一流转与分配体系,根据各国业务体量、用户活跃度分配税收收入,消除跨国数字企业借税收差额避税的行为,重新构建起公平公正的国际税收秩序,促使全球各国顺应创新大潮促使新技术迎来广阔应用场景,为世界繁荣发展注入动力,让技术的进步更好地造福于人类,达成技术进步和社会公平互促共进。

(二) 架构多元化失业保障制度

在人工智能深刻改变就业结构形势下,传统失业保险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在改革失业保险的同时应注重建立新型失业保险。^[12]通过企业所得税附加费制度使企业的自动化投资计入征税基数,并使其对技术升级的外溢成本实现内化,由经济杠杆撬动企业实现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承担稳定就业的社会责任。体现政府承担社会保障主体责任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借助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制度安排,将更多公共财政资金投入失业保险,以具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为失业保障提供稳定的经费来源,并用有针对性的就业扶持政策完善配套措施,与经济相互并发展。给付规则按照积极福利理论制定,既包括生活保障又包括就业激励。按照梯度化替代率给付失业救济金。根据失业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保障标准,在失业初期,给予相对较高水平的救济,能够适当减轻失业者由于失去经济来源而导致的生活压力,同时避免过高水平的救济造成失业者依赖性增长。由于失业周期延长,逐步调低替代率,发挥经济激励作用,使失业者积极投身于劳动力市场之中。这样一种动态调整机制造成了社会保障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同时,还避免了福利陷阱,从而实现保障的效率与激励的效果两者的有机结合。通过制度的作用引导劳动者进行技能投资,使之更加精准地对接劳动力供给侧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侧,进而推进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技能就业新能力体系。利用数字智能技术改造失业保险业务流程的信任机制,确保了整个就业信息从产生到使用的过程都处在全程可溯并且自动执行的状态之下,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了管理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建立 AI 就业动态监测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方法建立就业市场风险实时感知、智能响应机制。基于数据驱动的政策调整方案能够使得失业保险制度由被动变为提前预警,更能提高失业保险制度的灵活性和持久性。

(三) 制度与技术协同升级

在人工智能深度重塑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建立国际合作协同共治框架,实现技术创新和社会公平发展动态平衡。平台经济下灵活就业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法条层面的保障是因为相关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并且多数规定缺乏统一立法。可以在立法层面将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者纳入劳动基准法保护对象范围。在税法领域增加技术进步就业补偿条款,要求企业在引入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岗位替代申报,并在技术使用过程中确定该技术的应用对就业带来的影响以及人员的安排方案,并由税务机关依据上述情况衡量企业对于税收负担的责任,确定企业对于就业补偿的义务,以此来达到使企业在实现技术进步时就应当自行进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根据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分阶模式,在人工智能替代就业的确定程度上对企业分阶征税,能够促进企业针对研发应用中对就业带来的影响进行充分考量。区块链和大数据共同发力、对税收治理模式进行重构,确保税收数据真实、不可篡改,大数据助力税款收缴安排精准化、使用过程全链条化和跟踪动态化,借助搭建的税收数据监控平台来加强对税收治理过程的监督并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税收治理透明度和公信力。以国际协作深化为要旨深入推进国际涉税规则合作,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跟踪标准、税收征管规则,实现各国税务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协同互助、堵漏增收,提升全球纳税能力水平,修补各国税收秩序漏洞。加强各国税收合作力度,统一技术性失业统计标准、税收分配规则,加速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匹配速度,在促进技术红利共享的同时增进社会韧性,助推包容性的数字文明建设。

结语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就是技术范式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博弈。解决好人工智能引发的税收下降与失业保障问题需要建立技术创新、分配正义和制度适配的协同演进机制。运用税收改革、法律创新和社会保障创新等一系列联动方式,使技术红利从过去的资本独自享有变成如今的社会共享,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持续进步。

参考文献:

- [1] 马奔,叶紫蒙,杨悦兮.中国式现代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 风险和应对[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1):12.
- [2] 姜美琦.人工智能背景下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4(16):153.
- [3] 杨萌萌.“机器换人”背景下人工智能税的困境与出路[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24(04):124.
- [4] 王婷婷,刘奇超.机器人税的法律问题:理论争鸣与发展趋势[J].国际税收,2018(03):30.
- [5] 王文珍,李文静.平台经济发展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J].中国劳动,2017(01):5.
- [6] 凤凰网.向机器人征税!盖茨的提议是公平还是倒退[N].第一财经日报,2017-08-13(001).
- [7] 张肇廷.对 AI 机器人税的质疑[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70.
- [8] 高和荣.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保障:新挑战与新路径[J].社会保障评论,2021,5(03):3.
- [9] 朱力,夏恩君.机器人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时代的税收挑战[J].未来与发展,2022(04):40.
- [10]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349-350.
- [11] 巩春秋.关于失业保险制度功能转型问题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4(11):82.
- [12] 王文珍,黄昆.劳动基准立法面临的任务和对策[J].中国劳动,2012(05):9.

Analysis of the Legal Path to Address the Dilemma of Workers Repl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ang Luqi

North Minzu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reshaped the labor market, leading to tax imbalance and the absence of protection. The replacement of traditional labor by technology has shrunk the tax base for labor incom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due to insufficient coverage, fails to adequately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new tax system and protection system. Global governance explorations indicate that creating new tax types such as robot taxes and diversifying unemployment insurance reforms can enhance governance efficiency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The synchronous interaction of tax regulation, leg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sharing of technological dividends and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 Protection; Robot Tax; Unemployment Insurance

高校舞蹈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建构与实践——以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为例

史建兴¹ 杨波²

(¹ 包头师范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² 贵州工贸职业学院, 贵州 毕节 553100)

摘 要: 国家对“课程思政”在新时代教育中做出了明确要求, 在整个教育教学全过程中要真正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目前我国舞蹈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仍存在着思政教育和教学内容相脱离的情况, 在教学方式上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单一性, 在学生的课程评价体系上仍没有相应的课程评价机制。在此背景下, 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根据实际状况, 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行动研究法的方法, 从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内容重组、教学方法革新和评价体系完善四个角度展开, 以挖掘舞蹈专业课思政资源点为突破口, 确定了“专业+思政”的二维教学目标, 基于课程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反思, 制定了动态化、过程化的课程评价机制, 实现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效应。

关键词: 高校舞蹈专业; 课程思政; 体系与实践;

基金项目: 内蒙古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课题: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内蒙古高校舞蹈教育路径研究 (编号: NGJGH2023316)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44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 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全中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纲要》明确要求“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这都指明了, 当前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做好统筹谋划、整体设计、全面建设的全局性工作。课程思政建设要求深入挖掘各门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 释放包括思政课程在内的所有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 其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最终目标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路径是构建各门课程协同育人的课程教育体系, 重要基础是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健全评价激励机制和加强组织实施保障^[3]。

当前, 高校思政课程体系的构建着重于课程群的改革创新与实践教学的深入实施。在探讨舞蹈这一非语言文字特定文化层次的形态及其文化特性时, 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语言文字作为表达工具。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舞蹈本身并不属于语言文字的范畴, 但它却具备了与语言文字相类似的交际功能, 即能够承载并传播文化, 对于文化的保存与传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舞蹈课程的优势在于能够更为直接地挖掘并展现人性中的“真、善、美”等思政教育元素。将思政教育注入于“无形”,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舞蹈课程教学的改革实践过程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过程, 是引领学生感悟人类共同情感, 弘扬人生价值的实践过程。纵观近年来课程思政的许多研究成果, 其中多是宏观提出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区别, 或者多为针对某一门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改革, 近年有学者不但关注显性成果, 更重视育人过程实效及价值观内化程度^[4]对教学团队建设进行了分析; 也有学者从教师提升, 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强大动力^[5]提出建议; 还有学者在“五育并举”背景下, 深入探讨大中小学体美融合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育、美育融合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6]。这类研究成果将对本研究产生重要的借鉴作用。但从文化自信、民族团结、课程思政等多角度理论深处, 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舞蹈专业思政育人体系构建的研究尚属空白。

一、高校舞蹈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 史建兴(1981—), 男, 教授, 研究方向为舞蹈人类学、舞蹈教育学;

杨波(1994—),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舞蹈人类学、舞蹈教育学;

通信作者: 史建兴

1.1 课程思政的内涵与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建立了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校园思政到社会课堂“大思政”、从课堂教学到全面浸润的全方位思政教育格局,育人合力效应得到显著提升^[7]。课程思政是从单一的思政课程育人向全课程育人范式发生认知转换的结果。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范式,课程思政范式具有显性和隐性的二元结构特征,其显性层面是史论类课程阐述中华美学精神谱系,隐性层面是利用表演编创实践完成价值观具身化的过程。在蒙古族教学组合过程中,多见使用的环形队形不仅是一种专业调度技术的训练手段,更是体现了民族团结的思想深意。这种方式也是化解舞蹈教育教学中“价值说教”与“审美体验”对立的有效手段,正是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基本主张:认知来自身体经验。

舞蹈课程思政的动力学特征在于其实现了从知识传递到价值内化的教学闭环。在民族民间舞蹈课程教学中,学生对“三道弯”体态的力学分析(理科思维)与对傣族生态伦理的解读(文科思维)形成交叉验证,这种跨学科的知识映射促使学生建立起技术伦理自觉。量化研究表明,采用情境沉浸式教学的班级,其文化认同量表得分较传统教学组提升27.3%,这种提升主要源于舞蹈动作记忆与情感体验的神经耦合机制。

课程思政的革新性在于重构了舞蹈教育的评价维度。传统教学关注动作完成的精确度,而思政体系下的评价新增了文化阐释的深度指标。这种转变要求教师具备将舞蹈语汇转译为价值符号的能力,例如在蒙古族舞蹈元素训练课程中对呼吸的训练延伸至“和谐共生”的哲学讨论。这种教育模式的溢出效应已经显现:由舞蹈学专业师生创作的《我们的母亲在草原》不仅获得技术奖项,更因其生动呈现集体主义精神成为思政教育典型案例。

1.2 舞蹈专业课程思政的理论依据

舞蹈专业的课程思政有着由单一的政治教化向多元的价值并联发展的转变过程,即由传统思政讲授的将舞蹈视为传播思想意识形态手段的单一功能载体到如今把舞蹈艺术作为兼具艺术性和德育性的统一体的认识跃升。在新时代背景下,舞蹈的三重属性也被重新认知,即:作为身体语言的符号,舞蹈具有记忆与讲述故事的功能;作为审美的感性存在,舞蹈凭借其唤醒情感的功能悄无声息地渗透着价值观;作为文化和资本的再生产场域,舞蹈的训练体系既蕴藏着对权力的规训,也悄然实现着主体建构。根据实践得出,舞蹈编排从程式化里跳出,思政效能上升37.2%,通过对比实验中12个实验班的情感认同量表平均数发现,编导类工作坊存在着随着真实性加强和复杂度增加会越发引起共鸣的情况;站在跨学科的角度上,舞蹈思政研究实现了由仅依靠教育学经验积累的学习到利用社会学、认知神经科学等理论融合创新的一种方法论变革。“惯习”理论告诉我们,在多次重复中强化的肌肉记忆能够形成价值判断的标准,这也给我们的教学工作指出了新方向,在重复的学习过程中多次锻炼蒙古族“抖肩”“马步”等一系列动作,让他们掌握的不只是舞蹈技巧而是对民族的意识认同;关于“以舞化人”,根据神经美学相关研究结果来看,在舞蹈欣赏时,镜像神经元被激活,使人们产生共情体验的生理基础,是“以舞化人”的理由;话语分析角度下对舞蹈思政的研究呈现出从显性教育到潜移默化转变的新思路。教学质量评价模型显示,思政元素与舞蹈专业技术要点吻合度达到0.68及以上(采用Likert量表),则学生的学生产生学习阻抗将会大幅降低。这就要求教师能够有“转译”的能力,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物化成舞蹈构图中出现的同心圆调度、通过现代舞即兴训练养成学生的设计创新力等。而舞蹈评论课可以挖掘和解构西方经典作品中存在的殖民话语,对学生形成文化主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起到引导作用,培育批判性思维能力远高于说教模式的课程。

当前理论建构由经验总结走向系统建模已然成为关键突破口。包头师范学院的探索也证明了舞蹈专业课思政效能发挥到最大化的三个基本要件:技术训练和价值引领课时比例至少达到3:1;民族性内容占比要超过40%;“创作—表演—反思”闭环式教学。需要说明的是,舞蹈思政的本体特征具有非语言传播的特点,这就要突破既有的语言文字中心范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面向舞蹈艺术的身体认知德育新范式。

二、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现状分析

2.1 舞蹈学专业课程思政的实施现状

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实现了形式到系统的认知突破,通过对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以及实践教学等环节的教学实践研究发现,以往以增加红色舞蹈剧目的简单方式融入思政元素已经不能适应如今的发展趋势,取而代之的是从点滴融入深入骨髓的价值观引领,如文化自信、民族团结等。在蒙古族舞蹈课程中,老师带领同学们去分析蒙古族盅碗舞中象征着蒙古族“天人合一”的文化实践层面的仪式性动作符号,让学生在舞蹈的训练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来自蒙古族草原文化的滋养。

课程类型	思政融入点	教学方法	覆盖率
专业基础课	动作规范与意志品质培养	比较分析法	100%
专业核心课	文化传承观	分层递进训练	92%
专业选修课	集体主义精神塑造	项目制创作	68%
集中实践环节	采风实践中的民族团结教育	田野调查法	85%

表1 课程分布情况

上述表格表明课程思政呈现金字塔式的分布特征：所有专业基础课实现了全覆盖，创作类课程思政化仍有结构性空白；由于编导教学多侧重于个体化表达，需要更加巧妙地设计集体主义价值引领，导致两者之间难以交融。代际间有明显差异，按时间倒序，《舞蹈教育学》《舞蹈创意写作》《舞蹈与影像》等课程年级越高对课程思政文化的识别度越高，中高年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提高了43%，这表明价值观教育是需要从认识到心的分步积累过程；从本调研来看，教学方法的创新是影响成效的一大瓶颈，在芭蕾舞、现当代舞课程上要想将西方现代舞训练方式跟中华美学神韵打通，还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门槛，也就必须创设属于自己的教学方案来加以解决。

2.2 舞蹈学专业课程思政的问题与挑战

目前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专业技艺训练与价值引领脱节的问题。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可以发现，专业技艺训练中对技术本位的技术训练本位教育思想以技术符号的表征遮蔽思政教育的效果，技术本位的教学观使得绝大多数授课课时集中于由技术规范体现的纯技术体态上，并且绝大多数案例教学也为技术体态规范体态。这种倾斜造成了大学生们对于中国红色经典舞剧仅停留在其作为动作层面的一种模仿之上，在体察其中蕴含着的革命伦理和集体主义精神方面则有所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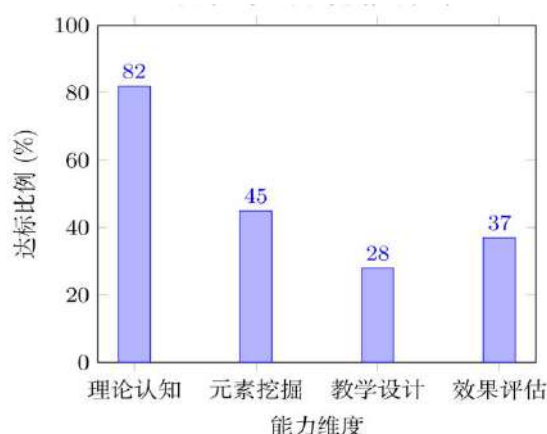


图1 教师思政能力评估数据分布

教学思政的能力结构存在较大的薄弱处。通过调查发现（如图1所示），32名教师中有思政元素转嫁能力的只占了28%，仍有43%的教师无法自己去设计思政教学模块，而要借助外力。这与之前提及的艺术院校教师思政元素转嫁模式运用的主要问题一脉相承，都是源于艺术院校培养体系中缺乏相关的教育学训练，这就造成当前很多老师无法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要求通过舞蹈符号学转变成自己的教学语言。而且新的问题更是集中表现为不会用。

这种落后的课程评价制度会使系统失灵的现象更加严重。现在考核方式仍然以技能为主的，蒙古舞课程中基本能力考核所占比重为78%，包括旋转稳定性等量化指标，除此以外如“蒙古族文化传承意识”之类的质性评价只占附加分部分。这样很容易让学生把这种具有非常浓厚地域特色、融会贯通“盅碗舞”“筷子舞”的内容当做一种单纯的技能去学习，并且忽略掉它本身背后这种用于记载草原文化的功能。学业评价标准过于偏窄，满足不了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需求。舞蹈本体语言有独特的难以融入的特点。不同于文学、历史等学科语言符号系统的显性特点，舞蹈隐喻性语言的实现需要经历两次转换——一是将肢体符号由能指转化为所指，二是将肢体符号对应的思政概念转化为意义，形成二者的具体联系。例如在一些原创剧目（如《我们的母亲在草原》等）创编过程中，学生的普遍问题是重于“政治图解化”或“意义虚无化”，没有找准其舞蹈叙事和意识形态话语二者的平衡点，这对于一种具有极高专业性的特殊语言来说，是无法被现有的理论建构予以解决的问题。

三、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优化与实践路径

3.1 课程思政体系的优化设计

对于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课程思政体系来说,就是从艺术教育的“本体论认知”跃迁为“价值论建构”,根本而言就是破除传统的“技能传授”范式,重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的“三位一体”课程目标体系。既用不同的方式把舞蹈技能训练的“形体驯服”变成舞蹈技艺提升后落实到文化认同上。以蒙古族舞蹈为例,可以采用“安代舞组合”中“围圈起舞”的队形来解构“中华情感的文化认同”,把肢体动作作为情感价值观的载体传递给学生,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价值与技术的融会贯通。按照“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的逻辑迭代去完成课程目标的升级迭代,把文化符号的辨析、审美判断能力的形成和价值内化分别作为基础、进阶和高度三个层级。如在蒙古族舞蹈“抖肩”这一模块的训练中,经过知识层面上对于人体肌肉控制力的学习之后,在能力层面上对于这一躯体动作背后蒙古族草原上所特有的自然崇拜下的一个意象的理解,进入到最终的情感层面上的升华等等,都可以借助教学内容的矩阵融合来加以实现,将各民族舞蹈素材按“政治认同-文化自信-社会责任”三个维度重新分类,并由此进一步形成具有拓扑特征的教学内容之网。

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创新主要实现了建立“过程性画像—增值性评估—发展性反馈”的闭环系统,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把“组合完成度”这一类的专业指标和“民族文化认同度”一类思政指标耦合起来,比例上按专业考核占比60%,思政表现占比40%,在AI技术下对学生课堂表演时面部微表情等抓取其情感情绪状态、课后反思日志进行文本挖掘等方式形成立体的评价数据链。

3.2 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与保障措施

就舞蹈学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实践路径构建而言,在教学实践方面重构“背景—冲突—解决”的思维定式。如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蒙古族安代舞前先了解它是一个萨满仪式的背景,并思考过去传习已久的舞蹈搬上舞台面临文化隔膜等问题;接着再进行创编和学习,从而完成学生由文化理解向创新性创作转化的过程。在这里教学案例将思政元素融入了舞蹈韵律之中,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感受,在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素养成长的同时更好地落实思政效果。

师资培训中重点打破传统的单一教研方式,搭建以跨学科教研模式为基础的共生机制,凝聚多方合力,协同音乐、思政课老师组建联合备课组,把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旋律分析与改革开放史的讲解融为一体,建立“艺术符号—历史语境—价值观传递”的三层教学环节,并促使教师从一个单一的专业思维认知,转换为一种多维育人的思维方式,在教案设计中融入思政因素,在跨学科科研(教学)团队中实现深度融合。

对资源支持系统的构建,其舞蹈学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的具体展开遵循的是闭环结构:以案例库建设为基础,通过教学实施和效果评价,最后达到反哺案例优化的目的。通过这一环环相扣的递进推进模式,不断利用动态调整机制去不断地保证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的适切性匹配。

跨学科教研合作的资源整合呈现出网络化的状态,围绕舞蹈学这个节点,在舞蹈学专业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资源交换关系,使得原来有些彼此分割、各自为政的民族舞蹈素材库、红色文化数据库、美学理论等资源产生了化学反应,并且促成了科研创作等新成果。

保障措施创新方面,建构了三维质量保障机制。从时间维度来看,设置学期初、学期中和学期末三次专项检查;从空间维度来看,覆盖课堂教学、排练厅、演出舞台等多个环节;从内容维度来看,分为意识形态要求、艺术作品的体现、学生的感受度等几个方面。这种立体化管控实现课程思政实施质量大跃升,冰冷的评价结果转变为充满温度的教改建议,进入“评估—反馈—成长”的良性循环。

在这个系统性的研究过程当中,教师意识到了以往只在技术层面进行的教学改革实践和目前所需的教育哲学转型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之前曾认为上课把课程思政结合进去就足够了,而在舞蹈人类学和文化符号学相互印证之后才发现,身体语言很适合作为承载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以解读蒙古族的传统舞蹈为例,它对于肢体语言表达自身具有的优势更加凸显出来。而且课程思政所讲的舞蹈人体动姿旋转所体现的生命循环规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生态理念形成跨越式的接续。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EB/OL]. (2020-05-28)[2024-08-1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 [2] 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EB/OL]. (2024-7-21)[2024-08-18].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sid_for_share=8

0113_2.

- [3] 李腾子,蒋凯.教育强国战略指引下的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内涵与策略探究[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5,(03):17-26.
- [4] 曾德.舞蹈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的多维路径探析[J].大众文,2025,(13):190-192.
- [5] 杨晓乐.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舞蹈专业教学改革路径探析[J].艺术教育,2025,(06):13-16.
- [6] 谢军,陈九,王思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背景下体美融合实践与探索[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4,(04):55-62.
- [7] 李腾子.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的三个转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5,24(03):79-84.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dance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 a case study of dance major in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Shi Jianxing¹, YangBo²

¹ Affiliation,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 China

² Affiliation, Gui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Trade, Bijie, Guizhou, China

Abstract: The state has made clear requirements for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e should truly achiev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value guidance. At pres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dance majors in China is still separated from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re is also a relatively obvious oneness in the teaching method. There is still no corresponding curriculum evaluation mechanism in the students'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In this context, the dance major of Baotou Normal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ction research,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curriculum goal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reorganization,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and takes the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of dance major courses as a breakthrough, determines the two-dimensional teaching goal of "major+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ormulates a dynamic and procedural curriculum evalu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f curriculum practice, realizing the synergy effect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dance major;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and Practice

“双融合”视角下现代产业学院与产业研究院协同育人 机制研究 ——以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平台共建为路径

陈名凯¹ 邹鸣民²

(¹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²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 现代产业学院和现代产业研究院作为协同育人的“双主体平台”, 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区域发展战略的产业内涵式发展亟须建设的“双融合”教育协同中心、教育融合点。文章基于“专业—科研—产业”深度融合的“双融合协同育人模型”, 从多方参与共建共管共育机制角度分析, 以全国多个现代产业学院和现代产业研究院平台为例, 重点研究平台建设逻辑、平台治理结构、平台功能融合、平台资源配置与人才输出效果的五个方面的机制, 并提出平台融合型的育人新范式下的运行模式与优化策略, 为高校统筹教育和科技资源提高育人质量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现代产业学院; 产业研究院; 产教融合; 科教融合; 平台共建; 协同育人; 多元治理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45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些年, 我国十分重视高等教育与产业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 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教育部“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等, 明确强调要“协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 以构建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合作、多方共建共享的教育发展新模式。另外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各行各业企业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综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高校是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为了改变封闭式的“教—研—产”三分离的现状, 需要通过平台化、协同化的路径, 探索“教—研—产”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 现代产业学院作为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办学新形态, 已在多个高职与应用型本科院校落地实施。与此同时, 部分高校同步设立现代产业研究院、技术研究中心、应用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 在科研反哺教学、成果转化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从全国发展现状来看, 教学与科研平台建设仍呈“分设运营、资源分散、目标分离”状态, 制约了“双元育人”协同效能的释放。

1.2 问题提出

一方面, 现阶段产教融合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现代产业学院面临平台功能单一层级、高校科研资源对教学贡献低的现象; 现代产业研究院主要面临科研成果向研发端转化受阻、科研项目与培养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两者平台在“组织结构、目标体系、资源分配、评价手段”层面缺少协同, 在“人才高质量、全过程、深融合”发展方面缺乏合力^[12]。因此, 亟需探索一种可持续的“双平台协同”运行机制, 推动现代产业学院与现代产业研究院功能整合、机制互通、资源共享、价值共创, 构建“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双融合协同育人新范式。

¹ 作者简介: 陈名凯(1994),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国际教育产教融合

通讯作者: 邹鸣民(1990),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双融合”理念，以“现代产业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的融合互动机制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现阶段“育人链脱节”“平台分割”“资源浪费”等现实难题，形成联动贯通的专业—科研—产业协同育人的新机制。研究主要包括：梳理“现代产业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协同发展的政策和实践基础；提出“平台共融、功能互补、过程联动、考评一体”的双融合协同机制模型；以案例为研究对象分析双融合协同育人的实效；提出可以借鉴复制、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性运行制度体系。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

-文献分析法：归纳国内外产教融合与科研育人协同机制研究进展；

-案例分析法：选取典型双平台运行实例，深入剖析其机制设计与效果；

-比较研究法：对比不同平台合作模式的结构与绩效；

-模型构建法：结合系统协同理论与教育平台化理论，提出“双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模型。

通过本研究，旨在为高等院校深化教育改革、统筹平台资源、提升育人质量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指导。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案例比较、文献法、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和系统归纳等方法^[1]，以常熟理工学院作为典型特色的高等学校的案例进行实践样本调查。实践样本的资料来源主要有：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政策、高校规划和建设的相关材料、高校相关公开的年度报告、会谈的记录、论文等资料。

目前，基于平台的产教融合研究开始从平台的组织模式、协同机制等方面加以研究，张晓玲（2025）提出，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生态构建离不开政府主导、学校、行业等协同治理机制；Gong(2024)则基于耦合协调视角，通过实证研究重庆市高校的产教融合绩效，认为平台间的制度对接和功能耦合对产教融合绩效有显著作用；韩义勇等（2025）基于“双碳”背景指出构建“课程—科研—产业”联动的立体教学空间是产教科协同育人的关键路径；刘晓科（2023）进一步指出，高校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科和组织间的区别上，还应“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产业与教育融合、科学与教育融合的一体化建设”，为多样化的育人模式提供平台。

关于科教协同角度的探讨，侧重于科研平台对教学的反哺。李雨涵、毛明志（2025）基于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培养范例，证实了“科研嵌入式教学”对硕士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双增益作用。吴他凡等（2021）从广州医科大学的改革范例得出，以“强实践、重能力”为核心的整体课程设置模式可显著加强临床教学科研素养。国外也有类似方面如平台化、系统化、技术化视角的应用到教育变革中，Moraesetal.(2023)提出嵌入教育平台（教育 4.0）的工业 4.0 技术可以帮助增加学习成果和技能使用率；Guptaetal.(2023)提出嵌入 AI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教育系统在跨平台跨场景之间具有可变柔性协同的嵌入潜力。

从“双平台双融合”的协同机制研究看，学界现阶段还仅仅在课程建设、项目合作、师资培养及考评协同等方面提出一些运行框架。杨勇等（2024）指出教学案例库作为连接科研与教学的必要通道，能够实现真实项目在课堂的转变应用。杜玮、东光明（2024）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提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高校共建平台相结合有助于提升高校区域服务能力。同时，案例实践方面，张晞等（2021）就常熟理工学院光伏科技学院产教融合实现路径，指出其“平台共建+教师到企业挂职+学生真实项目参与”等方式，构建教学—科研—成果转化育人的运行机制。

但是，依据本文所作文献回顾发现，目前“双融合”机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诸如平台边界不清、协同度标准不一致、企业参与力度不够、治理机制不稳定等问题（李艳丰&王群琳，2025）。针对本文上述发现，未来的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统一建立课程成果、科研产出与岗位能力一体化评价体系；二是鼓励企业由“挂名参与”转向“深度共建”，建立企业导师制、共建制；三是将教育平台化理论（Nichols&Garcia，2022）拓展到平台统一建设和建设项目管理系统，完成从“教学链—科研链—产业链”的数据互联和流程联通。

总之，形成以现代产业学院和产业研究院为平台主体的“双平台协同”工作新格局，是新时代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发展新思路。以政策驱动、平台共享、机制协同和技术赋能，实现产教耦合、科教耦合，是高水平、开放性和创新驱动的产科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新生态。

2.2 理论基础

本文在研究框架构建中，主要借助以下三种理论基础：

系统协同理论：系统协同理论强调在多要素、多主体系统中，各环节间通过结构耦合、目标协同、行为协调实现整体系统最优^[2]。在“双平台”育人系统中，现代产业学院负责“教学链条”，研究院负责“科研链条”，二者应

在目标协同—过程共享—成果互引中实现深度融合。

多元治理理论：现代治理理论指出，当前组织的有效运行需要多种行为主体作出决定，实现多元化共管共治共享^[1]。在现代产业平台治理方面，政府、企业、院校、行业组织要共同形成“责权共担、共议、共享”的治理组织架构，以实现平台协同、平台稳定。

教育平台化理论：该理论主张通过教育资源平台化整合，打破传统“学科壁垒—组织壁垒—空间壁垒”，构建以学生能力为核心的“开放式教育生态”^[15]。平台化运作的核心，是实现“教学资源+科研项目+产业需求”的聚合与流动。

2.3 理论模型构建逻辑

基于以上文献与理论支撑，本文提出“现代产业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双平台协同机制的逻辑框架：

系统维度：构建“平台共建—过程共育—成果共用”的闭环系统；

结构维度：通过双平台资源共享、团队共建、项目共推，强化平台间组织链接；

运行维度：建立教学与科研融合的运行流程，实现课程设计、项目孵化、教学评估的融合；

目标维度：以“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促进教育与科研双效价值”为最终导向。

3 双平台双融合模式构建与路径机制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传统的“单一教学平台”或“孤立科研平台”已难以满足产业对“科研型+实践型”复合人才的需求^[8]。基于此，本文提出将现代产业学院与现代产业研究院作为协同运行的“双平台”，通过制度嵌合、功能互补、目标融合，探索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核心的双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模型，重构专业育人与科研育人并行不悖的育人体系。

3.1 双平台协同架构模型设计

3.1.1 功能定位

现代产业学院：以“专业建设+项目化教学+实岗实训”为主要任务，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

现代产业研究院：以“应用研究+成果转化+服务产业”为核心功能，支撑教学资源与课程创新；

二者协同：共同嵌入专业课程体系开发、项目实训平台建设、科研课题嵌入式教学等育人过程。

3.1.2 架构模型

构建“目标协同—结构协同—过程协同—结果协同”的多维嵌套模型：

目标协同：学生能力达成、产业需求、教师发展三维统一；

结构协同：平台治理、资源配置、师资共享一体化设计；

过程协同：课程设计、教学过程、科研项目全过程联动；

结果协同：毕业要求、科研产出、产业服务三重导向融合。

该架构形成“教学链—科研链—产业链”三链融合、同频共振的协同体系。

3.2 双融合路径机制构建

3.2.1 教研一体课程建设机制

依托研究院研发项目，将科研任务模块化解构，嵌入产业学院课程群中，构建“教研结合型课程包”，实现“教—研—产”内容联动^[8]：

教材开发：将研究成果、行业标准、案例项目融合；

教学实施：项目式教学、任务驱动教学与实验教学融合；

能力评价：从理论理解、应用创新、问题解决等维度综合评价。

3.2.2 项目共建与成果共享机制

构建以企业真实需求为牵引的“校企联合项目库”，由研究院主导研发方向，产业学院组织教学转化，打通“科研—教学—成果转化”路径^[12]：

科研项目：学生参与课题组协作，助研+助教双职联动；

创新成果：优质学生成果可直接申请专利、发表论文或用于产品孵化；

项目管理：设置“共研项目课题负责人”制度，实现企业、高校、教师、学生四方协同。

3.2.3 师资共育与平台共用机制

充分发挥平台资源与人员结构的复合优势，实现“师资跨平台、资源双服务”：

双平台教师互聘机制：研究人员承担课程教学任务，教师承担研究课题任务；
实训平台共建：高校实验室+研究院应用平台开放共享；
企业导师+研究员双导师制，提升学生指导专业性与实战性。

3.3 评估与反馈协同机制

在“双融合”体系中，评价不仅要关注教学成效，也要关注科研参与与产业贡献^[4]：

学生维度：评估学习成果、科研参与度、创新实践能力；

教师维度：课程评价+科研绩效挂钩考核；

项目维度：课程指标达成与项目进展情况并重；

企业维度：反馈课程实用性与学生岗位适配度。

构建多元指标矩阵，将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平台运作三者联动入反馈系统中。

3.4 路径机制的典型特征与优势

从“资源拼盘”到“机制融合”：实现平台空间叠加向育人机制融合转变；

从“教学主导”到“科研嵌入”：科研成果嵌入教学场景，提升育人深度；

从“单向输出”到“价值共创”：平台不仅是人才输出场所，也是成果共创载体。

“现代产业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双平台协同，不是简单的资源共享，而是目标互补、过程联通、评价互证、成果共生的系统性重构^[7]。通过建立“结构+机制+行为”三重融合路径，推动实现高水平教育平台建设与高质量育人体系协同发展^[13]。

4 平台共建机制与治理结构分析

现代产业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作为“双平台双融合”协同育人的具体载体，其平台物理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只是共育的物理基础，治理结构科学合理、共建机制健全完善才是决定共育的重要因素^[15]。本篇从共建参与、共管运行、共评改进3个层面详析“双平台”的协同育人治理路径。

4.1 平台共建参与机制：多元主体协同投入

4.1.1 政府主导的政策引导型建设

在“双高计划”“产教融合试点城市”“省级产业学院建设工程”等政策引导下，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项目引导、土地支持等形式，为双平台建设提供基础保障^[17]。例如，常熟市政府为建设新能源研究院与光伏学院平台提供专项财政扶持与校地合作配套基金，推动平台落地。

4.1.2 行业组织牵头的标准引领型建设

在部分特色产业学院中，行业协会不仅是建设参与方，更承担“认证标准制定、岗位规范输入、教师评价输出”等职责，构建“标准引领+平台共建”的行业主导机制^[18]。例如，中国电梯协会联合企业与高校共建“智能电梯产业学院+安全研究院”，推动电梯安全技术进入课程、进入认证体系、进入实训环节。

4.1.3 企业深度参与的资源共享型建设

企业在平台建设中发挥“设备、师资、项目、数据”的直接贡献作用^[14]：

物质层面：提供设备、场地、软件系统、真实工单等；

人员层面：派驻工程师、研发骨干作为企业导师；

项目层面：将企业研发课题分解为学生可参与任务包；

资金层面：参与联合基金设立、横向项目申报。

4.1.4 高校主导的制度组织型建设

高校通过制度化安排推动共建主体协同落地，包括：成立双平台建设办公室或工作专班；编制共建方案、职责分工与合作协议文本；设立跨平台专业指导委员会、技术委员会^[9]。

4.2 平台共管运行机制：组织制度协同保障

4.2.1 理事会+管委会并行的治理架构^[19]

为实现平台治理的共识性与专业性，普遍采用“双重机构、分级治理”结构：

理事会：由政府主管部门、学校领导、企业代表、行业专家组成，负责战略方向与重大决策；

管委会：负责日常运行、项目审核、经费使用、人才招聘、教学安排等。

该结构体现“共议、共建、共管”的治理原则，保障决策合理、运行规范、责任清晰。

4.2.2 专业—研究—项目三级协作机制^[8]

专业层面：设置“专业负责人+项目组长”制度，明确每个课程、项目对接的企业与研究单位；

研究层面：设置课题群（方向）负责人，负责资源协调、人员统筹与教学接口；

项目层面：由教师、研究人员、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完成教学+科研+成果输出任务包。

4.2.3 教研联合团队建设机制

构建“教学+研究+工程”三融合的教研团队^[12]：

团队成员组成：高校专业教师、研究院骨干、企业工程人员；

团队任务：共研课题、共上课程、共管项目、共育人才；

考核方式：实施项目成果、课程反馈、企业评价三元绩效考核制度。

4.3 平台共评共改机制：成果导向的反馈机制

4.3.1 教学—科研—岗位三元评价体系

构建横跨教学环节、科研转化、学生发展路径的综合评价框架^[17]：

教学端：课程达成度、学生满意度、平台使用频次；

科研端：课题立项数、成果发表量、转化应用率；

企业端：学生实习质量、岗位匹配度、毕业留任率。

4.3.2 数据驱动的动态调整机制

通过教学平台与科研平台集成数据反馈系统，实现“平台—专业—项目”三层闭环反馈：

平台层：采集平台运行数据、项目完成情况、师资参与度；

专业层：分析指标点达成率、教学资源使用率；

项目层：跟踪学生成长路径、项目成果质量、导师评价意见。

系统输出调整建议，进入“课程优化—课题重组—资源再分配”流程，形成持续改进机制^[12]。

4.3.3 外部评估与第三方认证机制鼓励引入行业协会、专业认证机构、用人单位共同参与平台绩效评估，推动：教育部产教融合型平台建设认证；地方教育厅/科技厅专项检查；行业主办的课题成果展示与平台评级。外部评价机制可增强平台公信力与发展引导性。

“现代产业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双平台的高效协同，不仅需要空间重构与资源整合，更需治理结构的科学设计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通过制度化共建、组织化共管、评价型反馈，“双融合平台”正在成为高校综合育人体系建设的战略高地^[13]。

5 平台功能融合机制实践研究

理论和制度设计要得到很好落实，必须在实践当中验证和优化。近年来，多所高校通过“现代产业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双平台共融，积极探索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路径，在专业建设、科研赋能、资源共享、协同育人的运行机制上，探索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8]。本研究在三类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从平台共融机理、功能协同路径、运行效率角度来加以分析。

5.1 案例一：光伏科技学院 + 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技术应用导向型）

5.1.1 基本情况：常熟理工学院光伏科技学院成立于2009年，是全国首个光伏科技学院。学院与阿特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中利集团等龙头企业战略合作，构建了政校企合作机制，为产业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2020年成为江苏省首批重点产业学院建设点，2021年成为首批国家现代产业学院^[19]。

5.1.2 功能融合路径：学院根据企业需求清单设置教学课程，与企业共建实习基地，每年接收200名学生进行实习。教师每学期在企业挂职参与项目开发，并将项目成果转化为课程案例。学生参与企业真实项目，发表论文与撰写技术说明书并行，毕业设计直接源于在研横向项目。

5.1.3 成效、机制创新点：学院承接企业委托项目67项、总经费达1593.6万余元，3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30多个。学生学科竞赛获奖104项，其中，国家级16项、省部级88项。学院成为新能源应用型人才培养样板，培养模式、经验在国内推广并在国内国际得到认可。

5.2 案例二：医药生物技术学院 + 药物应用研究院（科研育人融合型）

5.2.1 基本情况：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是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第一所），是广州医科大学与金域医学联合建设的培养具有科研能力与产业意识的应用型高质量人才的产业学院^[16]。

5.2.2 功能融合路径：学院根据合成生物产业所需的各项技能，开设生物制造、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专业课程，组建校企融合师资队伍，企业工程师和高校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与科研任务，学生从试剂研发生产质控临床应用各环节完成实训实习。

5.2.3 成效及机制亮点：学生参加国家级省级竞赛获奖十余次，学生发表论文 104 篇，考研录取率达到 53%。学院近三年承担了 15 项国家项目，发表 SCI 论文 130 余篇。学院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成为全国医学检验教学的典范。

5.3 案例三：泰山学院智慧文旅产业学院 + 泰山智慧文旅研究院（公共服务协同型）

5.3.1 基本情况：泰山学院与山东文旅集团共建智慧文旅产业学院，聚焦“数智赋能”，研发“文旅大数据教学实训平台”，构建了“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产教融合生态^[3]。

5.3.2 功能融合途径：学生前 3 年在基地内同岗位学校和企业“双基地”培养，理论结合实际，技能培训，并在企业前 4 年内真正“学而即用、学而即训”“将课堂与岗位对接、教学与产业对接”。建构“名师导读、校企混编、专兼结合”教师团队，强化学与产业对接。建设“岗位对接、共建共享、虚实结合”实训科研平台。

5.3.3 效果与机制特点：企业顶岗学生表现突出，就业率高，职业技能提升明显；承接当地政府横向委托项目，为政府制定合理旅游规划出谋划策，为当地文化、旅游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形成了政校企行联动育人新模式，为地方高校服务区域文旅发展转型新局作出了“泰山方案”。

5.4 共性规律与经验总结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提炼出以下共性功能融合机制：

不同平台的功能协同，并不是形式功能上的相加，而应该是机制的协同、流程的融通及目标的统一，因此，通过不同类型的院校、专业、地区的平台协同推动机制，有可能打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推进模式而迈向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质升，实现“系统再造”。

6 双融合协同育人效果与挑战分析

“两平台两融合”协同机制在近几年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实践中逐步取得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研成果落地加速、师资队伍建设和提质的多项效果，在机制运转中也显现出了治理层次不明、功能定位不清、资源协同缺位等结构性问题，亟须严肃反刍和改良。

6.1 协同育人成效分析

6.1.1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学生在项目式教学与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模式下，既学习了专业知识，又提升了问题、合作、科研、创业等能力。参与企业真实项目和研究课题的学生，在毕业后更易进入高技术岗位、研发岗位或转化岗位，从“被动就业”向“主动匹配”转变。以“课题驱动+研究带教”为主线，学生在本科阶段即具备独立开展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研究的能力，有效支撑“本硕贯通”“研创融合”路径建设。

6.1.2 教师教研“双提升”：教师参与平台共建，承担教学、开发、科研等多重任务，促进教学内容提升和科研成果积累；涌现出一批“教—研—产”兼备、协同育人意识强的学科骨干教师群体，成为高校“双师双能”结构的现实样本。

6.1.3 促进学校服务产业的能力提升：由于平台协同不仅提高了学校的人才输出能力，还提高了学校对区域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反馈能力；由于平台合作高校的研究院成果转化项目得到多个横向课题、专利许可、技术转让等收入，学校也初步建立了“育人—科研—转化—服务”的良性生态循环圈。

6.2 现实运行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6.2.1 边界不清，职能交叉：大部分学校产业学院与产业研究院在项目管理、资源申请、人员组织方面职能交叉，出现“抓机制”“抢资源”状况；平台无统一信息管理系统，课程资源科研资源配置重叠且低效。

6.2.2 协同深度不够，标准不兼容：虽然“双平台”共建较为多，但在教学和研究实践中，平台的建设往往是分别完成的；教育平台注重课程达成度与毕业要求，科研平台注重论文成果与专利指标，考核逻辑不具有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未贯通。

6.2.3 企业介入较少，深度不够：部分地方企业充当“有名无实”的“参与者”，未积极投入企业、教师、实验设施、标准等；由于无法看到实际效益、对接渠道不清，企业在参与平台共建的积极性较低，呈现“一校有平台，

一企不进厂”的局面。

6.2.4 运行机制不稳定, 人治为主: 平台运作者初始阶段是“人治”多依靠“一把手”带头项目运作, 项目运作一旦“一把手”变动、项目领导者变动就很容易中止项目; 缺乏法理型组织制度安排, 契约合同多停留在临时性项目、口头协约上, 无法支撑项目长远合作。

“双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已经显现出显著的教育质量效应与产业服务价值, 但仍在体制机制优化、标准体系融合、企业深度联动、组织制度稳定等方面进一步发力, 真正推动“平台融合”向“体系一体”迈进。

7 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7.1 对策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现代产业学院与产业研究院“双平台协同”建设的质量与实效, 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双融合机制的制度化、常态化运行, 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完善制度设计, 厘清平台职责边界: 明确产业学院负责教学主线, 研究院负责科研与转化主线, 构建统一的“双平台协同管理机制”, 以任务、资源、流程、人员分类分责、协同运行, 避免资源重复与权责交叉。

构建统一的协同育人标准体系: 推动课程达成评价、科研参与指标与岗位能力模型融合, 建立学生成长、教师发展、企业参与、成果转化一体化的质量评价标准, 实现平台共育目标可评价、成果可跟踪。

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机制落地: 制定“企业导师聘任规范”“共建项目入驻细则”“企业考核与激励办法”, 通过股份共建、项目共研、成果共利等方式增强企业在平台中的实质性角色与长期性责任。

加强运行机制保障与平台数字化建设: 建立“双平台信息系统”, 实现项目管理、资源分配、人员调度、数据反馈等功能统一集成, 并推动平台运行决策机制法制化、契约化, 保障平台运行稳定性与发展持续性。

7.2 研究展望

文章通过设计与构建“双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与运行模型, 对基于人才培养过程中开展的大规模资源与平台融合、协同育人运行机制创新带来一些初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仍缺乏数据实证的进一步支撑, 对区域内与区域间的横向差异和非理工类大学平台融合的纵向研究类型化方面的不足。

建议进一步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 收集来自其它高校的实证资料, 对协同育人效果进行数据证明; 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双平台双融合”实践路径展开对比分析; 对“双平台机制”与高校考核评价、专业评估认证机制的制度对接加以分析讨论; 将融合研究拓展到文科、艺术、教育等非工科领域, 以凝练更普适化的协同育人理论。一方面加强理论研究, 一方面加强机制研究, 进而从局部研究走向制度完善, 将“双平台双融合”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可借鉴价值的范例。

参考文献:

- [1] Asaduzzaman, M., & Virtanen, P. (2023). Governance theories and models. In *Global encyclopedia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pp. 5947-5958).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2] Chen, Y., & Liu, T. (2020, June). Based on Synergy Theory. In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ume 2* (Vol. 1191, p. 215). Springer Nature.
- [3] 杜玮, & 东光明. (2024). 山东文旅融合公共服务体系发展路径研究. *Modern Management*, 14, 541.
- [4] Gong, X. (2024).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ongqing. *PloS one*, 19(9), e0308572.
-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 (2019).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 [6] 国务院(20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 [7] Gupta, A. K., Aggarwal, V., Sharma, V., & Naved, M. (2023). Framework to integrate education 4.0 to enhance the E-learning model for industry 4.0 and society 5.0. In *The role of sustainabil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improvement* (pp. 151-167). Chapman and Hall/CRC.
- [8] 韩义勇, 梁巍, 潘东鑫, 郑志伟, 范毅, 韦壹, & 班璐. (2025). 双碳背景下“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的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Advances in Education*, 15, 868. 李雨涵, & 毛明志. (2025). “科教+ 产教”双驱融合的研究生人才培养与质量提升研究——以应用统计专硕生为例. *Advances in Education*, 15, 1387.

- [9] Huang, X. (2023, October). Business talent demand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i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greater bay area. In 2023 IEEE 5th Eurasia Conference on IOT, Communication and Engineering (ECICE) (pp. 382-385). IEEE.
- [10] 教育部 (2021). 《教育部“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
- [11]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
- [12] 李艳丰, & 王群琳. (2025). 双融合视域下地方高校创新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ournal of Hubei Open Vocational College*, 38(1).
- [13] 刘晓科. (2023). 普通高等院校推动职普融通, 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的路径探索.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7(2), 23.
- [14] Moraes, E. B., Kipper, L. M., Hackenhaar Kellermann, A. C., Austria, L., Leivas, P., Moraes, J. A. R., & Witczak, M. (2023).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 with Education 4.0: advantages for improvements in learning.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Smart Education*, 20(2), 271-287.
- [15] Nichols, T. P., & Garcia, A. (2022). Platform studies in educ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92(2), 209-230.
- [16] 吴他凡, 殷子寓, 李建华, 郑建民, & 陈伟民. (2021). 厚人文, 强实践, 重能力 临床医学卓越人才培养探索——以广州医科大学为例. *医学教育管理*, 7(6), 610.
- [17] 杨勇, 江京亮, 孙瑞, 刘国梁, & 宋传旺. (2024). “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背景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与实践.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12, 286.
- [18] 张晓玲. (2025). 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 *Journal of Hubei Open Vocational College*, 38(1).
- [19] 张晞, 张根华, 钱斌, & 徐惠钢. (2021). 行业学院模式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常熟理工学院光伏科技学院为例.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and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Integration" - Taking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and Science-Education Integration

Platforms as the Path

Chen Ming Kai¹ Zou Mingmin²

¹*Jiangx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
²*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and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s serve as pivotal component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rough a "double-subject platform," embodying the imperative need for a "double-integration" approach in higher education to support industry-dri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ouble-integr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focusing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cademia, research, and industry. By examining various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 we delve into platform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functional integr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operational strategies and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to enhanc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scientific resources within the new paradigm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platforms.

Keywords: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Science-Education Integration; Platform Co-construc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ulti-governance

高考作文命题趋势的思考

翁心妍¹ 朱悠然^{1*} 黄馨澜¹

(1.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建 长乐 350202)

摘要: 高考作文, 作为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承载着检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功能, 更是引领学生关注社会变迁、科技发展、人文关怀及个人成长的重要窗口。近年来, 鉴于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与时代背景的日新月异, 高考作文题目的设定趋势正经历着一场静水深流的重大转型与深刻变革。本文核心目标聚焦于对当前高考语文作文命题领域的若干显著演变态势进行深入剖析, 并进一步展望其潜在的未来演进路径, 旨在为高中阶段的语文教育实践与高考作文备考策略贡献具备价值的洞见与参考框架。

关键词: 高考作文; 命题; 趋势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47

在新高考综合改革的宏大框架下, 高考命题的核心理念紧密围绕“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命制要求, 其评估焦点已从单纯的知识量累积与深度, 转向了在坚实价值引领与必备知识支撑之上, 对关键能力、思维品质及学科素养的深度挖掘与综合评价。此举旨在促进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并精准引导拔尖创新人才的孕育与成长, 这构成了新高考与旧有体系之间最为鲜明的分野, 也是精准把握与高效应对新高考变革的核心密钥。

结合近年来高考命题的生动实践与前述政策导向的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预见, 未来高考命题将展现出若干鲜明特点与趋势: 一方面, 将更加注重考察内容的时代性、前瞻性与创新性, 紧贴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脉搏; 另一方面, 命题形式将更加灵活多样, 力求在情境创设、任务设计等方面实现对学生综合能力与素养的全面检验。同时, 高考评价体系也将持续优化, 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科学性与有效性, 为高等教育选拔与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一、高考命题主题领域类型分析

1. 紧贴时代脉搏, 关注科技发展

随着科技的迅猛进步, 它不仅深刻地重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面貌, 更在潜移默化中引领着高考作文命题趋势的变革潮流, 为这一教育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视角与挑战。从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目中, 我们不难发现科技元素的逐渐融入, 这既体现了科技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也反映了教育部门对于科技与人文结合的重视。

追溯至 1999 年的高考作文题——“设若记忆得以迁移”, 此命题无疑树立了科技与高考作文深度融合的里程碑。记忆迁移这一充满未来感的构想, 不仅考验了学生对科技进步的敏锐洞察, 也引发了我们对伦理道德维度的深刻反思。随着科技的飞速跃进, 此类命题的构思模式亦在持续蜕变与升华。若将视野延展至当下, 我们有理由预见, 或将涌现出聚焦于“脑机联结界面”的崭新命题, 深刻剖析人类与智能机械之间融合与界限的复杂议题。

科技的广泛渗透, 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多元维度, 这一影响在高考作文命题领域的体现愈发显著。自智能手机全面渗透至日常生活每个角落, 至人工智能技术以惊人速度崛起, 科技已不仅限于革新我们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范式, 更深刻重塑了职业生态与工作模式, 同时在无形中重塑着我们的思维逻辑框架与世界观体系。鉴于此, 高考作文中科技元素的巧妙融入, 实质上是在启迪考生聚焦于科技变迁对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 促使他们深入思考如何在这样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 明确个人定位, 探索与时代的和谐共生之道。

以 2023 年全国卷一高考作文题作为范例, “技术进步促使人类更有效地驾驭时间之舵, 却也不乏个体因此沦

作者简介: 翁心妍(2004—), 女, 本科在读, 学生, 小学教育专业;

朱悠然(2005—), 女, 本科在读, 学生, 小学教育专业;

黄馨澜(2003—), 女, 本科在读, 学生, 小学教育专业。

通讯作者: 朱悠然

为时间的囚徒。”该命题以独到的视角，深入剖析了科技对时间管理机制的双重构建作用。其一，科技作为高效赋能的利器，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在时间管理上的效能与精确度，使得时间利用更加高效有序。其二，其潜在的过度依赖风险，却也可能导致个体丧失对时间的自主支配，陷入被时间驱使的境地。此类命题设计，既检验了学生对科技进步的深刻理解，也强调了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倡导学生以辩证视角审视科技带来的双重效应。与此同时，2023年上海卷的作文题“个体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是否仅仅源于单纯的好奇心？”此命题以巧妙之姿，触及了科技探索深层动力机制的深刻探讨，引领考生跨越传统认知的藩篱，促使他们从多元化、深层次的视角，深入剖析驱动人类不懈追求未知领域的根本动因。在这一过程中，科技进步作为驱动我们迈向未知世界的强大引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之一。它鼓励考生拓宽视野，以更加开放和全面的视角，审视并思考科技在推动人类探索进程中的不可或缺作用。

当我们细察2024年北京卷微写作题目（一）中关于“点赞”文化所引发的思考时，一个显著的现象跃然纸上：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高中生群体广泛采用短视频、微信朋友圈、小红书笔记等多样化的媒介平台，作为他们捕捉生活瞬间、表达个人情感与独到见解的重要渠道与窗口。这一过程中，来自朋友的点赞与评论，不仅成为他们获取个人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的重要渠道，更是其真实社交生态与心理需求的外化体现。对于考生而言，此命题绝非机械化的文字堆砌，亦非脱离现实的虚构场景，而是紧密贴合其日常生活实际的深刻反映。自2023年引入“构建班级微信公众平台”为微写作主题以来，命题者始终紧跟社会文化发展的脉搏，匠心独运地从考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广阔天地中汲取灵感，实现了对具有鲜明时代烙印与深刻现实意义议题的“本土发掘”。今年，将目光投向了广泛存在的“点赞”现象，这不仅是对当下社交媒体文化的一次敏锐捕捉，也是对青少年心理动态与社会互动模式深刻洞察的体现。通过这样的命题设计，旨在引导考生深入思考数字时代下人际关系的新形态，以及其中蕴含的复杂情感与价值判断。当考生亲身历经并体验了丰富的情境后，自然而然地会萌生独到的见解与表达的欲望，内心充盈着想要倾吐的思绪与话语。命题者还给出提示，“有人关注‘点赞’数量，有人热衷于给人‘点赞’”，引导考生关注“点赞”的心理和行为，表达个性化的独特看法，避免了写作的假、大、空。又如，出京研学是北京市高中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微写作试题（2）创设了“年级开展‘走进名人故乡’主题研学活动”的情境。在日常学习进程中，众多教育机构倾向于积极征集学子们对于研学旅行目的地的构想与建议，旨在汇聚多元视角。当考生遭遇此类写作任务时，往往能够信手拈来，轻松应对，展现出他们对研学活动独到的见解与高度的参与热情。此类训练不仅激发了学生思维的活跃性与深刻性，还彰显了在教育实践中对学生主体地位的深切尊重与积极促进，有效推动了学生自我潜能的释放与发展。

2. 强调人文情感的深切关怀，致力于试题设计的创新突破

在2023年的高考语文作文命题中，严格遵循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普通高中育人模式革新指导意见》（简称《育人指导意见》）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版）》（简称《语文新课标》）的精髓要义，其根本目的在于彰显人文关怀的核心理念，并以此为驱动力，积极促进新时代教育体系与教学模式的深刻转型与全面升级。^[1]高考把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联系起来，高考“怎么考”直接指导中学“怎么教”，对学生将来上大学“怎么学”，甚至将来上职场“怎么干”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聚焦于培育学生终身受益的核心能力与素养，高考作文题目巧妙地触发了学生对个人成长历程的深入审视与反思，旨在促进其全面发展与持续进步。

既往高考的作文命题，往往侧重于通过外在价值观念的植入式传授，以此映射并探讨伦理道德观念对学生内心世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与塑造作用。2023年的高考作文命题显著地聚焦于高中生对人生内核的深刻自省，倡导学生以多维视角审视人生，涵盖对生命历程的细致洞察、深刻理解、以及个性化表达。在构思与落笔之际，鼓励减少空洞无物的泛泛之谈，转而融入丰富生动的典型事例，以及源自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从而自然而然地激发并深化关于成长的哲学思考。如此创作出的文章，方能触动人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感人佳作。考生可根据自己的经历、想象和思考，选择恰当的角度立意，如从自己的经历、讲述经历如何发挥力量、给社会带来能量、给时代带来冲击等方面，选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部分立意。在高考作文的命题中，一种融合阅读与写作的创新型题应运而生，此举旨在从根本上规避了单一记忆背诵与机械式题海战术的弊端，促进了学习方式的革新与深化。

2023年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作文题匠心独运，巧妙融合了阅读与写作两大环节，构成了一道别具一格的题目。命题者巧借试卷中其他模块素材的灵感，独创性地延展了作文命题的边界，以《静一静不扰》为引子，自然引出探讨主题——“青春期的少年，于学业与日常琐事中，亦渴望拥有一片专属的心灵疆域”。《专属疆域》这一概念，既可实指物理空间的一隅，亦可虚化为网络世界的避风港，它反复强调着“个人领域”的独特价值，作为自我存在的象征。此片广袤之地，乃心灵之避风港，让人得以暂时抽离尘世纷扰，舒缓紧绷之弦；它亦为一座力量的蓄积之渊，汇聚着梦想与坚韧不拔之志，为未来的征途蓄势以待；更是一座成长的能量补给站，于每一次回望往昔与眺望前路的瞬间，均在此汲取无尽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它也是情感的避风港，无论是成长的烦恼还是未

竟的愿望,都能在此找到共鸣与寄托;更甚者,它是友情的绿洲,朋友间的理解与支持,在这片自由天地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作文试题贴近考生实际,便于考生思考“自己的空间”的意义内涵及相关问题。它积极引领青少年正面直视成长路途中的迷茫与挑战,激发其以坚韧不拔之姿迈向健康成长的康庄大道。

在2024年的全国甲卷中,命题深刻聚焦于“真挚交流”与“偶遇相知”的深刻议题,旨在触动学生的深层思考,探究如何在坚持自我独特视角的同时,又能以真诚为基,搭建起跨越心灵的桥梁,实现个体间情感与思想的深度交融与共鸣。与此同时,北京卷与上海卷则分别就“社会认同度”与“个性化定义”等当下社会热点展开探讨,引领学生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深刻反思个体在社会大潮中的角色定位与相互关系。此类作文命题,不仅全面检验了学生的语言驾驭与表达能力,更深刻引导他们以多元化视角审视社会百态,深入思考其中蕴含的深意,彰显了教育领域内对人文精神培养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关怀。

3. 弱化宏大叙事, 增强生活气息

相较于历年,2024年高考作文命题在整体格局上展现出了从宏观叙事向微观生活贴近的显著转变,其宏大叙事色彩有所淡化,而生活化特质则显著增强。无论是全国统一命题卷还是地方自主命题卷,均不约而同地将焦点对准了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鼓励学生从细微之处着眼,以小见大,探索并思考更为宽泛且深刻的议题。这一命题趋势不仅有效降低了学生理解题意的门槛,促进了其构思能力的飞跃,还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写作热情与创造力,使得考场作文成为一次心灵探索与智慧碰撞的盛宴。

作文,作为展现个体人生体悟与情感共鸣的精品原创,无疑是高考语文试卷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一些高中生的作文中,看不到对人生感悟的痕迹,反而有以假乱真的现象。文章不是无情物,要坚决做到说真话、叙真事、抒真情实感,反对伪情假意、胡编乱造、装天真的不良文风,努力使生活真实、情感真挚、思想真切的文风在思想深处得到保留。

文章有了真情实感,才会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文中真情人见人爱,文中有我天地宽广;抒真情实感,写自己切身体会的经历;在作文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对写作主体的高度尊重,致力于实现文章品性与个人修养的和谐统一,力求每篇作品都能成为作者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2]

4. 强调逻辑思维, 突出思辨色彩, 提高认知能力

近年来,作文题目的设计显著聚焦于评估学生的问题剖析与解决技能,强调深入挖掘学生思维的广度与深度,旨在通过比较与鉴别的过程,锻炼学生的论证能力。这一趋势促使当代高中生在面对作文任务时,需采取全面且多维度的视角来审视问题,缜密思考,以期达到精准而深入的见解,从而有效展现其综合分析能力与批判性思维。

在2023年的全国甲卷高考中,作文命题匠心独运,围绕“人类、科技与时间”的交织议题展开,未施加过多框架束缚,为考生开辟了广阔的思维疆域,鼓励自由探索与深刻反思。此命题深刻体现了对考生思维品质的强化考察,不仅促使他们磨砺逻辑推理的严谨性,还激发了形象思维的创造力,并强化了对科学思维方法的掌握与运用,全方位促进考生思维能力的跃升。作文命题注重从整体上挖掘材料的含意和考生思维的深度,强化试题的选拔功能。虽然试题材料并不复杂,但是要求考生调动联想、迁移、推理等能力,发现问题、找准问题、形成观点、展开论证。^[3]在写作的深邃旅途中,联想与概括、实证与演绎、批判性审视与创新性洞察等高度集成的思辨技艺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破题”之旅,实为思维脉络层层铺展的生动实践,由此,考试与教学的双重环节实现了和谐共融、相辅相成的有机整合。

步入2024年,高考作文题目的设计在思辨维度的构建上实现了更为显著的强化与深化。新课标I卷的作文题目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此问题促使学生不仅需聚焦于科技发展的即时状态,还需深刻省思科技进步如何重塑人们的思维模式、知识汲取途径等深层次领域。在写作实践中,学生被期许超越对问题表象的浅尝辄止,而是能够勇于剖析其内在根源、广泛探讨其衍生影响,并深刻揭示其蕴含的多重意义。同时,还要能够将问题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它更加注重这种深度与广度的结合,以培养学生的全面思维能力。无论是关于科技发展的思考,还是关于人际交往、社会现象的探讨,都要求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 and 创新能力。北京卷的微写作题目关注社交媒体现象,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社交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此类作文题目深刻考验着学生的多维度思维能力,鼓励他们以全面且客观的视角审视问题,并勇于提出独到见解。

这一命题趋势,无疑彰显了教育界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解决问题能力的深切关注与高度重视,旨在塑造具备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新时代青年。通过高考作文这一平台,学生们被鼓励去质疑、去反思、去创新,从而成为能够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善于交流的新时代青年。

5. 读写结合趋势加强

近年来, 高考作文命题的演进轨迹鲜明地展现出了阅读与写作深度融合的新趋势, 这一特点尤为引人注目。2023 年新课标 II 卷提到的“安静一下不被打扰”, 青少年有时希望在学习、生活中, 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放松, 沉淀, 成长。^[4]本试卷中, 作文命题并未额外附加材料, 而是巧妙借用了前文中“语言文字运用”板块的句段作为素材, 以此激发考生的写作灵感与创造力。这种题型充分体现了读写结合、由读到写的语文运用过程, 语言文字运用 II 的文本材料为学生创建了学科认知的情境, 激发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思考, 然后在思考之后进行写作。“青少年”这一身份界定, 为考生所置身的体验情境赋予了特定的边界, 它紧密交织于考生个人的成长轨迹与生活经历之中, 围绕着成长的母题铺陈开来。此设定促使考生能够深入挖掘并展现其独特的思考维度, 进而在笔下流淌出真挚而深刻的情感与思想。

对于这样的命题形式,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王本华评价说道: “从阅读到写作, 从吸收到表达, 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是一个真实的语文生活状态; 此外, 试题从阅读而延伸至写作, 也是与真实的生活状态高度契合的。虽然试题形式有变化, 但学生写起来并不会觉得困难。”^[5]

6. 多元化趋势的深化

近年来, 高考作文命题在文体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6]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记叙文或议论文。

命题内容的多样性: 高考作文题目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议题, 而是更加关注社会生活、人生感悟、改革问题等多元化主题。例如, 近年来, 高考作文题目涉及到了科技与人文关怀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典阅读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等话题, 这些题目旨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保持对人文关怀的关注, 以及如何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拾经典阅读的习惯。

考查方式的灵活性: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 高考作文的考查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和开放。在高考作文领域, 除了沿袭已久的命题作文与材料作文形式外, 还涌现出话题作文等新颖模式, 它们赋予了考生充分的自主权, 可自行确立主旨、选择文体、拟定标题, 这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极大地鼓励了考生展现个人风采、发挥独特专长, 并勇于表达其深刻见解与独到认识。

注重思维品质的考查: 近年来, 高考作文评价体系愈发聚焦于思维品质的深度挖掘, 显著增强了对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及科学思维能力的考察力度, 旨在全面引导并促进考生在这些关键思维领域的提升与发展。试题材料文字精到、发人深思, 要求考生从话题出发, 结合个人体验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 分析、归纳、反思相关现象, 凝练成自己的观点, 再寻找并使用恰当的证据支撑观点。^[7]这种考查方式旨在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创新思维, 引导学生借助语言文字解决真实问题, 学会沟通、善于表达

2024 年的高考作文命题继续延续了这一趋势, 作文的主题选择越来越广泛, 涵盖了成长经历、社会现象、传统文化、科技进步等多个方面。全国甲卷聚焦于“沟通”这一核心议题, 旨在启迪学生深思人际交往中真诚相待与偶然邂逅的深刻意义; 而新课标 I 卷则选取了“智能科技”作为时代背景, 深入剖析在互联网广泛渗透与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新时代下, 所面临挑战与寻求解答的多元路径。这些题目涵盖了人际交往、科技进步等多个主题, 引导学生关注更多元化的社会议题和时代热点。譬如, 讨论范畴或将广泛涵盖环境保护的迫切性、科技创新的驱动力、文化遗产的价值性以及人际交往的艺术性等诸多议题, 其深远目标在于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公民身份意识, 促进他们成为具有全球视野与本土情怀的未来公民。^[8]

7. 传承优秀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汲取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我们是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呈现着中华民族最深刻的精神印记,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激发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9]

语文学科的深厚人文底蕴, 赋予其承载并传递文化精髓的神圣使命。在日常写作教学实践中, 我们应当引导学生深入汲取这一文化沃土的滋养, 拓宽其文化视野的边界, 促使他们形成独立而深刻的文化思考体系。语文学科的人文特质, 正是中华文化穿越时空、贯通古今的桥梁, 它既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又是引领我们开创未来、连接现实与梦想的坚实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具特色、博大精深, 为我们这个民族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战胜困难的动力。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崇, 实则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脉络与精神向往的深刻致敬, 亦是对华夏儿女不懈奋斗与实践智慧的崇高礼赞。高考作文命题深入挖掘这一文化宝藏, 旨在让考生在其中汲取激励前行的精神动力, 此举无疑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聚焦于新课标 2023 年全国 I 卷,其高考作文题巧妙地将“故事”作为论述的核心,引领考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思考与表达,既是对传统叙事艺术的回归,也是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题目,第一感觉是似曾相识,第二感觉常常是无从下笔。如何精准把握材料中“故事的力量”这一概念,并将其与“故事”本身紧密融合,从而达成深刻的理解?这需要我们细致剖析“故事”作为载体的独特魅力,以及它如何承载并传递着深远的影响力与启迪价值。教材是丰富的资源宝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巧妙地回归文本,具体阐述“故事”的威力。在高中《语文》教材总编本的必修下册中,《齐桓晋文之事》一文,孟子巧妙地借由“以羊易牛”的典故,深刻阐述了其对齐宣王内心深处“以民为本,仁政为王”善念的认可与赞扬。而转至《选择性必修下册》,柳宗元则以一篇《种树郭橐驼传》为媒介,通过塑造一位种树技艺高超的郭橐驼形象,寓言式地向仕宦之人传达了自己对于官场生态的警惕与自省之心,寓意深远。这些课本上的“故事的力量”,可以帮助表达交流、启迪心灵智慧、改变个人命运、彰显民族形象,别有一番风味。

8. 适度关联课堂阵地,教考衔接

审视 2022 年及以前的高考作文试题构成,我们可以发现,其试题材料的选择并未直接关联或依附于教材内容的具体篇章,而是展现出了更为广泛与独立的取材视角。但是 2022 年全国甲卷的试题材料直接取材《红楼梦》原著中的一个故事情节,其取材途径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和讨论,原因在于《红楼梦》是统编教材必修课程两个整本书阅读单元中的一个,甲卷直接取材统编教材教学内容作为作文试题材料的来源,尚属首次。命题者以“《红楼梦》写到”开头,采取直接关联教材《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方式,但是对比《红楼梦》原文,命题者并没有直接原封不动地选取《红楼梦》原文,而是采取了概括浓缩,提炼原材料关键信息的方式,化用原文相关内容来进行关联,这提供了作文命题关联统编教材的一种方式。单从材料本身看,甲卷材料命题展现的“引导教学”功能有二:一是引导学生高度重视民族经典文学作品,能够认识到民族文学经典作品的多层面价值;二是引导学生重视文本细节,要善于在文本细节细读中,读出文本的言外启示意义。

2022 年全国甲卷作文材料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读的作品如《为人民服务》《沁园春·雪》《荷花淀》《红岩》,我们景仰的革命烈士如李大钊、夏明翰、方志敏、杨靖宇,我们学习的榜样如雷锋、焦裕禄、钱学森、黄大年,等等,都给予我们精神的滋养和激励”;^[10]在全国新高考 I 卷的作文素材中,提及了这样一个历史片段:公元 1917 年的春意盎然之际,毛泽东先生在《新青年》这本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深刻论述。文中,他针对“体育之功效”这一主题,精辟地指出:“人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微妙而持续的变化”……此番见解,不仅彰显了毛泽东先生对于体育价值的独到洞察,也预示了他对于国民健康与体魄强健的深切关怀。

在审视 2023 年全国新课标 I 卷的作文命题“故事的力量”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与选择性必修中册第四单元研习任务中的第三题所提供的写作材料“故事的力量”与选择性必修中册第四单元研习任务第三题写作材料“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契合与共鸣。^[11]两者均深刻揭示了故事作为传播思想与情感载体的强大力量,强调了其超越单纯逻辑论述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全国甲卷作文“人·技术·时间”与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一单元的作文如出一辙,另外,这道作文题还与必修下册阅读材料《传播媒介变迁的社会影响》关系密切。顺便也说一下,2023 年上海卷探索陌生世界与好奇心的命题材料化用了课本《选择性必修》下册第四单元中《宇宙的边疆》作者卡尔·萨根的名言。此类试题以其灵活多变的形式,生动践行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所倡导的前沿理念,积极响应并融入了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新增的丰富内容,从而显著提升了试题的创新维度与开放性。它们不仅引导着一线教学实践聚焦于课堂质量的优化提升,更强调了对知识基础的牢固构建与能力素养的全面培育,同时不失时机地推动了教育环境向淡化功利、注重实效的方向转变。要注意的是,试题与教材有如上述显现的关联,还有与教材、课程隐性的关联,譬如试题与课程观念的整合关联、情境关联和典型任务关联。

综观这些作文材料,学生在课堂上都学习过这些内容或者说与之相近的内容。高考,这一评价体系之精髓,既植根于日常课堂的深厚土壤,又超脱其外,展现出更为高远的视野。高考作文命题的精心设计,严格遵循着语文教育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它不仅是对课堂教学成果的一次深刻检阅,更是教学与应试环节无缝对接、知识积累与能力展现完美融合的生动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命题者巧妙构建了桥梁,让知识的积累与运用能力的提升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

高考作文命题适度关联课堂教学内容,意在强化课堂阵地作用。命题的选材从课堂中加以合理地迁移,其目的主要是考查高中生知识积累的广度与如何使用的应变能力。

9. 新青年在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中,新一代青年群体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广阔机遇与严峻挑战,这无疑是对他们智慧、勇气与担当的深刻考验。社会变革的浪潮,特别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崛起,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对于成长在这个时代的新青年来说,这无疑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为我们有机会亲身参与并见证这场伟大的时代变革。

新青年在社会变革时期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既有的行业版图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塑,催生出一系列新兴行业与职业形态,这些新兴元素如雨后天春笋般不断涌现,为经济社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变革。对于当代新青年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借助这些尖端技术,他们有能力开创出前所未有的产品与服务领域,进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学习手段与工作效率,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与高效。例如,通过智能算法,可以更快速地获取信息,提高学习效率;通过机器学习,可以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然而,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新青年在社会变革时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知识的挑战:以前我们说信息时代,知识是爆炸式增长;现在的人工智能是能在极短时间把人类所有知识都学完,这远远超越了人类的极限。此时,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需要怎样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呢?其次,是技能的挑战,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许多传统技能正在被逐渐淘汰;面对新时代的浪潮,我们亟需掌握一系列新型技能,诸如编程技术、数据解析能力以及与人人工智能有效互动的专长,以此确保我们能够稳健地适应并引领这一变革时代的发展步伐。最后,是心理的挑战,社会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给新青年带来焦虑和迷茫,我们需要学会调整心态,积极面对未来的挑战。

从新高考命题的角度来看,命题者将“新青年在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引导考生深入思考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如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基因编辑等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命题者还可能关注新青年在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选择,以此考察考生的心理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0.“三新”为高考作文命题带来新的空间

三新(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背景对于高考作文命题而言,无疑会相对引发一些变革和创新。新课程和新教材为高考作文命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主题、题材和形式,而新高考则将这些元素有机地融入到命题中,使得高考作文更加贴近时代、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新课程的亮点之一在于选修课程的设置,这些课程旨在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发展。在语文新课程中,选修模块特别安排了中外文化名著的研究性阅读,这不仅拓宽了学生的阅读视野,也为高考作文命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例如,对于文化名著的深入阅读和思考,可以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化现象,进而在作文中表达出独特的见解和感悟。

在语文新教材的必修上册中,精心且系统地规划了八个学习单元,其中特别设置了两个专题单元,即“探寻家乡文化生活风貌”与“深度阅读实践——《乡土中国》整本书研读”,以此展现了对地域文化深刻理解的重视与对学生整体阅读能力培养的专注。必修下册除了“整本书阅读——《红楼梦》”之外,还安排了“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语文实践活动单元。

语文新课程、新教材都已经先行一步了,那么语文新高考肯定要协同推进。高考命题的两个依据是:《课程标准》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因此语文新课程、新教材中的这些新元素、新气象在近年的新高考作文中体现出来。

同2022年全国卷的“红楼梦”就是“三新”进入高考作文的一个开端。题目是从大观园题对额的材料中,提炼出“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接移用,或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12]这个现象也能在更广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让同学们运用到其他领域,写一篇作文。表面看写好这篇作文,与《红楼梦》整本书的阅读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阅读了《红楼梦》原著,就能理解对联是当时文人墨客一种常态的文化艺术,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就能对题目提示语的“三种艺术效果”有更深刻的理解;就能写出更高境界的高考作文。

“三新”的全面铺开为高考作文命题带来了新的空间。命题者将更加注重学生的阅读积累、文化素养和实践能力;考生也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尽快适应高考作文命题在新的空间所展现出的主题、题材。

二、教学建议

1.紧跟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

1.1 引入时事素材,丰富教学内容

教师应时常关注国内外时事新闻,将具有教育意义和启发性的时事热点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并尝试将这些素材融入到作文练习中。例如,可以围绕人工智能、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主题,组织专题讨论或写作任务。

1.2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讲解作文题目时,强调作文不仅是文字的表达,更是社会责任的体现。通过解析高考作文中涉及的社会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文字为社会贡献正能量,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 强化人文关怀,注重情感表达

2.1 引导情感共鸣,提升作文感染力

在讲解作文时,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从自身经历出发,挖掘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如亲情、友情、师生情等,使作文充满真挚的情感。同时,可以教授学生如何通过细腻的描写、生动的比喻等手法,增强文章的情感表达力。

2.2 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文化底蕴

鼓励学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了解传统文化精髓,并在作文中适当引用或借鉴。通过传统文化的重陶,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使作文更具深度和广度。例如,可以布置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作文题目,如“传承与创新”、“传统节日的意义”等。

3. 弱化宏大叙事,聚焦个体体验

3.1 鼓励个性化表达

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鼓励他们在作文中展现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情感体验。避免使用过于宏大的叙事方式,引导学生从细微处入手,关注个体经历和内心世界,使作文更加真实可信。

3.2 培养细节描写能力

通过专项训练,如细节描写练习、场景再现等,提升学生的细节描写能力。让学生学会如何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细节来展现人物形象、烘托氛围、推动情节发展,使作文内容更加丰富饱满。

4. 强调逻辑思维,提升思辨能力

4.1 培养批判性思维

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组织辩论赛、讨论会等活动,让学生在交流中碰撞思想,提升思维深度。

4.2 加强逻辑推理训练

教授学生逻辑推理的基本方法,如因果推理、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等,并通过作文练习进行巩固。让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注重逻辑严密性,做到条理清晰、论证有力。

5. 读写结合,提升综合能力

5.1 加强阅读积累

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文章,特别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时评文章。通过阅读积累素材和灵感,丰富语言表达方式。教师可以制定阅读计划,定期检查学生的阅读笔记和心得体会。

5.2 注重写作实践

将阅读与写作紧密结合,让学生在阅读后及时进行写作练习。可以布置读后感、仿写、续写等任务,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写作能力。同时,教师应及时批改学生的作文,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反馈。

6. 多元化教学,激发写作兴趣

6.1 创新教学方式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如情境教学、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例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采访等活动,收集第一手资料用于写作;或者结合学校特色和文化活动,设计具有针对性的作文题目。

6.2 拓宽写作领域

鼓励学生尝试不同体裁和风格的写作,如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散文、诗歌等。通过多元化的写作练习,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和适应能力。同时,可以引导学生关注不同领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问题,拓宽他们的视野和思维空间。

三、结语

未来,高考作文命题趋势将继续保持其动态性与创新性。随着教育的不断深入与时代的不断发展,高考作文命题将更加紧密地联系现实生活与社会实际,引导学生关注时代变迁、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命题者还将继

续探索新的命题形式与评价标准,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全面发展要求。在高考作文命题趋势不断变化的今天,高中语文教师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通过紧跟时代脉搏、强化人文关怀、弱化宏大叙事、强调逻辑思维、读写结合以及多元化教学等一系列教学策略的实施,我们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然而,这些教学策略的落实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同时,我们还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高考作文教学的目标——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敏锐社会洞察力、独立思考能力和良好表达能力的未来公民。

参考文献:

- [1] 覃淋,彭甜甜,熊永君. 高考数学试题综合难度的比较研究——以 2021 年高考全国甲卷、[J]. [1]四川宜宾学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部, 2023.
- [2] 张志先.《2023 年高考作文命题综述及 2024 年命题趋势与备考策略》.《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参考)》
- [3] 《强化思维考查 注重语文实践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23》.《中国考试》
- [4] 董明实. 回归到写作应有的样子——2023 年全国新课标 II 卷作文题评析[J]. [1]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3.
- [5] 王本华,朱于国,汪锋,蔡可,倪文尖. 高考语文作文命题新启示——专家点评“老高考新课标卷”适应性测[J]. 中国考试, 2023.
- [6] 高凤元.《今年花胜去年红——评 2005 年高考作文题》.《中学文科》
- [7] 王鹏,徐壮,杨湛菲,等.《今年高考作文题折射出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 [8] 杨燕. 高中历史学科家国情怀素养的考查[J]. [1]长顺县民族高级中学, 2022.
- [9] 张小平. 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重要论述的生成之源、精髓要义与实践进路[J]. [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2023.
- [10] 闫会才. 掀起你的盖头来——2021 年高考作文研究与 2022 年高考作文[J]. [1]山东省青州一中东校区名师工作室, 2022.
- [11] 王本华.《关联教材, 引导教学应教尽教——高考语文试题在引导教学上的不断》.《语文建设》
- [12] 梅振铎. 高中作文审题思维支架搭建[J]. [1]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2023.

Thinking on the proposition trend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position

Weng xinyan¹, AZhu youran² Huang xinlan³

¹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position not only carries the function of testing students'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but also leads stud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chang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umanistic care and personal growth. In recent years, in view of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changing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setting trend of essay questions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undergoing a major transition and profound change. The cor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some significant evolution trends in the field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hinese composition, and further looks forward to its potential future evolution path, aiming to contribute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 frames to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strateg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position preparation.

Key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position; Set a proposition; tendency

父母教育水平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基于 CGSS 2021 的实证研究

于文丽^{1#} 牛雨谣^{2#*} 王一诺³ 葛蒲⁴ 张明晓⁵ 李奇遇⁶

(¹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²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41, ³北京大学, 北京 100191, ⁴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⁵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2500, ⁶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22)

摘要: 目的: 探究父母教育水平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

方法: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21 年数据, 筛选出 227 名大学生样本。控制性别、年龄、民族、学段、高中背景、高校层级、专业类别及家庭经济状况, 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 分别将英语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作为因变量, 评估了二者与父亲教育水平、母亲教育水平的关联强度。

结果: 回归分析显示, 父亲教育水平对大学生英语听力 (OR=1.52, $P=0.007$) 和口语能力 (OR=1.45, $P=0.015$) 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母亲教育水平对大学生听说能力的影响未达统计显著水平 (听力: $P=0.822$; 口语: $P=0.529$)。专科生的英语听力 (OR=0.16, $P<0.001$) 和口语能力 (OR=0.24, $P<0.001$) 均不如本科生。

结论: 本研究证实, 父亲较高教育水平显著提升高校在读生英语听说能力, 母亲教育水平影响不显著; 本科生听说能力显著优于专科生。该结果提示: 应基于智能教学平台, 将家庭文化资本差异与院校层级特征纳入数字化学情档案, 通过自适应技术为专科生及家庭资源不足学生提供个性化听说训练路径, 倾斜资源支持薄弱群体。研究为构建数据驱动的公平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依据, 揭示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性别差异, 对教育公平与外语人才培养具有新启示。

关键词: 父母教育水平; 英语听说能力; CGSS 2021; 大学生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49

1 前言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向纵深发展以及数字人文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 英语听说能力已超越传统语言技能范畴, 成为大学生参与国际科研合作、跨境文化交流和全球就业竞争的核心素养^[1]。依据《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要求, 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者应具备“用英语有效进行社会交际和学术交流”的能力。然而, 我国大学生群体仍深陷“聋哑英语”的结构性困境。基于全国性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 仅有不足 5% 的国民能实现英语无障碍听说^[2]。这种能力上的失衡不仅限制了个体的职业发展潜力 (例如减少了在外企的就业机会), 更与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高层次人才”战略目标存在显著差距。

尽管已有研究尝试探讨影响大学生英语能力差异的相关因素, 但在理论视角与实证深度上仍存在以下三方面显著局限: 第一, 研究重心多聚焦基础教育阶段的语言习得与家庭影响, 忽视了大学阶段作为“文化资本自主积累的过渡期”所具有的复杂性; 第二, 相关分析通常将英语能力作为一项整体指标, 未能区分听力 (输入性技能) 与口语 (产出性技能) 的分化机制; 第三, 父母教育水平虽被广泛用作文化资本的代理指标, 但其在代际传递中的性别化作用路径 (即父亲与母亲教育资本的影响差异) 尚缺乏系统检验。

本研究借助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构建分析框架, 进一步深化该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形态存在: 制度化资本 (如学历证书、学术资历)、具体化资本 (如文化藏品、教育资源) 与内化为生活习惯的文化素养。其中, 制度化文化资本更易获得教育体系认可与转化优势。在大学这一场域中, 对语言能力的评

价与回馈机制高度制度化,因此,父亲作为社会现状下家庭中通常掌控资源配置与外部拓展机会的主要角色,其教育资本更可能通过“制度化通道”(如海外交流、外语竞赛、国际课程等)影响子女英语能力,具备高等教育背景的父母更擅于识别优质语言教育机会(如国际暑期学校、在线外教课程),并通过经济资本转化实现选择性投入^[5]。而母亲教育资本则多表现为“生活化惯习”的传递,如早期语言陪伴、文化兴趣启蒙等,其影响力可能随子女进入独立教育环境而边际递减。这种文化资本的代际转移虽在基础教育阶段被部分证实^[6],但在高等教育的关键期,即大学生脱离原生家庭但尚未完成文化资本自主积累的过渡阶段,相关的实证研究仍存在空白。

本研究致力于解析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如何通过不同形态(制度化与生活化)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产生差异化影响的机制。聚焦核心问题:父母教育水平如何分别塑造在读大学生的英语听力能力与口语能力?基于CGSS2021数据库筛选的本专科生样本,构建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将听力能力与口语能力作为独立因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民族、院校层次、高中背景、专业类别及家庭经济状况等潜在混杂因素的基础上,系统检验父母教育层级对两项语言子能力的独立效应。研究成果将为破解“聋哑英语”困境提供关键认知突破:揭示父母教育水平对大学生听力能力与口语能力的差异化代际传递路径,并探明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群体在听说能力维度的特异性薄弱环节分布,为理解家庭文化资本在语言习得中的选择性渗透提供实证基准。

2 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于2021年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CGSS始于2003年,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该调查以中国公民为调查对象,运用面访模式对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信息进行连续性截面调查。CGSS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100个县级单位和5个大都市,具有良好的代表性。CGSS2021数据覆盖19个省320个社区,有效样本8148个(56.14%来自城镇,45.15%为男性,平均年龄51.6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9.20年,73.07%已婚)^[7]。本研究以在读本专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后,最终得到227个有效样本。

2.2 变量构建

2.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将受访者自评的英语听力与口语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这两项均源自CGSS2021问卷中对语言能力的主观评价项。

2.2.1.1 英语听力水平

本研究采用“您觉得自己听英语的能力是什么水平?”这一题项作为被解释变量英语听力水平的测量依据,该原始变量包含五级序次选项(1=完全听不懂,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很好)。为兼顾能力状态的连续性与分类解释力,将选项重构为三类有序变量:“差”(含“完全听不懂”与“比较差”)、“中”(对应“一般”)、“好”(含“比较好”与“很好”)。

2.2.1.2 英语口语水平

本研究采用“您觉得自己说英语的能力是什么水平?”这一题项作为被解释变量英语口语水平的测量依据,该原始变量包含五级序次选项(1=完全不能说,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很好)。为兼顾能力状态的连续性与分类解释力,将选项重构为三类有序变量:“差”(含“完全不能说”与“比较差”)、“中”(对应“一般”)、“好”(含“比较好”与“很好”)。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取CGSS2021问卷中父母教育水平的相关问题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相关的两道题目为:“您父亲/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原始变量采用十三级分类选项(1=没有受过任何教育,2=私塾/扫盲班,3=小学,4=初中,5=职高,6=普高,7=中专,8=技校,9=成教大专,10=全日制大专,11=成教本科,12=全日制本科,13=研究生)。为提升类别解释力并符合中国教育体系层级特征,将其重构为五类有序变量:“1=小学及以下”(含原始1-3类)、“2=初中”(对应原始4类)、“3=高中阶段教育”(合并原始5-8类)、“4=大专”(整合原始9-10类)、“5=本科及以上”(涵盖原始11-13类)。

2.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在回归模型中控制八类潜在混杂变量: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男性,女性)、年龄(连续变量)、民

族（汉族，少数民族）；教育背景涵盖在读学段（大专，本科）、是否毕业于省级重点高中（是，否）、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是，否）；专业与经济因素包含所学专业类别（理工农医，非理工农医）及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用均数 $\pm$ 标准差描述。分别运用单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和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父母教育水平对在读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检验水准为双侧检验 $\alpha=0.05$ 。

3 结果

3.1 受访者的一般特征

227 名受访者年龄范围为 18-25 岁，年龄均数 $\pm$ 标准差为 20.56 $\pm$ 1.323，受访者其余一般特征详见表 1。

表 1 受访者一般情况及英语听说能力

变量	n (%)	变量	n (%)
性别		母亲学历	
男性	104 (45.81)	小学及以下	67 (29.52)
女性	123 (54.19)	初中	70 (30.84)
民族		高中阶段教育	51 (22.47)
汉族	199 (87.67)	大专	19 (8.37)
少数民族	28 (12.33)	本科及以上	20 (8.81)
在读学段		家庭经济状况	
大专	43 (18.94)	低于当地平均水平	43 (18.94)
本科	184 (81.06)	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	184 (81.06)
是否毕业于省重点高中		英语听力水平	
是	36 (15.86)	差	69 (30.40)
否	191 (84.14)	中	110 (48.45)
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 其他部委所属高等院校		好	48 (21.15)
是	18 (7.93)	英语口语水平	
否	209 (92.07)	差	93 (40.97)
专业		中	100 (44.05)
理工农医	140 (61.67)	好	34 (14.98)
非理工农医	87 (38.33)		
父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	38 (16.74)		
初中	87 (38.33)		
高中阶段教育	55 (24.23)		
大专	23 (10.13)		
本科及以上	24 (10.57)		

3.2 受访者的英语听说能力现状及单因素分析结果

受访者英语听说能力现状详见表 1，单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显示，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与性别、在读学段、是否毕业于省重点高中、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其他部委所属高等院校、父亲学历、母亲学历有关；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与性别、在读学段、父亲学历、母亲学历有关（见表 2 及表 3）。

表 2 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相关因素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单因素	多因素
----	-----	-----

	β	S.E	t	P	OR(95%CI)	β	S.E	t	P	OR(95%CI)
性别 (以男性为参照组)										
女性	0.55	0.25	2.18	0.029	1.74 (1.06 ~ 2.86)	0.43	0.28	1.56	0.118	1.54 (0.90 ~ 2.66)
民族 (以汉族为参照组)										
少数民族	0.50	0.39	1.29	0.197	1.65 (0.77 ~ 3.53)	0.71	0.41	1.72	0.085	2.03 (0.91 ~ 4.57)
在读学段 (以本科为参照组)										
大专	-2.13	0.37	-5.72	<0.001	0.12 (0.06 ~ 0.25)	-1.84	0.39	-4.73	<0.001	0.16 (0.07 ~ 0.34)
是否毕业于省重点高中 (以否为参照组)										
是	0.74	0.35	2.12	0.034	2.09 (1.06 ~ 4.12)	0.17	0.39	0.43	0.667	1.18 (0.55 ~ 2.51)
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其他部委所属高等院校 (以否为参照组)										
是	1.11	0.48	2.32	0.020	3.03 (1.19 ~ 7.76)	0.31	0.55	0.56	0.574	1.36 (0.46 ~ 4.04)
专业 (以非理工农医为参照组)										
理工农医	-0.15	0.26	-0.59	0.556	0.86 (0.52 ~ 1.42)	-0.02	0.28	-0.06	0.955	0.98 (0.56 ~ 1.72)
家庭经济状况 (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为参照组)										
当地平均水平或以上	0.15	0.32	0.47	0.635	1.16 (0.62 ~ 2.17)	-0.02	0.34	-0.06	0.954	0.98 (0.50 ~ 1.91)
父亲学历	0.52	0.11	4.67	<0.001	1.68 (1.35 ~ 2.09)	0.42	0.15	2.69	0.007	1.52 (1.12 ~ 2.05)
母亲学历	0.35	0.10	3.36	<0.001	1.42 (1.16 ~ 1.75)	-0.03	0.14	-0.23	0.822	0.97 (0.73 ~ 1.28)
年龄	0.01	0.09	0.16	0.874	1.01 (0.85 ~ 1.21)	-0.00	0.10	-0.02	0.980	1.00 (0.82 ~ 1.21)

表3 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相关因素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单因素					多因素				
	β	S.E	t	P	OR(95%CI)	β	S.E	t	P	OR(95%CI)

性别 (以男性为参照

变量	单因素					多因素				
	β	S.E	t	P	OR(95%CI)	β	S.E	t	P	OR(95%CI)
组)										
女性	0.57	0.26	2.24	0.025	1.77 (1.07 ~ 2.93)	0.49	0.28	1.75	0.081	1.62 (0.94 ~ 2.80)
民族 (以汉族为参照组)										
少数民族	0.22	0.39	0.57	0.568	1.25 (0.58 ~ 2.67)	0.33	0.42	0.80	0.423	1.40 (0.62 ~ 3.17)
在读学段 (以本科为参照组)										
大专	-1.75	0.38	-4.60	<0.001	0.17 (0.08 ~ 0.37)	-1.44	0.40	-3.63	<0.001	0.24 (0.11 ~ 0.51)
是否毕业于省重点高中 (以否为参照组)										
是	0.45	0.35	1.27	0.204	1.56 (0.79 ~ 3.11)	-0.02	0.38	-0.06	0.950	0.98 (0.46 ~ 2.07)
是否就读于中央或国家其他部委所属高等院校 (以否为参照组)										
是	0.58	0.48	1.21	0.226	1.78 (0.70 ~ 4.53)	-0.39	0.55	-0.71	0.479	0.68 (0.23 ~ 2.00)
专业 (以非理工农医为参照组)										
理工农医	-0.33	0.26	-1.26	0.207	0.72 (0.43 ~ 1.20)	-0.25	0.28	-0.89	0.371	0.78 (0.44 ~ 1.35)
家庭经济状况 (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为参照组)										
当地平均水平或以上	0.52	0.33	1.57	0.117	1.68 (0.88 ~ 3.22)	0.38	0.36	1.06	0.291	1.46 (0.72 ~ 2.93)
父亲学历	0.50	0.11	4.43	<0.001	1.64 (1.32 ~ 2.05)	0.37	0.15	2.44	0.015	1.45 (1.08 ~ 1.96)
母亲学历	0.38	0.11	3.60	<0.001	1.47 (1.19 ~ 1.81)	0.09	0.14	0.63	0.529	1.09 (0.83 ~ 1.44)
年龄	0.02	0.09	0.24	0.812	1.02 (0.85 ~ 1.22)	-0.01	0.10	-0.11	0.911	0.99 (0.81 ~ 1.20)

3.3 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以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为因变量的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 在读学段、父亲学历为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的影响因素, 相较于在读学段为本科的受访者, 在读学段为大专的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相对较差 ($P < 0.001$, $OR=0.16$, $95\%CI 0.07 \sim 0.34$), 父亲学历水平越高, 受访者英语听力水平越高 ($P=0.007$, $OR=1.52$, $95\%CI 1.12 \sim 2.05$); 以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为因变量的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 在读学段、父亲学历为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的影响因素, 相较于在读学段为本科的受访者, 在读学段为大专的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相对较差 ($P < 0.001$, $OR=0.24$, $95\%CI 0.11 \sim 0.51$), 父亲学历水平越高, 受访者英语口语水平越高 ($P=0.015$, $OR=1.45$, $95\%CI 1.08 \sim 1.96$), 具体详见表 2 及表 3。

4 讨论

4.1 受访者英语听说能力现状

本研究发现, 受访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呈现显著的金字塔式分布结构, 且存在口语能力系统性滞后于听力能力的典型特征^[8]。听力自评达到“好”水平者仅占 21.15%, 近半数 (48.45%) 处于中等水平, 而 30.40% 自评为“差”;

口语能力方面的表现更为薄弱, 自评为“差”者达 40.97%, 中等水平占 44.05%, 仅有 14.98% 达到“好”水平。这种“接收性技能(听)显著优于产出性技能(说)”的失衡结构, 印证了外语教育领域长期关注的“聋哑英语”现象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延续性^[9]。其深层根源在于输入输出机制的断裂——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说指出, 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的质与量不足将直接制约输出能力发展, 而当前中国英语课堂仍以单向知识传授为主, 学生缺乏足量情境化输出实践^[10]。

值得注意的是, 英语听说能力高水平群体比例严重不足。英语听力达“好”者(21.15%)与英语口语达“好”者(14.98%)均远低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高等教育阶段“能有效参与社会交际”的要求(等效 CEFR B2 级)^[11]。这一缺口折射出教学目标的深层偏离: 现有课程体系受应试惯性束缚, 四六级通过率导向导致教学资源向笔试能力倾斜, 老师与学生均对四六级口语考试重视不足, 口语训练被严重边缘化, 这致使中国大学生在国际化学术交流中呈现集体性“失语”。这种能力结构失衡与国家“培养全球胜任力”的战略目标形成尖锐冲突——全球化人才需具备跨文化协商能力, 而当前可能有超 70% 大学生的口语水平难以支撑基础学术对话^[12]。

4.2 父母教育水平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

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显示, 父亲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听力 $OR=1.52, P=0.007$; 口语 $OR=1.45, P=0.015$), 而母亲教育水平的影响未达统计显著性。这一差异本质源于家庭代际传递的性别化资本转化机制。

首先, 结合中国家庭常见的“严父慈母”结构性分工模式^[13], 父亲往往在资源配置与外部社会连接中扮演主导角色, 其高学历更易转化为可制度化的教育资源与实践平台。例如, 父亲的职业网络可能带来国际实习、外语竞赛等“制度化实践场域”, 直接提高子女的英语应用机会和语言实践频率, 从而提升其听说能力。

相较之下, 母亲教育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学前阶段的生活化文化惯习渗透。母亲的高质量语言陪伴(如双语绘本共读、日常会话引导)对学龄前儿童语言发展具有奠基作用, 建构“语言敏感性”与“语用兴趣”, 但该效应可能集中于儿童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 在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阶段呈现场域适配性衰减^[14]。加之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结构, 母亲积累的文化资本(如语音敏感性培养、跨文化兴趣启蒙)更倾向于转化为情感支持与学习态度培养, 因难以转化为高校所需的制度性认证资本(如学术交流证书、国际竞赛奖项), 其影响力被结构性弱化。

父母教育影响的差异化格局印证了布迪厄资本理论的预见性: 文化资本向子代能力的转化效率取决于资本形态与受体场域的符号匹配度^[15]。父亲的教育资本更可能外显为可迁移的制度性凭证(职业平台、国际认证资质), 天然契合高等教育场域对标准化能力的考核需求; 而母亲的教育资本常内化为情感性惯习(学习态度塑造、审美品味培育), 在强调实证能力的大学环境中遭遇符号贬值。这要求后续研究构建双轨观测体系: 对父亲教育聚焦资源可及性指标(如国际课程密度、实践平台参与度), 对母亲教育则需开发互动质量量表(如元语言意识培养频率、批判性对话深度)。这也提示当前高校英语教育改革应重点建立低学历父亲家庭学生的制度性资本补偿机制。

4.3 在读学段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

两个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均显示, 在读学段为大专的受访者其英语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均低于本科受访者(听力 $OR=0.16, P<0.001$; 口语 $OR=0.24, P<0.001$)。这一差距本质体现我国高等教育分层机制——本科院校通过高考分数筛选吸纳更优质生源^[16]。高考英语成绩作为高校核心录取指标, 直接反映学生语言基础差异^[17]。同时, 本科院校的英语教学资源投入、师资配比及国际交流机会显著优于专科院校, 进一步扩大既有能力鸿沟^{[18][19][20][21]}。

4.4 研究优势与局限性

研究优势方面, 本研究首次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CGSS2021)探究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对高等教育阶段英语听说能力的差异化影响, 填补了既有研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实证空白。在理论层面, 创新性地解构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双路径传递机制——通过区分听力与口语能力作为独立因变量, 并分别检验父母教育水平的独立效应, 提出了父亲教育资本通过制度化资源转化(如国际实践平台)、母亲教育资本通过生活化惯习渗透(如语言互动质量)的差异化作用路径假说, 为破解“聋哑英语”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了机制性解释。方法学上, 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系统控制性别、院校层次、高中背景等八类混杂因素, 确保父母教育水平净效应的可靠性; 同时将父母学历重构为符合中国教育分层特征的五级变量, 显著提升类别解释力与本土适配性。

研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 样本规模受限($n=227$), 尤其父母高学历组(本科及以上父亲占 10.57%, 母亲占 8.81%)样本量较小, 可能导致统计检验力不足, 对母亲教育水平未达显著性的结论需谨慎解读。其二,

英语听说能力依赖自评数据,存在主观判断偏差风险;未来研究可结合标准化测试(如英语四六级口语成绩)或情境化行为评估提升效度。其三,未控制学生个体语言学习投入(如课外英语接触时长)及高校教学因素(如英语课程类型、外教比例)等变量,后续需进一步研究。

5 结论与建议

父亲教育水平对在校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母亲教育水平的影响则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本科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显著优于专科大学生。这一结果提示,家庭中父亲的教育背景可能通过特定途径(如获取更优质的语言教育资源或机会)对子女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听说能力发展产生关键作用。

基于制度化与生活化路径对英语能力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本研究提出以下实践建议。第一,高校端精准支持,建议高校构建“家庭文化资本识别机制”,通过学情档案识别低学历父亲家庭学生,为其补足专项语言实践资源,如提供“国际学习实践基金”或参与“跨文化沟通训练营”的机会等,补偿其制度化资源劣势。第二,家庭端功能强化,倡导开发家长端语言教育 App 或数字平台,引导母亲等主要陪伴者通过“影子教育”模式(如陪听英文音频、共读新闻播报)提升家庭隐性语言输入频率,延长母职教育资本的影响周期,为子女打下扎实的听说基础并激发兴趣。第三,政策端结构优化,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加大对中低文化资本家庭的普惠性外语教育资源投放,拓展农村与中小城市区域学生的数字英语应用平台接入,避免英语能力分化进一步固化社会阶层差异。

参考文献:

- [1]何莲珍.新时代大学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J].外语界,2019,(01):8-12.
- [2]谭远发,王恬,周云.英语听说能力对就业性别差异的影响——来自 CGSS2013 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2017,(10):122-132.
- [3]袁晓云.城乡中学英语教育差距的对比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 [4]张慧玉,吴婷.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国民英语能力历时比较研究[J].外语界,2020,(06):70-78.
- [5]刘国辉,张卫国.中国城镇居民英语能力的经济回报率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06):108-114.
- [6]郑妍妍,周昕,吴书瑶.全球化与学英语的回报——来自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06):95-104.
- [7]祝伟,刘松,王瑞梅.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 CGSS2021 数据的实证研究[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24,42(03):689-697.
- [8]高永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02):71-78+146.
- [9]黄志成,潘建平.中日韩三国“哑巴英语”教育状况的因素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1,38(08):5-8.
- [10]罗禹涛.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41(27):59-61.
- [11]刘建达.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J].中国外语,2019,16(03):1+11-12.
- [12]黄雯怡.基于全球胜任力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路径探析[J].中国大学教学,2023,(12):56-62.
- [13]景春兰.发展权视角下夫妻财产知情保障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05):121-128.
- [14]杨帆,张义宾,周兢.中国家庭母亲语言输入特征及其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3):68-76.
- [15]刘永兵,赵杰.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外语教育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社会学视角[J].外语学刊,2011,(04):121-125.
- [16]李芳.新中国高考公平 70 年:国家意志与个体发展有机统一之路——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重庆高教研究,2019,7(06):25-37.
- [17]乔辉.高考英语改革的进展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8,38(03):126-131.
- [18]钟艳.试谈专科英语教学向本科英语教学的三个转变[J].西昌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4):68-70.
- [19]刘宓.分级教学改革对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的影响[J].学理论,2010,(15):229-230.
- [20]游雅婧.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J].大众标准化,2020,(04):225+227.
- [21]李小艳.影响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因素及对策研究[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4,(19):125+127.

The Effect of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on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 2021

Wen-li Yu^{1#} Yu-yao Niu^{2**} Yi-nuo Wang³ Pu Ge⁴ Ming-xiao Zhang⁵ Qi-yu Li⁶

¹Jilin Sport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²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³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⁴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⁵Weifang Nursing Vocational College, Weifang 262500, China

⁶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Method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21, 227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selected.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employed,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ge, ethnicity, education stage, high school background, university tier, major category, and family economic status.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levels were separately analyzed as dependent variables to assess their association with father's and mother's education levels.

Result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OR=1.52, $P=0.007$) and speaking abilities (OR=1.45, $P=0.015$). The impact of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istening: $P=0.822$; speaking: $P=0.529$).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OR=0.16, $P<0.001$) and speaking abilities (OR=0.24, $P<0.001$) were significantly inferior to undergraduates.

Conclusion: Higher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university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while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shows no significant impact. Undergraduates outperform college students in both abilities.

Keywords: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CGSS 2021; University student.

#These authors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Corresponding author.

以融促荣：青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贵州路径

廖家骏¹

(1.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贵州省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省份之一，以“多元一体”理论为基础，以贵州省为案例，重构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框架探索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路径。研究结合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十二个必须”要求与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指示，构建“政策支持—文化赋能—青年参与”三维协同机制。形成了“国家意志与青年动能同频共振”的治理范式。这一路径不仅为多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贵州样板”，强调了青年的作用与贡献，更揭示了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核心逻辑——在尊重多元中强化一体，在激活个体中凝聚共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深层文化凝聚力与青春行动力。

关键词：青年；思政教育；“十二个必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融合发展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50

2022年7月29日至3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精炼总结并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十二个必须”，^[1]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十二个必须”重要思想高屋建瓴，它对不同社会群体提出了明确任务要求。贵州省是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共同繁荣复兴的重要承载地。2024年，贵州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奋力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模范省目标提出以来，贵州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教育的典范、西部省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典范、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典范、民族交融互嵌的典范、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典范“六个典范”。^[2]2025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指出：“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3]足见党中央与政府对贵州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法，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民族工作的指示，对贵州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意在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结合新时代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十二个必须”，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探究并总结贵州省在民族统战工作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成效与经验，即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贵州路径？并由此总结凝练出当代青年该如何在新时代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使命的这一时代命题，即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青年因素？

一、路径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贵州实践

“共同体”这一概念，自古以来有众多学者尝试研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受到中国学者的深入探讨，无论是从历史政治学抑或是田野政治学，各种研究范式正不断在这个主题上提出或创新新的命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诞生于中国文化与传统，因此我们要从中国大地上的实践入手，首先剖析概念的内涵，而后尝试从贵州实践中发现创新路径。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共同体”概念源于古希腊雅典城邦统治理念，在基于前人众多对于城邦统治的概念后，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共同体”概念，并着重研究了作为政治共同体城邦的产生、性质与目的。古代对于共同体

的探讨基本上收到城邦以及神权思想的影响,而进入现代领域,滕尼斯、鲍曼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共同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滕尼斯,19世纪,社会经济产业形态正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他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用二分法的概念阐释了两种社群互动融合的场景类型:共同体和社会。在滕尼斯的分类中,“共同体”(Gemeinschaft)是以土地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而“社会”(Gesellschaft)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而马克思则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其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其中写道:“它是从各个真正的个人的观点出发的,那个离开了个人就会引起他反抗的共同体才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实质。”^[4]这与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建构的“货币共同体”形成明显的对比,展现出马克思对于“虚假的共同体”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内核,成为了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支撑。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核很大程度上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概念进行建构,都是强调“共同体”中的联合性以及过渡性。进入现代,本尼迪克特在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是“想象的有限主权共同体”,它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标准语言、历史记忆而建构,这一理论研究也进一步开拓了民族的建构主义范式。在以上这两个方面,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延续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愿景,融合中国“大一统”政治传统,也同样回应了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的建构性,但更相较于其研究结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扩性更强,强调历史实践根基。

而从中国的传统话语以及历史记忆出发,“中华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1902年4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文:“齐,海者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5]由此,“中华民族”一词便进入了国人的视野。1988年,费孝通先生便提出“多元一体”理论,将中华民族结构解构为“多元”民族单位与“一体”整体格局的动态平衡,这一观点也成为了后续“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与前提。而就文化与政治基因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古代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延续,《尚书·禹贡》中“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6]便从自然观中描述了这一场景,通过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地理构建,直观展现出中国的天下概念。在“天下观”的影响下,中国经过历次的朝代更迭中,“大一统”的观念也逐渐深入,并不断在政治领域传播扎根,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但这样的天下观,并不是所谓的集权与固化,而是一种包容。学者赵汀阳曾指出,中国的天下观念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体现,其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是一种普世价值,如果中国真的发达了,也不会称霸,而将更有实力去化敌为友。^[7]这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价值思想与精神。因此,基于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是大一统历史、和而不同文化与天下观念理论的集合,其核心在于通过多元一体的结构、共同价值的建构以及历史实践的延续,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与人类共同繁荣的愿景。在厘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核后,必须直面一个关键命题:抽象的价值共识如何转化为具象的地方实践?青年群体该如何从中汲取智慧:破除隔阂,凝聚认同,最终将“贵州路径”转化为“青春答卷”?

(二) 贵州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重构

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揭示了中华民族结构文化多元性,而2021年,贵州省内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4050266人,占36.44%,^[8]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省份之一,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场域。贵州省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理念,将“多元一体”转化为“政策一体、文化多元、青年参与”的具体路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地方样本。本文在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国家-社会-个人”为内在逻辑,构建“政策支持-文化赋能-青年参与”协同下青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贵州路径。

首先,从政策支持的国家视角出发。国家的统筹,政策的统一调度,是行动的重要指引。在多元民族相融合的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有包容各民族文化与特性的政策,同时也少不了国家这一宏观视角的统一民族政策的引导。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宏观区域政策是指导,地方区域政策是基础,二者应相互制约和补充。中央政策的调控权力与地方政策的调整权力需要实现一个平衡与稳定。^[9]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27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本单位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10]在中央指示下,国家民委着力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进行细致部署,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多民族聚居融合区域提供支持。着眼于贵州,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民族政策协同体系展现出一种适度的平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年参与与青年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底。青年参与到民族工作需要中央政策的引导,同时也需要地方政策的保护与支持。为建设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贵州省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实施方案》于2022年底出台,提出31条具体任务和4条保障措施,并明确责任单位和任务清单。在国家意识与地方

支持的双重效应下,贵州青年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主体,通过微观个体间的互动效应,对意识与政策进行下放性、落地性行动。贵州医科大学青马宣讲团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队通过强化宣讲队伍、优化宣讲内容、强化宣讲实践、创新宣讲形式等形式,在贵州乃至全国范围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宣讲。^[11]我们不难看出,在国家视角下,中央与地方政策互动的双重效应下,青年能够有能动性地参与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去。在中央政策的稳定性指引下,贵州省委省政府着眼于地方实际,强化引导,将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有机结合,通过“政策清单+责任矩阵”的精准对接机制,确保中央政策精神在民族地区有效转化。在《贵州省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实施方案》框架下,贵州青年以“政策践行者”与“文化传承者”的双重角色,依托“理论宣讲+社会实践+数字赋能”的行动路径,将共同体意识融入基层治理、文化传播与民生服务。中央政策的“全局性导航”与地方政策的“在地化适配”,共同形塑了多民族地区青年参与民族工作的中国范式。贵州实践表明,唯有在政策协同中实现“国家意志”与“青年动能”的同频共振,方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治话语转化为具体场景中的情感认同与实践自觉,为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注入可持续的青春力量。

其次,从文化赋能的社会视角出发。符号互动论的代表性学者乔治·米德认为个人的自我形成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通过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而产生的,这可以解释个体如何在群体中形成自我认同,以及如何根据群体内外的他人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and 态度。^[12]少数民族同胞的个体意识建构于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贵州是少数民族人民聚居的重要地区,在这一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区域,少不了各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习俗,这类习俗、仪式、节庆等便是一种符号,根据符号学的理论,任何一个符号都包括“能指”和“所指”。“能指”是符号外在的可感形式,“所指”则是符号内在的意义。^[13]在这其中,“能指”表现为各民族的民族划分,而“所指”便是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在国家视角下的政策引导下,社会视角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往往体现在文化的延续与传播,而青年是每个时期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主力军。诗歌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2019年,20余名贵州少数民族诗人齐聚贵阳召开以“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为主题的贵阳诗歌沙龙研讨会,会议达成的重要共识便是少数民族诗歌需要青年传承。^[14]传统节日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习俗的体现,无论是“六月六”这一布依族传统的“孝亲节”还是苗族跳花节,都逐渐受到青年的追捧,并在自媒体上进行广泛地传播,少数民族节庆符号,也由此受到关注。每四年一届的贵州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也是贵州各少数民族齐聚一堂,共襄盛会的时刻。歌舞晚会仪式背后离不开青年人对于艺术创作与形式的理解。而少数民族歌舞晚会,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强烈传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中起到关键作用。青年有其独特的时代性,同时也有新奇的视野。文化视野下的青年行动聚焦于文化符号的深度阐释与活态传承。贵州青年通过跨民族文化交流实践,将传统节庆、手工艺、歌舞等文化符号转化为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载体。当文化符号在青年群体的创造性实践中被重新赋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获得了扎根生活的生命力。贵州青年以文化为媒,在节庆共舞、手工艺传习、诗歌互鉴的具象场景中,既守护着各民族文化的“基因密码”,又编织出共享的价值图景。这种通过文化互动实现的认同建构,使共同体意识超越了抽象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传承的集体记忆,为多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注入了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内生动力。

最后,从青年参与的个体视角出发。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参与者,青年群体需要通过树立多元身份意识,将个人的独特性与群体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多元身份意识的建立,能够让青年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在个体与群体之间架起桥梁。树立多元身份意识,引导人心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需要符号传播,使优秀文化浸润人心。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在于宣传。因此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青年群体的广泛宣传。宣传的目的是建立党和国家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信关系,使得党的思想能够深入人心,发挥重要法宝的作用。而思想的传播需要有文化作为重要载体。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暨南大学时勉励全体暨南大学学子与教职工,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15]青年群体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着力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积极民族意识浸润人心。贵州大学生团队在湄潭县平顺坝苗寨,青年宣讲团通过“多民族宣讲+文化展演”形式,将苗族婚俗、花苗刺绣等传统符号与现代民族团结理念结合,^[16]使抽象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具象的文化实践。在做好舆论铺垫后,民族间的互动与良好关系,是青年群体需要考虑的社会体系问题,因此关系缔结是青年的第二个任务,通过包容胸怀感化人心。“包容性发展”是贵州这一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发展的重要模式。^[17]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乐善好施和助人为乐的传统基因,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美好财富。在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往往通过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与紧密血缘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帮助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通过志愿服务和跨民族互动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以此来消弭少数民族与外界的文化边界,从而实现文化融合,进而实现共同体意识的融合。2023年,在观山湖民族大联欢广场,2023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暨贵州民族大联欢盛会的举行,通过侗族大歌、安顺地戏等展演,构建了“民族共融”文化空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体的社会氛围和互惠的民族关系网络建立完成后,青年需要进一步做好情感维系工作。做本质上就是为了维系共

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对话,推动认同内化、保护共同记忆,而不掺杂对资本与物质的依赖。这就要求我们以开阔的胸怀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实现共同体成员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认同与回归。要成为好朋友,以实际行动温暖人心。“做好新形势下工作,必须善于联谊交友。联谊交友是工作的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18]习近平总书记通俗形象地概括了党的工作的内容,也是对实现民族和谐共生的重要指示。这就要求新时代青年不能拘泥于理论或生活在思辨的世界中,而是要踏入实践的大地,与各族人民面对面交往,从而形成心与心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不仅仅是思想的对话,同时也是相互之间理解的深化,在理解中达成共识,在共识中凝聚人心。

贵州实践深刻诠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创新,以政策协同夯实制度根基,以文化符号重构认同纽带,以青年动能激活治理末梢。这一实践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进行协同合作,同时与地区发展实际相结合,以实现最大合力。

二、要素嵌入:贵州路径下的青年实践

由此可见,青年是肩负历史使命的时代新人与中坚力量。在如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了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所有中华民族儿女应该履行的职责。在贵州路径的实践下,形成了青年参与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路径。

(一) 青年的国家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局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和国家立足于当下实践,富有创见性地提出的统战理念,也为当代青年思考党的统战问题提供新思路与新导向。在宏大命题下,我们该如何认识并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大局观念,强化自身的共同体意识?以下两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考。

其一,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新时代青年学习历史、运用历史,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来认识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与要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于同样的历史环境、萌芽于共同的历史根基、秉持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塑造着共同的历史脉络。竹简绢帛,记录着共同的历史过往;诗词歌赋,传诵着共同的未来期望。悠悠华夏,古往今来,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脉,为各族人民如何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二,从实践的维度出发。新时代青年深入实践、把握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9]在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研判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党和国家的实践需要,是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强大张力,在与实际情况不断适应与协调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规律,实现新时代各民族融合发展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新的理论意味着新的形势,积极学习与认识党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任务要求,才能更好地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局意识。

(二) 青年的社会意识: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家亲的社会关怀

“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就要紧密团结各民族同胞,相互包容、相互理解。作为青年对民族一家亲有深刻的深刻认识与社会关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一家亲”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求同存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而兴。这就意味着作为青年,面对共同体成员时不仅要有高瞻远瞩的格局与眼界,还要有对共同体成员开放包容的胸怀与心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20]其中蕴含着富有智慧的思想。青年如何培养对各民族同胞的社会关怀意识?首先在于认识问题,青年群体应该着眼于问题的积极方面,从积极层面切入,认识问题、看待问题,并在思考与实践中,将问题中消极层面的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其次在于处理问题,每个人生来独特是客观实际使然,但吾辈青年可为寻找共识而努力,解决矛盾与分歧最好的办法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妥协与让步,而是积极主动地沟通与协商,关怀从来都不是被动产生的,能打动内心的只有真挚坦诚的沟通;最后在于总结问题,当思想碰撞的激情慢慢退去,产生的思想成果往往值得总结与思考,消极的意义可以留待考察,积极的意义值得发扬传播,经过不断总结与积累,便能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民族工作思想,由此造就党的民族工作理论沃土。薄冰难以支撑共同体的理想与展望,能做到的往往是形成沃土,而沃土的培育,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群体耕耘与呵护,施以“关怀”的肥料,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海内外华夏儿女心中茁壮成长。

(三) 青年的微观价值:对凝聚人心与汇聚力量的个体期待

做好民族工作,就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的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小单位,便是共同体内的不同个体,个体之间的互动最基本的体现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青年群体首先坚持的是人的本位观,我们需

要意识到,在人民立场上与共同体成员进行交流沟通,以人为基本出发点。“人”的立场与基础地位意识建立后,则有利于进一步培育和谐团结的交往氛围,氛围的营造为接下来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而实现文化互融互嵌,实现党的统战工作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局观以及社会关怀意识,成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的精神前提与动力。青年人在微观的视角观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运作与行动时,应该具备的素养或许并不是共同体的宏观理想,或者是社会关怀的中观展望,更多的可能是对于统战工作所发挥的强大的凝聚人心的期待和汇聚力量的展望。作为青年,在高瞻远瞩的格局中,也要始终牢记自身所处的位置,将个体期待化为实际作为,助力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

三、未来展望:青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为担当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本质要求。青年作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坚力量,为实现共同体成员人心的凝聚和力量的汇聚,应该有怎样的担当?青年要有承担起统战工作任务的主动性,才能将统战理论外化于行,以实现统战理论的落地落实。结合上述讨论,对青年如何更好地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有以下方面的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做好统战工作需要把握的“四个关系”。^[21]针对“四个关系”,青年人应该如何学习并且用好“四个关系”?如何将“四个关系”与自身社会身份与职责相结合?回答这个问题,青年首先要找准自身定位。首先,所有青年群体应意识到自身身份首先是“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22]青年群体在自身社会定位之上,首先要以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政策思想为指导,根据身处的不同环境,将内在的理论素养外化为实际行动。

(一) 青年干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主体

作为青年干部,树立“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意识是首要任务。在巩固意识的基础上要脚踏实地,躬耕于所服务的广阔土地,紧密团结身边的同胞,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问题,同时,切忌急功近利,认识到统战工作不仅仅要注重显绩,还要把握潜绩。

(二) 青年学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化主体

作为青年学者,首先要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将党的民族和谐融合发展政策深入贯彻到教学一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号召教师群体,“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23]使统战理论不断传承,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传播。与此同时,青年学者要积极创新发展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将论文写在广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土地上,真正了解同胞的需求,也要在调研与思考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避免产生偏颇的观点,在“扬弃”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为丰富统战理论、民族理论做出贡献。

(三) 青年学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承主体

作为青年学生,我们应该树立远大理想信念,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核。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24]青年学生要努力学习理论知识,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正确理解党和政府进行统战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积极且及时回答共同体成员内部产生的疑问,在固守圆心的基础上扩大共识。

人心的凝聚为民族的凝聚的精神基础,青年人需要认识到的是:我们该如何将丰富的精神认同财富转化为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立足于唯物史观来指导实际行动。这个问题的基本脉络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字:把握历史,书写新篇。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中,恩格斯强调:“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25]共同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根基,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增强自身实力的目的,是为了将个人发展目标与共同体发展共识相契合,进一步而言,是为了将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与共同体伟大目标理想相匹配,提升自身实力与话语权。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强化力量建设,不仅仅要单向度单方面地进行,更要注重协同发展,青年群体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基本单位,在个体层面需要打好根基,在日常的交往与实践过程中,坚持互帮互助,以建构共同利益为切入点,以塑造共同价值为目标,最终上升为一种普遍的中华民族认同。只有这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历程中才能留下光辉的一笔,在这一笔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对

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叙事。在历史客观叙述和自身实力提升的双重加持下,我们才能够将共同体成员的人心动力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力量。

结 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坐标下,贵州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索出“政策支持—文化赋能—青年参与”的协同路径,为多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创新范式。这一实践表明,贵州路径以青年为枢纽,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认知悬浮”、文化赋权消弭“认同隔阂”、青年行动激活“治理末梢”,实现了“国家意志”与“青春动能”的同频共振。其核心启示在于:唯有在尊重文化多元中强化价值一体,在激活个体参与中凝聚集体共识,方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于时代脉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深沉的文化凝聚力与澎湃的青春行动力,更以“贵州样板”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东方智慧的实践答案。

参考文献:

- [1] 求是网. 12 个必须!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EB/OL]. (2022-07-31)[2025-03-30].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2-07/31/c_1128878407.htm.
- [2] 贵州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贵州着力推进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EB/OL]. (2024-03-08)[2025-03-29]. https://www.guizhou.gov.cn/home/gzyw/202403/t20240308_83900174.html.
- [3] 在贵州考察时强调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蔡奇陪同考察[N]. 人民日报, 2025-03-19(1).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88.
- [5]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1.
- [6] 尚书正义: 卷六[M]// 阮元, 校刻. 十三经注疏 (一): 清嘉庆刊本. 影印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23.
- [7] 赵汀阳. 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10): 57-65+5.
- [8] 中国新闻网. 贵州有各少数民族人口 1405.03 万人 10 年增加 150.23 万人[EB/OL]. (2021-05-25)[2025-03-29].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5-25/9485402.shtml>.
- [9] 李含琳, 范鹏. 论西部大开发中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协调[J].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00(3): 6-12.
- [10] 求是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EB/OL]. (2023-10-27)[2025-03-29].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1/31/c_1130069364.htm.
- [11] 贵州医科大学. 天眼新闻 (2025.03.21) 贵州医科大学“青骑兵”: “四化八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EB/OL]. (2025-03-21)[2025-03-29]. <https://www.gmc.edu.cn/info/1059/28262.htm>.
- [12] 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154.
- [13] 吴玉军. 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5(1): 48-53.
- [14] 中国作家网. 20 余名贵州少数民族诗人齐聚贵阳召开研讨会 少数民族诗歌需要青年传承[EB/OL]. (2019-07-25)[2025-03-29].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725/c403994-31256285.html>.
- [15] 共产党员网. 习总书记勉励我们“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二十四)[EB/OL]. (2022-03-15)[2025-03-30]. <https://www.12371.cn/2022/03/15/ARTI1647312795948499.shtml>.
- [16] 新浪网. 暑期“三下乡” 贵州民大学子在乡村留下青春印记[EB/OL]. (2024-08-06)[2025-03-29].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824573189_196c6b90502001ygr0.html?from=news&subch=onews.
- [17] 李佳乘, 白雪, 蓝森泉, 等. 包容性发展: 特色民族村寨新一轮旅游扶贫发展的新模式——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例[J]. 科技创业月刊, 2016, 29(12): 38-41.
- [18] 习近平. 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 (2015 年 5 月 18 日)[M]//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62-563.
- [19]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 年春) [M]//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1.
- [20] 共产党员网.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EB/OL]. (2022-07-30)[2025-03-30]. <https://www.12371.cn/2022/07/30/ARTI1659174833339409.shtml>.
- [21] 求是网. 求是网评论员: 新时代统战工作要把握好“四个关系”[EB/OL]. (2022-08-01)[2025-03-30]. http://www.qstheory.cn/wp/2022-08/01/c_1128882616.htm.
- [22]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习近平: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全文)[EB/OL]. (2013-05-04)[2025-03-30]. https://www.gov.cn/ldhd/2013-05/05/content_2395892.htm.

- [23]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近平寄语教师金句: 要成为塑造学生的“大先生”[EB/OL]. (2018-09-07)[2025-03-30].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0906/c421030-30276689.html>.
- [24] 新华网.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9-04-30)[2025-03-30].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30/c_1124440193.htm.
- [25] 恩格斯.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1890.09.21) [M]//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Promoting Prosperity through Integration: A Guizhou Path for Youth to Forge a Stronger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Liao Jiajun^{1,2}

¹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provinces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Guizhou Provi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uralism and unity’ and using Guizhou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has re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explored innovative paths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study combines the ‘twelve musts’ of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General Secretary's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ethnic work, and builds a three-dimensional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policy support, cultural empowerment, and youth participation’. A three-dimensional synergistic mechanism was constructed. A governance paradigm has been formed in which ‘national will and youth dynamics resonate at the same frequency’. This path not only provides a ‘Guizhou model’ for the work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multi-ethnic areas, emphasises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young people, but also reveals the core logic of the governance of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 - strengthening the unity in respecting plurality, building consensus in activating the individual,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great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also reveals the core logic of ethnic affair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 to strengthen unity in respecting diversity, to build consensus in activating individuals, and to inject deep cultural cohesion and youthful action in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Youth;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welve Must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thnic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深度学习视域下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研究

李薪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在“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颁布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正经历教学范式的转型。本研究以深度学习理论为视角，聚焦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的优化路径及其育人价值。通过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单元作业设计应以单元整体为导向，注重目标的进阶性；以真实情境为依托，增强作业的实践性；以反思评价为支撑，促进学生元认知的发展。本研究构建的深度学习导向单元作业设计策略框架，从认知建构到迁移应用的维度，为小学语文课程实施提供了“高阶思维”的实践路径，有效推动了学科核心素养的具象化发展。

关键词：深度学习；单元作业设计；高阶思维；核心素养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小学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路径研究”（XJ20250548）

DOI：doi.org/10.70693/jyxb.v1i2.51

一、引言

作业是连接课堂教学与学生评价的重要纽带，也是促进学生学习和提升教师教学技能的关键支点。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明确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与时长，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其中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控制在一小时以内^[1]。这一政策已成为义务教育阶段作业改革的风向标，旨在实现“减负提质”的核心目标。与此同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强调了大单元与大概概念教学的重要性，倡导教师以学习任务群为载体，围绕单元主题整合教学内容，采取“先见森林，再见树木”的整体性教学方式，并要求教师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设计优质作业，合理安排作业类型，提升作业的针对性与实效性^[2]。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深度学习视角出发，探讨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的优化策略，旨在挖掘其育人价值，将作业设计融入大单元框架，围绕主题目标构建进阶性任务，不仅助力“减负提质”目标的实现，还为学生语言能力、文化自信及高阶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二、深度学习视域下单元作业设计的内涵

（一）单元作业设计的内涵

作业的内涵与功能在教育研究中经历了丰富的演变历程。早期教育学者多从教学实践出发，将作业视为巩固课堂知识的工具。以赫尔巴特和斯宾塞为代表，强调作业通过重复练习和记忆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20 世纪，杜威在其经典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作业应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延伸，而非机械重复的练习。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教育中对作业的工具性定位，强调其在激发学生主体性中的作用。20 世纪中后期，皮亚杰和维果斯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作业在于培养学生对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入 21 世纪，王月芬对作业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将其定义为：作业是学校教师根据一定的目标进行设计，并要求学生在非教学时间完成的各种类型的学习任务^[4]。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新课标的出台，当前的作业设计更加强调核心素养的培养，内容上注重跨学科整合、项目式学习等。这些理论演变表明，教育理念从“知识中心”向“学生中心”再向“素养中心”的转变，作业设计逐渐从单一的知识巩固工具，转变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与能力提升的关键环节，为单元作业设计

作者简介：李薪(2001-)，女，硕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方向小学语文。

计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持。

王月芬从提升作业质量的角度出发,提出单元作业设计是以单元为基本单位,依据一定的学习目的,选择、重组、改编或自主开发等多种形式,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作业集合^[5]。李学书等人依托单元大概念构建一体化的单元作业目标,确保作业目标与学科核心素养、课程标准一致,并从大概念的“生活价值”出发,通过具体的学习活动和评价方案落实^[6]。单元作业设计以单元整体为基本单位,统筹规划单元内各个课时的作业内容,确保内容的系统性和进阶性。这一作业设计不仅能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还能有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然而,在实践案例、现代教育技术支持和学生个体差异等方面,单元作业设计仍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以提升其理论水平和实践效果。

(二) 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单元作业设计表现特征

深度学习的理念起源于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与浅层学习形成鲜明对比。布鲁姆在其《教育目标分类学》中首次区分了学习的层次,将浅层学习定义为停留于知识的记忆与再现,缺乏意义的探索,而高阶学习则涵盖分析、综合与评价,强调知识的迁移与运用^[7]。郭华探讨了深度学习的本质涵义,提出深度学习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基本途径,其本质是在教师的引领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参与、体验并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8]。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单元作业设计以知识迁移为目标,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知识,还要能够分析、评价和创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这一设计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真实问题解决能力。

深度学习导向的单元作业设计不仅在形式上体现整体性与进阶性,更在功能上指向学生高阶思维与核心素养的培养。崔允漭提出学历案是一种指向学生个人知识管理的学习档案,通过学生立场的专业化设计、差异化的学习支持以及评价与反思的嵌入式整合,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9]。蒋逸卿等从学习进阶的视角出发设计单元作业,可以获得“整体架构—锚定目标—转换层级—评价伴随”的链式结构作业取向^[10]。这一结构能有效优化作业设计,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和认知水平的进阶。在深度学习视域下,单元作业通过结构化任务设计能够有效联结高阶思维与学科核心素养发展。这不仅回应了“双减”政策“减负提质”的要求,也契合新课标对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为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的优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框架。

三、深度学习视域下单元作业设计的价值

(一) 深度学习是智能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

后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信息与知识的主导地位,这对个体的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学习通常依赖知识记忆、题海战术和学习时长的浅层学习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这意味着个体不仅需要掌握基础知识,更要在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素养。智能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普及,使得机械性、重复性的任务逐渐被技术取代,而对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能力的需求日益凸显。因此,学习方式的转型成为必然,深度学习应运而生,成为应对后现代社会挑战的关键。

深度学习的发生不仅依赖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更需要教师教育观念与教学实践的革新。在智能时代,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单一传递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支持者。同时,教师需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通过情境化教学与反思性评价,促成教师、知识与学生的有机统一。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教学内容的适切性,也最大化地发挥了教育的价值,使学生具备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核心素养。只有当教师与学生共同意识到这一变革的必要性,深度学习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为智能时代的挑战提供有力支撑。

(二) 单元作业是学生能力发展的关键支架

单元作业以单元为基本单位,突破了传统作业的碎片化局限,体现了其独特的教育意义与实践价值。其作为学习支架,源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该理论认为,学习支架是帮助学生跨越当前能力与潜在发展之间的桥梁,通过适当的引导,使学生逐步掌握新知识与技能,最终实现自主学习。单元作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统领课时任务,为学生能力发展搭建了从依赖到独立的关键支撑。

单元作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进阶式”设计,这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递进发展。在作业设计中,教师以单元目标为导向,有意识地规划由易到难的任务序列,使每个课时作业的内容层层递进。这种设计不仅落实了单元语文要素的教学要求,还通过任务的递进性,推动学生从基础认知向复杂能力的过渡。王洪珍提出,进阶式单元作业应围绕“大概念”设置情境任务,由简单理解逐步过渡到分析与创造,从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单元作业内容的系统性,也为学生提供了从“学会”到“会学”的能力递进路径,最终

助力其高阶思维的初步形成。因此，单元作业中的学习任务通过搭建学习支架、提供学习资源，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并进阶式地激发思考，最终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四、深度学习视域下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的策略

(一) 以单元整体为导向，明确目标的进阶性

深度学习强调知识的系统构建和能力的螺旋上升，而新课标也要求教师善用“学习任务群”的方式创新教学方式和作业设计。依据加涅的学习分层理论，学习目标需要遵循“识记—理解—应用—迁移”的路径进阶，以匹配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这一理论为单元作业的进阶设计提供了明确框架。同时，为了增强策略的普适性和学生个体差异，教师在应用此框架时需要根据学段和学生认知水平进行分层设计，第一学段可侧重识记层级的任务设计，形式可以更有趣；第二学段可以侧重识记和理解的层级的任务设计，形式更丰富；第三学段则需强化应用和迁移层级的挑战性任务，并引入更多分析、评价和创造元素。因此，按照这一路径出示了“古典名著”的主题活动设计，如表1所示：

表1 “古典名著”主题活动设计表			
情境任务	学习目标层级	学习子任务	分层学习示例
经典名著 我来讲	识记：系统整合基础知识，构建知识框架	名著信息制作者	基础：制作包含主要人物、事件、地点的基础信息卡（可配图）。 提升：进一步梳理关键线索，借助导图或关系网呈现。
	理解：深化理解知识本质，掌握语文要素	人物形象分析师	基础：找出描述人物外貌、语言的句子，谈论初印象。 提升：对比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
	应用：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实现实践转换	讲堂脚本创作者	基础：选取熟悉片段，用自己的话复述脚本大意。 提升：模仿原文语言风格，进而改变一个经典片段。
	迁移：关联现实生活内容，实现核心素养	传统文化传承者	基础：向教家人简单介绍改编故事。 提升：向家人或伙伴宣讲改编脚本，并思考这个故事带来的启发。

首先，在识记阶段，任务聚焦基础知识点的系统整合。以五年级下册“古典名著”单元为例，情境任务可以设计为“经典名著我来讲”，子任务一可设计为“名著信息制作者”。要求学生梳理选文名著中的主要人物、关键情节、经典语句等，通过表格、思维导图等形式呈现。这一任务通过情境目标引导学生主动筛选、归纳分散的知识点，避免了传统作业中单纯默写、背诵的碎片化弊端，使识记成为知识系统化的起点。其次，在理解阶段，任务需要深化对知识本质的把握，推动学生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子任务二可设计为“人物形象分析师”。通过对比分析孙悟空与诸葛亮的性格特点，结合具体情节说明作者如何通过语言、动作描写塑造人物，对文本进行深度解读。然后，在应用阶段，任务强调知识的灵活运用，也是深度学习从内到外的关键环节。子任务三升级为“讲堂脚本创作者”。要求学生选取一个名著经典片段，模仿原文写作手法改编成3分钟宣讲脚本，将静态的知识转换成动态表达，完成“学方法”到“用方法”的跨越。最后，在迁移阶段，需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与生活经验、跨学科等内容相关联，子任务四设定为“传统文化传承者”。鼓励学生将改编版宣讲脚本向家人或伙伴宣讲，并撰写反思报告，以实现从学科知识到核心素养的升华。

(二) 以真实情境为背景，提高作业的实践性

在深度学习视域下，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需打破传统“纸上谈兵”的局限，通过真实情境的创设，让作业从知识操练转向实践体验。同时，真实情境作为连接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桥梁，能赋予作业真实意义与探究价值，引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最终实现从“学知识”到“用知识”的能力跨越。真实情境要求主题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认知兴趣和成长需求，如家庭生活、校园生活、社会现象和文化遗产等领域，让学生在作业中感受到“所学即所用”的价值感。以真实情境提升作业的实践性，需把握“目标锚定—要素整合—支架支撑”的设计逻辑。目标锚定要求情境任务紧扣单元语文要素与深度学习目标，避免情境沦为无意义的形式；要素整合则需要将单元内的生字词、课文内容、阅读方法、表达技巧等知识点融入情境任务的具体环节中，实现

知识的有机串联；支架支撑是保障真实情境作业实践性的关键策略，既提供方向指引，又确保可操作性。

真实情境又具有天然的跨学科属性，在“古典名著”单元的情境任务中，可加入与历史、艺术的结合。在“传统文化传承者”任务前后，再增加一个子任务“时代背景探秘者”，要求学生选择《三国演义》中的一场著名战役或《西游记》中一个国度，借助历史资料或学习资源探究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或科技背景，并在宣讲时简要介绍，以深化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同时，在“人物形象分析师”任务后，增加子任务“角色形象设计师”。让学生为自己分析的任务设计一个名片或为其设计一个符合性格特征的现代造型，并说明其设计理由。总之，以真实情境为背景的单元作业设计，通过生活关联赋予作业意义，真实任务驱动实践探究，支架支撑保障实践可行性，成果应用强化学习价值。跨学科的作业设计也更能体现知识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这种设计思路让语文学习回归本质，即在实践中学习语文，在运用中发展素养。

(三) 以反思评价为依托，提升元认知能力

在深度学习的闭环中，反思评价并非作业完成后的附加环节，而是贯穿整个单元作业过程的核心要素。以单元作业为载体的反思评价设计，能够引导学生跳出“被动完成”的惯性，主动审视学习行为、优化思维路径，最终实现从“学会知识”到“学会学习”的质变。构建贯穿单元全程的反思评价体系，需要过程性反思与总结性评价的协同推进。过程性反思聚焦单元各阶段的具体任务，引导学生实时监控学习状态，其虽然重要，但是对于学生来说相对抽象，因此教师需要提供具体的反思支架，下列出示了某个子任务的任务反思卡，可供教师参考应用，如表2所示：

表2 任务反思卡（某一个子任务）

问题引导（示例）	反思支架
1.完成这个任务，我主要用了什么方法/策略？	低段：我用了（画画/查课本/询问同学）…… 高段：我运用了（对比分析/查找资料）……
2.这个方法/策略效果怎么样？哪里做得好？哪里做的不好？	低段：我觉得（好用/有点难），我（说清楚了人物/画得像……） 下次我想（多查资料/写得更有趣）…… 高段：效果（很好/一般），好在（分析更全面/语言更生动……），不足在（论据不充分……），改进（提前规划/寻找更多资料）……
3.我在这个任务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我是怎么解决的？	低段：我遇到了（不认识的字/不知道怎么写）。我通过（查字典/请教他人）…… 高段：困难是（理解某人动机/揣测心理活动……）。我通过（重读文本/查找资料……）解决了……
4. 通过这个任务，我对哪部分知识/能力有了新的认识？	低段：我知道了（孙悟空很勇敢……）。 高段：我认识到（动作描写能突出性格/不同名著的语言风格差异很大……）。我的（分析能力/表达能力）有提高……

总结性评价侧重单元作业完成后的整体复盘，引导学生建立知识与能力的关联认知。除此之外，多元互动的评价机制能拓展反思的广度与深度，形成“自评—互评—师评”的三维反馈网络，其最终价值在于促进学生元认知能力的迁移与应用，将上一单元的反思成果作为下一单元作业的改进起点。

对于小学生来说，尤其对于元认知能力尚在发展中的学生，反思支架是评价有效性的关键策略。教师可以设计“阅读方法反思支架”，以表格形式呈现“方法名称、使用场景、实际效果、改进建议”四列，这些支架可以将抽象的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步骤，使学生逐步掌握反思方法。学生也在循环往复的反思实践中，其元认知能力从具体的任务中抽象出来，内化为稳定的学习品质，为深度学习提供持久的思维动力。

五、结语

本研究从教材单元主题与语文要素出发，将深度学习理论系统应用于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构建了以“整体性、情境性、反思性”为核心的策略框架，为作业设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减负提质”政策下的作业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本研究提出的策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为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具体的设计路径和评价工具，推动了核心素养在教学实践中的落地。未来研究可结合实证数据，探索不同学段与学情的差异化设计，并加强跨学科作业融合的实践，为“减负提质”下的语文作业改革提供更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1] 洛林·W·安德森等.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分类学视野下的学与教及其测评.[M].蒋小平等,译.北京: 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 2009.

[2] 王月芬.课程视域下的作业设计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5.

[3]郭华.深度学习及其意义[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11):25-32.

[4]崔允漷.指向深度学习的学历案[J].人民教育,2017,(20):43-48.

[5]王月芬.单元作业设计:价值、特征与基本要求[J].上海教育,2019,(13):33-35.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2021-7-24)[2024-11-10].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29601.htm.

[7]李学书,胡军.大概念单元作业及其方案的设计与反思[J].课程.教材.教法,2021,41(10):72-78.

[8]刘辉,李德显.指向学会学习素养的中小学作业如何设计[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2,23(05):18-23.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10]蒋逸卿,郑蓉蓉,唐恒钧.学习进阶视域下的数学作业链式设计[J].课程.教材.教法,2024,44(07):110-117.

A Study on Unit Assignment Design of Elementary School Langua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Li Xi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China’s basic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paradig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elementary school language unit assignment design and its nurturing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theor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unit assignment design should be oriented to the unit as a whole, focusing on the progressive nature of the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authentic context, enhancing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assignment; and supported by reflective evalu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etacognition.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deep learning-oriented unit assignment design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provides a practical path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language curriculum from the dimension of cognitive construction to transfer and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discipline in a concrete way.

Keywords: deep learning; unit assignment design; higher order thinking; core literacy

工作记忆容量、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

何承航¹ 蔡兰珍¹

(1.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本研究通过实证方法探究工作记忆容量与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单独及交互影响。实验选取100名高二学生,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设计,将受试分为高、低工作记忆容量组,分别完成低复杂度与高复杂度听力任务。结果显示:(1)工作记忆容量对学习者的听力理解能力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任务复杂度与学习者听力理解能力呈显著负相关;(3)二者存在显著交互效应,低复杂度任务中工作记忆容量的影响更显著,而高复杂度任务下其效应被削弱。据此提出教学建议:实施词块教学优化信息存储,并依据“认知水平-任务难度”匹配原则设计梯度化听力任务,低复杂度阶段侧重信息提取,高复杂度阶段强化语言产出。本研究揭示了工作记忆容量和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作用机制,为英语听力教学提供了认知视角的理论依据与实施建议。

关键词:工作记忆容量;任务复杂度;交互效应;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基金项目:本文是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基于AI辅助教学的新疆阿克苏市高中英语听说教学探究”(项目编号:2025CXZX-399)的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53

一、引言

听力理解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核心能力,历来被视为外语教学的重点与难点^[1]。根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界定,听力理解能力体现为学习者从口语语篇中提取信息及观点的认知加工过程^[2]。良好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不仅是二语学习者交际能力的关键构成要素^[3],更对其认知资源调配提出较高要求——在处理不同难度的听力任务时,学习者需同步调用注意力调控、逻辑推理、信息编码等多重认知机制。工作记忆作为有限容量的信息加工与存储系统^[4],在语言处理过程中发挥着双重功能:既充当语言输入输出的缓冲区,又承担问题解决的工作站角色^[5]。前期研究证实,工作记忆容量与二语听力理解存在显著正相关:高容量学习者凭借其认知资源优势,在信息处理效率与存储能力方面表现更优,从而获得更好的理解效果^{[6][7]}。由此引伸出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能否通过任务复杂度的梯度调节,降低高难度任务对低容量学习者的认知负荷要求?其二,在现行高中英语听力教学仍以测试型任务为主导的现状下^[8],如何系统分析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听力理解表现的动态影响?本研究聚焦以汉语为母语且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二语高中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旨在探究工作记忆容量与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听力理解能力的交互影响机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为优化二语听力教学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照。

二、文献综述

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

英国认知心理学家 Baddeley 和 Hitch 在开创性研究中正式提出了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核心概念^[9],并同步构建了其早期理论模型。该模型确立了由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语音回路(phonological loop)和视觉空间模板(visuospatial sketchpad)组成的多组分结构。中央执行系统作为核心调控模块,负责协调信息加工的过程;语音回路专司听觉信息的加工和储存;视觉空间模板则承担视觉和空间信息的表征与处理,三者协同作用形成完整的信息处理机制^[10]。这一奠基性模型虽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但其理论完备性仍存争议。值

作者简介:何承航(2000—),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育、二语习得;

蔡兰珍(1965—),女,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论、教师教育。

通讯作者:何承航

得关注的是, Baddely 通过整合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实证数据对原有模型进行重新修订, 特别引入情节缓冲器 (episodic buffer) 作为新增子系统^[11]。该模块具有跨模态信息整合功能, 能够实现不同编码系统的信息同步加工。Conway 和 Engle 在此基础上, 深化了中央执行系统的理论内涵, 将其定义为一种注意控制系统, 同时系统阐释了工作记忆的容量限制理论^[12]。Daneman 和 Carpenter 则提出了工作记忆容量观, 指出个体在认知任务中的信息加工效能受限于其固有的工作记忆容量阈值^[13]。

工作记忆作为核心认知机制^[14], 在语言信息处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认知功能, 韩亚文等的研究表明, 该机制通过独特的双任务模式, 确保语言信息的实时加工与临时储存得以并行运作^[15]。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工作记忆容量与英语阅读理解的关联性, 而对其在二语听力理解中的作用机制关注相对不足。Buck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 听力理解过程因其实时性特征会产生更高的认知资源消耗^[16], 这一发现凸显了工作记忆在听觉语言处理中的特殊地位。顾姗姗等采用改良版听力容量测试, 证实工作记忆容量对英语听力理解具有显著预测效度^[6], 但其研究未能明确揭示二者间的具体作用路径。周丹依的实证研究虽发现高容量组学习者在听力语篇理解任务中显著优于对照组^[7], 但因实验设计未实施前测控制, 难以排除受试者基础水平对结果的干扰效应。鉴于此, 本研究拟在严格控制个体语言水平变量的基础上, 系统探究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作用机制, 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缺。

(二) 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

任务复杂度这一核心概念起源于 Robinson 提出的认知假设模型, 该模型从信息加工理论视角将任务复杂度界定为学习者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所需调用的认知资源总量, 具体表征为对注意资源分配、逻辑推理能力及工作记忆负荷等认知要素的系统性需求^[17]。随后, Robinson 通过理论模型建构将任务复杂度解构为资源指引 (resource-directing) 与资源消耗 (resource-dispersing) 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前者包含任务元素多少、推理需求有无、是否此时此地三个因素, 后者则涉及任务多少、准备时间和先验知识三个因素^[18]。就二语听力理解领域而言, 现有研究在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索层面均存在显著缺口^[8]。从认知加工机制分析, 听力理解本质上是个体通过语音解码将外部输入信息与大脑中的知识图式进行动态整合的过程^[19]。在此过程中, 学习者需通过任务前导语进行元认知调控, 形成初步的信息预期框架, 而任务复杂度参数可能通过调节认知资源分配模式影响该预期框架的构建效能。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学界对任务复杂度与二语听力理解能力间的作用机制尚未形成系统认知, 既有研究多呈现以下局限: 首先, 概念维度存在模糊性, 常将听力理解与任务复杂度作为单维构念进行整体性考察, 如徐庆利和王福祥聚焦听力任务复杂度对词汇附带习得的线性影响^[20]; 其次, 研究视角较为局限, 曹洪霞主要从测试学角度进行听力任务类型难度排序^[8], 而任伟等虽探讨了复杂度对互动听力的调节效应^[21], 但其研究焦点偏离听力核心理解过程。张亚通过实验设计对比四类任务形态的加工效果^[22], 虽触及任务复杂度参数的表层特征, 却未能深入揭示其与听力理解能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基于上述理论缺口与研究现状, 本研究拟系统考察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重点解析认知资源分配模式在其中的中介机制。

(三) 工作记忆容量和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交互影响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 针对工作记忆容量与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学习的交互效应, 现有文献主要呈现两种研究范式: 其一为元分析理论研究路径^{[23][24]}, 其二为实证研究范式。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语写作领域^{[25][26]}, 另有部分研究关注口语产出维度^[27]。值得注意的是, 在听力理解研究领域, 相关实证研究仍极为有限。现有文献中仅王丹通过实证方法探讨了工作记忆容量与不同复杂度听力测试题型的相关性, 其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容量对细节理解题型的预测效应显著高于主旨理解题型^[28]。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可知, 工作记忆容量与任务复杂度均与二语听力理解能力存在关联, 但二者是否对听力理解效果产生交互效应尚未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方法, 系统探究工作记忆容量与任务复杂度在二语学习者听力理解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 (1) 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有何影响?
- (2) 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有何影响?
- (3) 工作记忆容量和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是否存在交互影响?

(二) 研究对象

本实验随机抽取某高级中学高二年级的两个平行班级 A 班和 B 班为研究对象。每个班级各由 50 名学生构成, 平均年龄为 16 岁。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个班级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听力成绩进行组间比较,

两个班级学生的听力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实验前测阶段,所有被试均需完成工作记忆容量测试。研究者依据测试结果将每个班级被试划分为高工作记忆容量组(25人)与低工作记忆容量组(25人),形成四组对比样本。正式实验中,A班全体被试接受低复杂度听力任务测试,而B班则实施高复杂度听力任务测试。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主要为工作记忆容量测试和基于任务复杂度的梯度听力理解测试,工作记忆容量测试用来量化被试的工作记忆容量水平,而听力理解测试用来评估被试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研究者在戴运财^[29]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工作记忆容量测试。测试题共分为5组,每组包含10个测试句,题型设置为判断题与填空题相结合的复合测量形式。测试采用计算机化形式进行。实验流程包含双认知任务:首先,受试者需在阅读测试句后记忆各句尾词,同时完成测试句与所附短句的语义一致性判断;每组测试任务完成后,受试者需在限定界面区域内输入该组所有测试句的尾词序列。例如,测试句为:“在中国,黄河是除长江之外最长的河流。”尾词为“河流”;所附短句为:“黄河是最长的河流”(与测试句语义不一致)。评分机制采用双维度计分标准:判断测试句与所附短句语义一致性正确计1分,错误不计分;尾词回忆准确计1分,错误不计分。测试总分设置为100分,通过双重认知任务的综合表现评估学习者工作记忆容量。

听力理解测试录音材料选自2024年高考新课标全国I卷第6-10段材料,该材料由五段录音构成(前四段为对话,末段为独白),总时长15分钟,音频清晰没有杂音,每段材料均重复播放两次。文本总词汇量为725词,其语速、篇幅及难度均符合语言测试规范要求。本研究采用平行测试设计,基于同一组听力材料开发甲、乙两套测试卷。两卷均包含15道题目(每题4分,总分60分),具有相同测试内容但不同任务类型:甲卷采用三选一客观选择题型,答案匹配正确即得分;乙卷采用主观简答题型,要求受试者通过词汇或短语进行作答,为降低写作水平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该卷评分标准不纳入拼写及语法要素^[30]。本研究对任务复杂度进行操作性定义:甲卷因仅需信息匹配且无语言产出要求,被界定为低复杂度任务;乙卷因涉及信息匹配、复述及语言组织等多重认知过程,被界定为高复杂度任务。在听力理解测试工具开发过程中,研究者首先聘请多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英语教师参与评审,随后选取非实验样本进行预测试。经信效度检验及试题修订后,最终形成正式听力理解测试工具。

(四) 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双阶段测试设计,首先实施预实验校准听力理解测试工具,随后系统开展工作记忆容量测试与听力理解测试。

为评估被试工作记忆容量水平,本研究采用计算机化测试程序开展标准化测量。测试实施前,研究者向被试系统讲解测试任务的操作规范,并安排模拟练习环节以确保操作适应性。正式测试阶段持续20分钟,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对两个班级的成绩进行统计与处理。

在实施听力测试前,研究者向受试详细说明本次听力测试的注意事项和作答准则。通过预先检测环境噪音并确认多媒体设备运行正常后,使用班级的多媒体设备以MP3音频的方式播放音频材料。音频在正式测试前已经确认多次,能够保证其无任何杂音且足够清晰。四组受试者使用相同音源材料,仅通过差异化题型设计(客观选择题与主观简答题)形成实验变量。听力测试共持续30分钟。最终回收有效答卷共100份,确认全部样本符合后续统计分析要求。

(五)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在回收四组学生的听力测试答卷后,系统开展成绩评定与数据处理工作。首先将实验数据录入Excel表格建立数据库,继而采用SPSS27.0统计软件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设计以任务复杂度(高、低)和工作记忆容量(高、低)作为自变量,英语听力测试成绩作为因变量,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及交互效应。在发现显著交互作用后,进一步实施简单效应分析,以揭示任务复杂度与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听力理解能力的协同影响机制。

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SPSS 27.0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基于实验设计的双因素方差分析框架,将任务复杂度和工作记忆容量作为自变量,以二语学习者听力理解测试成绩为因变量进行统计。首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1),随后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以检验主效应及交互效应(详见表2)。

表1 听力理解描述性统计

工作记忆容量	任务复杂度	平均值	标准差	数量
--------	-------	-----	-----	----

高	低	49.28	3.600	25
	高	32.32	11.996	25
	总计	40.80	12.256	50
低	低	37.76	6.839	25
	高	30.72	10.310	25
	总计	34.24	9.360	50
总计	低	43.52	7.944	50
	高	31.52	11.099	50
	总计	37.52	11.339	100

表1呈现了不同工作记忆容量条件下二语学习者在任务复杂度各水平上的听力理解表现。数据分析显示,高工作记忆容量组受试在低复杂度任务中展现出最优表现($M=49.28$, $SD=3.60$),显著高于其在高复杂度任务中的成绩($M=32.32$, $SD=11.996$)。低工作记忆容量组受试的听力表现呈现相似趋势,但其平均水平显著低于高容量组,低复杂度任务得分为 $M=37.76$ ($SD=6.839$),高复杂度任务得分为 $M=30.72$ ($SD=10.310$)。

表2 听力理解方差分析

源	均方	F	显著性
工作记忆容量	1075.84	13.885	<.001
任务复杂度	3600.00	46.464	<.001
工作记忆容量*任务复杂度	615.04	7.938	.006

如表2所示,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容量主效应显著, $F=13.885$, $p<.001$;任务复杂度主效应显著, $F=46.464$, $p<.001$;两者交互作用亦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F=7.938$, $p=.006$ 。

(一) 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

如表2所示,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13.885$, $p<.001$),这一发现从统计学角度证实了工作记忆容量作为认知能力变量的重要预测作用。进一步分析不同任务复杂度条件下组间差异发现(见表1),在低任务复杂度任务中,高容量组($M=49.28$, $SD=3.60$)的测试成绩明显优于低容量组($M=37.76$, $SD=6.839$)。而在高任务复杂度条件下,尽管两组均值差异有所缩减,高容量组($M=32.32$, $SD=11.996$)成绩仍优于低容量组($M=30.72$, $SD=10.31$)。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工作记忆容量作为关键认知变量,对二语学习者的听力理解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

(二) 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

数据分析表明,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具有显著影响。根据表2的统计结果显示,任务复杂度与听力理解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F=46.464$, $p<.001$)。进一步分析表1数据可知,高工作记忆容量组在低复杂度任务中的平均得分($M=49.28$, $SD=3.60$)显著高于高复杂度任务($M=32.32$, $SD=11.996$);而低工作记忆容量组同样表现出低复杂度任务得分($M=37.76$, $SD=6.839$)显著高于高复杂度任务($M=30.72$, $SD=10.31$)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任务复杂度水平与二语学习者听力理解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即任务复杂度越低,学习者表现出的听力理解能力越强。

(三) 工作记忆容量和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交互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见表2),工作记忆容量与任务复杂度交互作用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具有显著影响($F=7.938$, $p=.006$)。为探究两个自变量间的具体作用机制,本研究进行了简单效应检验,具体数据见表3。

表3 听力理解简单效应检验结果

任务复杂度维度:

任务复杂度水平	工作记忆容量水平	标准误差	显著性
低	高 vs 低	2.49	<.001
高	高 vs 低	2.49	.522

工作记忆容量维度:

工作记忆容量水平	任务复杂度水平	标准误差	显著性
高	高 vs 低	2.49	<.001

低

高 vs 低

2.49

.006

基于简单效应检验结果, 研究发现任务复杂度与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听力理解产生交互影响: 当任务复杂度处于低水平时, 工作记忆容量对听力理解产生显著影响($p < 0.001$), 高工作记忆容量组与低工作记忆容量组间差异显著。然而, 在任务复杂度提升至高水平时, 工作记忆容量的组间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p = 0.522$)。对于高工作记忆容量学习者, 任务复杂度水平变化会显著影响其听力理解表现($p < 0.001$)。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在工作记忆容量较低条件下, 任务复杂度变化仍对听力理解产生显著影响($p = 0.006$)。

五、讨论

(一) 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 工作记忆容量作为关键认知变量, 对二语学习者的听力理解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p < .001$), 该发现与周丹依^[7]关于工作记忆与二语听力加工机制的探索性研究具有理论一致性。基于 Daneman 和 Carpenter^[13]提出的工作记忆容量观, 认知系统在信息加工与存储功能间存在资源竞争机制, 其核心假设为个体的认知资源总量存在有限性特征。在二语听力理解这一复杂认知过程中, 学习者若将较多认知资源分配至语音解码、语义整合等加工环节, 则必然导致存储资源的相对匮乏, 这种资源分配模式在低工作记忆容量学习者群体中表现尤为显著。本实验通过双任务范式测量发现, 低工作记忆容量组在英语听力理解测试中的表现显著低于高容量组。此差异可从认知负荷视角进行阐释: 二语听力作为多层级性认知活动, 需要经历自下而上的语音表征构建、中间层次的句法分析直至最高层的语篇心理模型建构^[7]。每个加工阶段均需消耗特定认知资源, 当学习者工作记忆容量不足以支撑并行加工与存储需求时, 其信息保持与整合能力将受到严重制约。值得注意的是, 高工作记忆容量学习者在完成同等难度的听力任务后仍保持剩余存储资源, 这一发现有力地验证了 Daneman 和 Carpenter 的容量理论假设^[13], 即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差异直接影响其语言加工效能。该结论不仅深化了学界对二语听力认知机制的理解, 更为听力教学策略的制定提供了认知科学层面的实证依据。

(二) 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

实验数据表明, 任务复杂度与二语学习者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呈显著负相关($p < .001$), 即任务复杂度越低, 学习者的听力表现越佳。此发现部分佐证了曹洪霞关于多重任务型听力测试会分散学习者注意力资源、弱化材料理解深度的研究结论^[8]。依据 Robinson 的认知假设模型^[18], 任务复杂度可通过资源指引和资源消耗两个维度进行解构。其中, 资源指引维度包含任务要素数量、推理需求及时空定位三个参数; 资源消耗维度则涵盖任务数量、准备时间及先验知识三个要素。就资源指引维度而言, 选择题与简答题的听力材料在要素数量(相同文本)和时空定位(实时完成、文本不可见)维度具有等同性。然而在推理需求层面, 选择题因预设备选答案而显著降低认知要求, 相较之下, 简答题缺乏提示线索的特性使其产生更高的推理需求。由此可证, 在资源指引维度, 简答题具有更高的任务复杂度。在资源消耗维度分析中, 两类测试的准备时间(等长)与受试者语言水平(无显著差异)参数保持恒定。但就任务数量而言, 选择题仅需选项识别, 而简答题要求受试者通过自主分析生成答案, 导致其任务量级显著提升。据此, 在资源消耗维度, 简答题同样呈现更高复杂度。

综合分析表明, 简答题在资源指引与资源消耗维度均具有更高复杂度特征。Robinson 提出任务复杂度由问题解决过程中对注意、推理、记忆等认知资源的消耗程度决定^[17]。简答题因需调用更复杂的认知加工机制, 当超出二语学习者个体认知资源阈值时, 将导致其听力理解效能的衰减。这一发现为任务型听力教学设计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提示教学者需根据学习者认知发展阶段合理配置任务复杂度参数。

(三) 工作记忆容量和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交互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工作记忆容量与任务复杂度在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p = .006$)。具体而言, 在低复杂度听力任务情境下, 任务引发的认知负荷需求处于被试工作记忆容量阈限范围内, 此时工作记忆资源可充分满足语言信息加工与存储的双重需求, 且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1$)。即当认知需求未超过个体资源容量时, 认知资源充足性成为任务表现的核心预测指标。然而, 在高复杂度任务条件下, 认知负荷强度显著超出被试的平均工作记忆容量, 此时个体间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p = .522$)不再对听力理解成绩产生显著预测作用。在高复杂度听力任务情境中, 认知负荷需求显著提升, 学习者需要调用大量认知资源进行信息处理。当任务所需的认知资源完全超出个体工作记忆容量阈值时, 工作记忆容量对听力理解表现的预测效应消失。这一发现有效解释了高复杂度任务条件下, 工作记忆容量与二语听力理解能力之间未呈现显著相关性的现象。

六、结束语

英语听力理解能力作为外语交际的核心基础,其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跨语言交流的流畅性,更对二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系统性建构产生深远影响^[31]。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工作记忆容量、任务复杂度与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之间的多维动态关系,并深入解析三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工作记忆容量作为关键性认知资源指标,对二语学习者的听力理解表现具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力;(2)任务复杂度的层级性提升与学习者听力理解准确率呈现显著负向相关;(3)工作记忆容量与任务复杂度在听力信息加工过程中存在显著交互效应。

本研究对于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教学的启示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核心维度:首先,基于工作记忆理论的有限容量特征(通常为 5-7 个基本信息单位),郭高攀提出的词块优化存储理论具有重要教学价值^[32]。该研究指出,通过将基本信息单位转化为较大词块进行存储,并提升其在听力与口译活动中的使用频率,可有效促进词块习得与语言产出的质量优化。据此,建议在英语听力教学实践中系统实施词块教学策略,通过强化固定短语归纳与训练,帮助学习者构建高效的信息加工模式。其次,教学活动设计需遵循任务复杂度调控原则。教师应建立“学生认知水平-材料难度系数”的双维评估体系^[8],实施梯度化任务设计。具体而言,任务复杂度应呈现渐进式特征:初级阶段采用选择题型,侧重语篇宏观理解;强化阶段运用简答形式,强化语言输出能力。

本研究从工作记忆容量与任务复杂度双重视角拓展了二语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理论维度,并提出教学实践层面的优化建议:在听力教学设计中,教师应强化词块教学策略,同时系统评估学习者的认知发展阶段与听力材料难度参数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构建具有认知适切性的教学活动体系。这些发现可为提升二语听力教学效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需指出,本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其一,实验样本规模相对有限,研究对象局限于某校两个自然班的 100 名学习者;其二,在任务复杂度操作维度上,仅对任务复杂度进行了高低二分法划分,而未设置梯度变化的任务序列。尽管如此,本研究通过认知视角的整合为二语听力理解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建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于任务复杂度连续体的构建及跨语言背景的认知机制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 [1] 冯桂芳,陈锦.基于语言理解理论的英语听力理解障碍研究[J].外语界,2022,(04):49-56.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 [3] 闫书颖.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学习者因素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S1):130-132.
- [4] Zhisheng (Edward) Wen and Mailce Borges Mota. Working M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M]. Bristol, Blue Ridge Summit :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Multilingual Matters, 2015.
- [5] 王月旻,崔刚.工作记忆的加工与存储对英语阅读不同层次理解的影响[J].外语导刊,2024,47(02):83-91+159-160.
- [6] 顾姗姗,王同顺.工作记忆和英语听力理解关系的实证研究(英文)[J].Teaching English in China,2007,(06):46-56+127.
- [7] 周丹依.工作记忆对中国大学生二语听力理解的影响[J].高教学刊,2016,(08):44-46.
- [8] 曹洪霞.任务类型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听力理解结果的影响研究[J].现代外语,2017,40(02):265-274+293.
- [9] Bower, Gordon H.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M]. Academic Press Series,1976.
- [10] 曹韵.工作记忆理论下预制语块习得与教学探索[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08):170-173.
- [11] Baddeley, Alan. U Bristol, Dept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t al. Working memory and language: An overview.[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2003,Vol.36(3): 189-208.
- [12] Andrew R.A. Conwa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More Evidence for a General Capacity Theory[J]. Memory ,1996,Vol.4(6): 577-590.
- [13] Meredyth Daneman,Patricia A. Carpent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and reading[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80,Vol.19(4): 450-466.
- [14] 宋启超,费晓东.工作记忆容量与词汇加工速度对日语听力过程的影响[J].东北亚外语研究,2022,10(2): 92-103.
- [15] 韩亚文,崔雅琼,汤一梅.工作记忆容量和任务频次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影响[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2): 90-98, 149-150.
- [16] Buck, G. Assessing Listening[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 [17] Robinson, Peter. Aoyama Gakuin U, Tokyo, et al. Task complexity, task difficulty, and task production: Exploring interactions in a componential framework[J]. Applied Linguistics,2001,Vol.22(1): 27-57.
- [18] Robinson, Peter. Cognitive Complexity and Task Sequencing: Studies in a Componential Framework for Second

- Language Task Design[J]. IR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2005, Vol. 43(1): 1-32.
- [19] 王方. 从英语听力理解本质透视听力学习障碍[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8(2): 144-148.
- [20] 徐庆利, 王福祥. 听力任务复杂度对高中生英语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研究[J]. 基础外语教育, 2016, 18(6): 16-22, 107.
- [21] 任伟, 吴依蔓, 彭雨晨. 任务复杂度和序列对中国学生英语互动听力的影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 (4): 99-110, 149.
- [22] 张亚. 不同复杂度的听力任务对英语听力理解效果影响的实证研究[J]. 国际公关, 2020, (12): 158-159.
- [23] 徐锦芬, 冯晓丽. 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口语产出影响的元分析[J]. 现代外语, 2025, 48(1): 90-102.
- [24] 罗少茜, 汤寅杰. 任务复杂度、工作记忆容量与二语产出关系的元分析[J]. 现代外语, 2025, 48(1): 63-76.
- [25] 韩亚文, 刘思. 任务复杂度和工作记忆容量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产出的影响[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 40(2): 66-75.
- [26] 靳红玉, 王同顺. 任务复杂度、工作记忆容量与二语写作表现——学习者能动性的作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 (3): 102-113, 150.
- [27] 邢加新, 赵海永, 罗少茜, 等. 任务复杂度、工作记忆、任务情绪与大学生口语表现[J]. 现代外语, 2024, 47(1): 76-88.
- [28] 王丹. 工作记忆容量对英语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J].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02): 106-108.
- [29] 戴运财. 工作记忆、外语学能与句法加工的关系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4, (4): 32-37.
- [30] In'nami Yo. The Effects of Text and Task on the Listening Scores of Jap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J]. JLTA journal, 2001, (4): 56-75.
- [31] 王艳. 以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为目标构建外语听力教学新模式[J]. 外语教学, 2018, 39(6): 69-73.
- [32] 郭高攀. 词块的语义信息加工与认知心理研究[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4(1): 47-52.

The Effects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nd Task Complexity on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henghang He¹, Lanzhen Cai¹

¹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dividual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nd task complexity on the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hrough empirical methods. One hundred students in their second year of senior high school were selected for the experiment. A two-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design was adopted.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high and low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groups and completed listening tasks of low complexity and high complexity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2) The complexity of the task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istening ability;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the two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low-complexity tasks, while its effect is weakened in high-complexity tasks. Based on the results, teach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mplement lexical chunk teaching to optimize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design gradient listening tasks according to the matching principle of "cognitive level - task difficulty". Focus 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n the low-complexity stage, and strengthen language output in the high-complexity stag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nd task complexity on the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for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teaching.

Key words: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Task Complexity; Interaction Effect;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基于校企合作教育项目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以协同发展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实践路径探索

邹鸣民

(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 国家产教融合发展战略提出背景下,为全面提升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运行质量,笔者选择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为导向的产教融合机制探索与运行效果为例,聚焦学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创新,探索高校为践行国家产教融合发展战略、主动推进建立体制机制创新、增强服务国家经济建设能力而形成的教育、科研、社会服务“三位一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学院通过“3+1”融汇课程体系、产教“理事会+教指委”治理机制、构建“五合一”育人实践平台、转化科技成果链等“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综合体系构建成效,检验了提升人才培养、教师科研成果转化及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效果,研究并提出了面向未来的教育、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生态化协同、“三位一体”服务平台、数字赋能等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思路。

关键词: 现代产业学院; 三位一体; 协同育人;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机制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53

1 引言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从“数量”为上的“大”教育转为“质量”为上的“强”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1]。伴随着国家“教育强国建设、科技强国建设、人才强国建设”战略的纵深推进,如何在高等院校中打通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的“联动关”,已是新时期高校改革的焦点所在。

与此同时,企业对高校输出人才的岗位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以“课堂知识灌输”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日益显露出与产业实际“错位”的困境^[2]。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服务区域产业的效率不高,也暴露出“科研孤岛化”与“服务形式化”的问题^[3]。面对“教学—科研—服务”功能分散、协同不足、互不支撑的局面,亟需探索一种基于校企合作的新型育人机制,打破职能边界,实现功能耦合与路径协同^[4]。

为此,一些地方高校与地方应用型本科大学在相关的校企合作育人项目中尝试“项目为导向”的“三位一体”协同教育机制,即以企业与产业真实需求为导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5]。该机制要求教育过程、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围绕“项目”为中心,遵循“问题为导向”的师生共同研修、学校和企业共建共享的规则,增强教育的整体性,使教育达到系统性的育人成效。

尤其是随着校企共建平台的日趋成熟,高校依托企业项目,建立起了“任务做中学、科研做中学、服务做中学”的“教学—科研—服务”融通模式,人才培养从原来的“课本+成绩”走到“项目+能力”的真实环境,让教学不再是“教知识”,而是基于项目驱动与能力导向的“做项目”;教师科研不光“象牙塔中的学术孤岛”,更多的是“出点子”的技改攻关与推广转化;社会服务也不只停留在“关门关窗搞研究”,而是基于企业反馈对专业建设、教学资源的

及时回溯,形成“面向产业、服务于区域”的开放体系^[6]。

当然,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在高校内部治理机制中,“三位一体”还不能制度化表现,三是项目教学法教学改革与传统课程建设冲突严重;三是校企合作机制建立尚未完善,校企双方积极性不够高,评价标准不统一;四是“教—研—服”任务教师的能力和资源不匹配,影响了机制运行的可持续性^[7]。

综上,基于此,本文以“校企合作教育项目下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为研究对象,在高等教育多种职能有机融合的视角下,以理论逻辑建构、框架体系设计、实施路径探索与机制完善为研究方法,试图解决以下问题。

如何构建基于校企合作项目支撑的“教学—科研—服务”协同联动机制?

如何通过结构性平台与机制安排,实现三项职能的资源协同与目标整合?

在现有高教体系与校企关系背景下,如何确保“三位一体”育人机制的可持续运行与可复制推广?

本文研究希望为地方高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探索高质量教育治理与育人模式转型提供理论支持与可行路径,也为推动校企协同从“合作办学”向“共建生态”迈进提供战略参考。

2 理论与政策基础

高等学校依托校企合作教育项目建立“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现实的必然选择和强大的逻辑支撑,该模式是大学多重功能耦合关系体系重构的本质要求,其基于高等教育多重功能、协同治理、产教结合和现代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功能的历史性演变而形成的强大推动力。

2.1 理论基础

高等教育多元职能理论:ClarkKerr在《高等教育的用途》中指出,现代大学有教学、研究及为社会服务的三大功能,而这三项功能并不是“各行其是,而是应该共同交互作用,联合发展成为一个‘兼容并蓄的功能体’”。它为大学要从单一培养职能向复合服务职能延展提出了理论支撑^[8]。“三位一体”正是把高校的三大基本职能进行“有机”“完整”的整合,从纵向上看,体现在“项目—平台—机制”的三位协同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个职能形成积极的共生关系。

协同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各个主体之间在非线性系统中的目标同一性、信息的一致性、资源的可调配性,使集体的行动效率最大化^[9]。高校治理体系中的“校-企-师-生”是多元的协作共同体,项目合作协议能够使校企双方的目标与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方向建立统一的标准,便可以在教学组织、课题设置、项目的运作中创造协同运行机制,消除传统的“职能孤岛”关系,对高校治理体系功能重构、制度耦合。

产教融合教育理论:产教融合理论强调的是“企业场景+大学课程”的深度融合,教育与生产实践交叉嵌套,提供优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根本点是教育过程的职教化、现实化,即真任务、真需求、真评价^[10]。产教融合理论指导下的“三位一体”项目制机制,实际上是对产教融合理论在教学、科研和服务层面进行拓展。

反向设计与成果导向(OBE)理论: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强调围绕学生能力设计课程教学和评估,注重“过程—结果”的匹配^[11]。在“三位一体”机制中,学生在校学习之外,还可真正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校企技术服务的具体项目中承担角色,能力培养与素质养成真正融为一体,正是OBE理论的应用体现。

2.2 政策基础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二十条):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校企合作,推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鼓励“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企业参与教学全过程”等,对学校与企业的协同育人有制度引导^[12]。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文件强调“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教育生态”,指出高校应打破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分割现象,转向平台共享与任务协同,建立多功能融合型教育组织^[13]。

《高等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与“双高计划”政策文件:多份政策共同指出,未来高校建设应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发展,推进“育人—科研—服务”一体化改革。尤其是“双高计划”对“技术技能积累与转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鼓励高校将成果转化纳入课程与科研双循环^[14]。

地方政策激励机制：如江苏、山东、广东等地陆续出台《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方案》^{[15][16]}《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考核细则》^[17]等，明确“项目育人、任务驱动、成果考核”的协同导向，支持高校以企业项目为核心构建融合式教学科研体系。

3 协同模型构建与运行机制设计

为进一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方面进行实践，围绕“人才”这个核心词，本文提出了基于校企合作教育项目的协同育人模式，采取以项目为抓手、以功能为导向、以平台为基础的方式，实现高校的“三块牌子”功能融合、良性循环。

3.1 协同模型的总体结构设计^[18]

该模型围绕一个核心入口、三个功能单元和一个运行闭环展开：

核心入口-校企合作教育项目：包括订单班、企业任务驱动项目、联合科研课题、技术攻关工作坊等；作为教学、科研和服务三项职能的共通起点。

三大功能模块：

人才培养模块：依托项目开展课程教学、实训任务、综合实践，实现“学做一体”；

科学研究模块：以项目问题为科研主题，推动教师参与企业课题研究，学生协助数据采集、过程模拟、方案优化；

社会服务模块：成果反哺企业、地方经济，提供技术咨询、员工培训、成果转化等服务内容。

运行闭环机制：教学反馈科研问题，科研推动课程迭代；项目成果纳入服务评估，服务需求转化为教学资源；三项职能通过校企共建平台共享资源、统一评价、协同规划，形成协同发展生态。

3.2 功能模块协同路径设计^[19]

项目驱动式人才培养路径：课程设计以真实项目为背景，设置任务型模块；学生通过参与企业实训、项目小组研讨、成果汇报等形式完成课程目标；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共同担任导师，学生在“真问题”中锤炼“真能力”。

产研融合式科研发展路径：教师科研从企业真实问题中提炼课题，如工艺优化、用户分析、设备改造等；学生可参与子课题研究，完成毕业设计、课题论文；项目结题后可申请横向课题经费、专利申报、行业标准制定等。

反哺型社会服务路径：教学与科研成果直接用于企业运营、产品开发、人才培养等实际工作；高校可开设“科技特派员项目”“区域技术服务中心”，形成定向对接平台；企业评价反馈用于课程迭代、教师考核与服务绩效管理。

3.3 平台建设与管理机制^[20]

协同组织平台-校企双主体管理机制：成立产业学院或校企合作中心；设置“校内主管+企业联络人”联合管理结构，定期召开项目推进会；推行“共建共育、共管共享”的治理方式，企业在课程评审、项目立项、人才考核中拥有实质参与权。

资源整合机制-教学—科研—服务资源共用：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共享科研平台、共用成果数据库；建设项目知识库、案例资源库，实现资源沉淀与可迁移使用；企业提供项目案例，教师提供理论框架，学生提供执行支持。

评价反馈机制-目标导向与成果导向结合：建立“三维评价体系”。学生评价（课程达成）、教师评价（项目绩效）、企业评价（服务成效）；以结果为导向，将成果应用情况纳入专业建设产出、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统计中；首先搭建数据中心，实现对协作效率的及时考核，促进教学与服务模式的进一步调整。

综上所述，该协同模式以“项目驱动、功能互动、平台内嵌”的组织方法，建设了“三位一体”功能融通的育人体系，有效地克服了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过程中单兵作战、功能分散的弊端。随着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的深化，该模式可望在地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作为结构性改革予以推广应用。

4 典型案例分析与运行实效评估：基于“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医药生物技术学院实践^{[21][22]}

随着现代产业学院的持续升级发展，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坚持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道路，创新打造多方协同、多种功能、多方平台的现代产业学院运行机制，以苏州“生物医药一号产业”为依托，建设涵盖校政企三方的工程教育新环境，构建产教融合的系统化、制度化、实效化的新通道。

4.1 人才培养：融合课程体系与多元育人机制

构建“3+1”融合式育人路径：学院实施以“专业课程+行业课程”为核心的3+1模式：前三年通过专业知识和行业认知递进式培养学生基础能力与综合能力，第四年由企业全程承接学生工程能力实训与毕业设计。行业课程从大一导入、贯穿四年，占课程总学分比重35.5%。

建立“双通道+双导师”成长机制：学生可在大二通过“跨专业学分认证+双向遴选”进入产业学院学习，实行企业导师与高校教师联合指导机制。毕业时授予“专业学位证书+产业学院证书”，并可获得免试用期直接上岗的待遇，实现职业资格与学术资质双重赋能。

实践教学五合一融合基地支撑：学院构建教学实习、企业导师、就业引导、教师研修、科研合作“五合一”实践平台，实训场地总面积达7500平方米，配套完整的GMP实训线、岗位模拟中心和创新训练区，确保人才培养全过程紧贴产业真实场景。

4.2 科学研究：成果反哺教学、协同服务产业

建立跨校企“科研—教学”转化机制：学院注重科研成果转化反哺教学：将企业横向项目嵌入教学任务、将产研数据转化为课程案例、将专利成果写入教材内容。例如，《GMP生产操作实训教程》《生物医药企业项目管理》均由校企联合主编，显著增强课程适用性和前沿性。

科技创新服务企业发展与区域战略：通过共建医药生物技术应用研究院，学院联合企业承接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项目，2020年科研经费突破1025万元，企业横向课题占比达64.4%；2021年更牵头申报国家级生物医药平台，项目经费总额超过5000万元。

科研平台支撑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在基于企业资源、依托地方政策支持下，教师直接进入企业联合研发平台，在企业开展研训和科学研究，获得攻克技术难关的机会和生产应用场景的信息反哺。教师企业研发参与度逐年提高，科研成果连续三年获得省部级奖励，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教育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一项。

4.3 社会服务：嵌入式参与、生态式赋能

服务地方产业“生物医药一号工程”：学院紧密对接苏州高新区“集聚企业超万家，产业规模破万亿”的生物医药发展战略，围绕人才供给、技术创新、岗位培训提供全过程服务，构建“人才链—技术链—服务链”一体化生态。

推动学生就业质量稳步提升：通过精准对接产业链关键岗位，2020届毕业生就业月薪达6500元，高于同期其他毕业生30%以上。92%的产业学院毕业生就业于1000人以上企业，岗位多为助理工程师或核心技术支持人员，充分体现学院在服务人才就地留用和就业结构优化方面的社会价值。

形成多元共建共享合作机制：截至2022年，累计投入资金6070万元，企业和地方政府占61.4%，企业投入除资金之外，还长期提供教学任务、共建培训中心、设立奖学金等，来保证产教服务的制度化和持续性。

总之，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按照“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理念实践，其在人才培养模式、科研组织制度、社会服务机制的创新，为高校的内外资源融合发展组织形式和体制机制的建设提供了参照样本，同时为区域应用型高校服务于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探索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5 问题挑战与优化建议：聚焦“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的完善路径

虽然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通过实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协同机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绩，但校企深度融合、教师跨界能力、资源整合配置以及制度体系化支撑等一系列问题是在实践

中反复凸显出的共性问题，有待在相关机制的优化和策略的反思中得到积极调整。

5.1 问题一：校企合作仍存在“形式大于实质”的风险^[23]

部分企业参与课程设计、项目指导的深度和频率仍显不足，尤其在中小企业中，存在资源投入动力弱、教育目标契合度不高、参与方式单一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研—教学—服务”功能在企业中的协同释放。

对策建议：建立“项目倒逼协同”的机制，将课程开发、项目立项与企业发展痛点绑定，提升企业参与主动性；通过设立专项激励资金、纳入产业政策考核、引入税收减免政策等，提升企业教育投入意愿；构建“企业—教师—学生”三层共研共教平台，打通实训任务、科研项目与服务反馈间的转化链条。

5.2 问题二：教师跨界能力不足，难以胜任三重角色^[24]

“三位一体”模式要求教师兼具教学、科研与服务能力。然而，多数教师仍以学术研究为主，缺乏产业实操经验、技术更新能力及项目管理能力，难以真正实现“教—研—服”协同交融。

对策建议：强化教师企业研修制度，推动教师定期进入企业岗位实践，建立教师“教学+科研+工程”双轨晋升通道；建设“双能型师资团队”，通过企业导师认证、校外兼职聘任、协同授课试点等方式提升教师产业适配度；在教学评价体系中引入“企业贡献分”与“服务成果指标”，激励教师参与产教融合项目。

5.3 问题三：科研成果转化路径不清，服务功能弱化^[25]

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科研成果转化脱节的问题依旧存在。高校缺乏成果与企业之间的对接平台与有效的对接措施，也缺乏一定的激励措施，从而使得高校部分教师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更谈不上有效的反哺教学，高校服务功能虚置。

对策建议：搭建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站、区域技术经理人平台等中介服务组织，打通科研—企业—课程闭环；引入“科研成果入课”机制，将教师产业课题中的核心方法、实验数据转化为教学资源；对教师参与成果转化实施“服务积分制”，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激励体系。

5.4 问题四：政策体系支撑不够完善，制度化建设需加强^[26]

虽然高校相继出台了若干指导意见（如双聘教师工作管理办法、企业导师津贴发放办法、转专业转方向管理办法等），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政策无法落地、政策执行缺乏弹性和不被继续完善的状况，造成协同育人机制的不规范运行。

对策建议：构建“人才培养+科研服务+企业反馈”一体化政策链，定期评估并动态调整制度文本；设立产业学院运行评估体系，包括课程共建率、企业导师参与度、服务成果转化率等核心指标；统筹学校层面制度保障，推动现代产业学院从“项目推动”走向“机制固化”。

总之，围绕“三位一体”融合发展需求办产业学院，既要从顶层制度层面、典型示范层面加以推动，又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与机制等层面的问题，唯有推进治理协同、体制机制的制度重构与能力重构，才能真正构建“育人—科研—服务”融合生态，促进地方高校的高质量转型发展。

6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协同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探索

在国家全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时代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作为以深化产教融合、实现校企协同、推进高质量建设的主体重要载体，必然需要从探索层面上升至构建层面上落实。基于此，在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过程中，以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的建设实践为例，进行机制梳理和梳理取得成效，在论文中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在三大职能融合中，不再以“教学为中心”孤立运作，而是通过行业课程导入、科研项目嵌入、服务任务融合，打通高校教育职能之间的壁垒，实现“课程即科研、实训即服务、项目即评价”的功能协同。这种机制转向推动高校由功能分化走向任务协同，实现了从“教育组织”向“教育平台”的本质跃升，三位一体协同机制推动了功能整合与组织重塑。

学校建设理事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为主的协同管理组织架构，政校企共同参与开发课程、共建平台、共育人

才、共用资源,形成制度层面“教育共同体”,以《教师企业研修管理办法》《企业导师工作细则》《转专业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为载体,实现校内制度规范与产业发展实际动态对接,确保协同育人工作的有效持久进行,多元主体共建平台推动了协同治理走向制度化。

依托“3+1”课程结构与“五合一”实践平台,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完成从“认知—实践—创新”的能力生成路径,毕业生月薪、岗位匹配度与企业满意度均显著高于非产业学院同类学生。人才培养目标对接岗位需求,课程内容对接行业标准,学习过程对接企业任务,体现了高度匹配性与实效性。任务导向型课程体系提升了学生工程胜任力与产业匹配度。

伴随着产业学院体制机制保障,教师的研究与开发逐步回归工程技术问题与企业需求,服务内容由普通的继续教育和对外技术服务转变为平台建设和成果开发,2020年科研经费超过1000万元,2021年共同申报国家重大平台建设经费达到5000万元,社会服务能力成为高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科研成果与社会服务转化形成了高校发展的第二增长极。

7 未来展望:走向生态化、平台化、数字化的融合发展路径

生态化发展-打造区域协同育人共同体:通过“政产学研用”多方联动机制,将产业学院嵌入区域教育服务生态,形成“政府统筹、高校支撑、企业主导、行业协同”的育人共同体。推动校企共建实验室、联合研究院、技术转移平台等深度合作实体,促进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平台化治理-构建跨校跨企协同治理结构:以“平台即学院”理念重构组织结构,将现代产业学院打造成多校共享、企业共管、数据互通的教育平台,实现课程共建、师资共育、资源共用、成果共创的新格局。探索建立区域性或行业性产业学院联合体,实现跨区域、跨行业协同发展。

数字化赋能-推动教育服务与科研管理智能化转型:借助教育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构建“教学—科研—服务”全生命周期数字管理系统,实时反馈学生能力成长、教师任务贡献与企业满意度,推动人才培养机制从经验决策走向数据驱动,全面提升育人质量与运行效率。

最后,从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探索的“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也进一步说明,在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上,体制机制的集成创新、路径和机制的创新以及相关制度的配套是缺一不可的,只有这样高校才能从教育组织向融合平台转变,成为服务于国家、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EB/OL]. (2022-11-21) [2025-08-2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211/t20221121_998655.html.
- [2] 刘国买, 林琴. 耦合视角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就业脱困[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25-08-12.
- [3] 黄海燕.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机制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02): 1-7.
- [4] 河南科技大学. 本科教育学情报告[R]. 洛阳: 河南科技大学, 2011.
- [5] 李秀梅, 张艳, 吕国辉. 地方高校“项目导向”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的创新实践——以吉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为例[J]. 现代大学教育, 2024(02): 92-99.
- [6] 钱乃余, 王鑫, 张德生, 等. 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和产学研用育人模式在机电专业集群中的研究与实践[R]. 周口: 周口师范学院, 2021.
- [7] 陈明, 赵倩. 产教融合视域下应用型大学“三位一体”协同育人困境与改进——基于10所地方高校的调研报告[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03): 71-78.
- [8] KERR C.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M]. 5th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18, 27-30.

- [9] 张岩, 刘祖云. 协同治理理论生成逻辑及动力机制——基于非线性系统视角的分析[J]. 应用科学学报, 2024, 42(01): 1-11.
- [10] 李政. 产教融合, 到底“融”什么? ——基于“企业场景+大学课程”深度融合的理论解析与实践范式[J].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联盟微信公众号, 2025-08-17.
- [11] 李政, 张楠. OBE 理念下课程教学“过程—结果”匹配模式研究——以高职智能制造专业群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2025(05): 44-49.
- [12] 国务院.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Z]. 2019-01-24.
- [13]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Z]. 2017-12-19.
- [14]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Z]. 教发〔2021〕7号, 2021-09-30.
- [15] 江苏省教育厅等五部门. 江苏省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年)[Z]. 苏教高〔2023〕4号, 2023-07-25.
- [16]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2024年版)[Z]. 粤教高函〔2024〕5号, 2024-03-12.
- [17]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考核细则(试行)[Z]. 鲁教高字〔2023〕12号, 2023-09-18.
- [18] 杨帆, 陈明. 基于协同理论的高校“项目—能力”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型构建与运行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4(02): 102-109.
- [19] 王娣, 曹珂珂, 李妍, 等. 基于“项目—任务—成果”协同路径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蚌埠学院生物工程专业校企共建实践[J]. 合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34(02): 75-81.
- [20] 张皓, 王健, 赵文清. 现代产业学院“三融三通”平台建设运行与运行机制研究——基于18所高职院校的实证[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5, 43(04): 87-94.
- [21] 罗兵. 科技助推现代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以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应用学院为例[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21, 35(05): 1-5.
- [22] 吴永玲, 王学军. 校政企协同背景下生物医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J]. Advances in Education, 2025, 15(05): 709-716.
- [23] 马洁. 高职院校与中小企业合作存在问题分析[J]. 教育进展, 2023, 13(10): 7764-7770.
- [24] 王健, 张皓, 赵文清. 新质教师教育: 驱动机理、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J]. 教师教育研究, 2025, 37(02): 23-30.
- [25] 郑刚, 王海燕. 科研成果教学转化的梗阻因素与制度创新——基于72所高校的实证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5, 43(02): 104-111.
- [26] 陈武林, 杨无敌. 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路径调适——基于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解释[J]. 中国高教研究, 2025(08): 1-7.

Research on the "Trinity"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ducation Projects: Explo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e Paths Guided by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Zou Mingmin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quality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the author takes the exploration and operation effect of the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mechanism guided by the "trin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at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the college in "talent cultivation - scientific research - social serv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model of in - dept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in the form of "trinity", which is formed by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ctively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serve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of the "trin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system, such as the "3 + 1" 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ouncil + teaching steering committee" for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ve - in - one" education practice plat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chain, the college has verified the effects of improving talent cultiv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the college's social service ability. The paper also studies and proposes ideas for the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reform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ecological collaboration of future - oriented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the "trinity" service platform,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Keywords: Modern industry college; Tri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供应链可持续尽职调查 ——基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供应商年生产能力测算方法

马杰

(奥瑞威士顿科技大学, 墨西哥 下加利福尼亚州 提华纳市 22044)

摘要: 随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消费品市场的持续扩张, 供应链风险管理面临愈加复杂的挑战, 其中供应商虚报产能与非授权分包已成为导致交付延误与合规风险的重要因素。供应商尽职调查因此被视为保障供应链稳定与透明的关键环节, 而科学准确的生产能力测算则是其核心基础。本文基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单一产品、多生产线及多产品组合企业的年生产能力测算方法。该方法以瓶颈工序识别和时间定额测算为核心, 结合多产品折算与时间占比分配等策略, 实现了在统一时间基准下的产能评估, 兼顾操作性与适用性。研究不仅验证了该方法在供应链尽职调查中的实用价值, 还探讨了其在动态生产环境下的调整机制, 并展望了与物联网、大数据及智能制造相结合的未来发展方向。该研究为采购方识别虚报产能、优化资源配置及提升供应链透明度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与决策支持。

关键词: 供应链尽职调查; 产能测算;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瓶颈工序; 供应链风险管理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57

一、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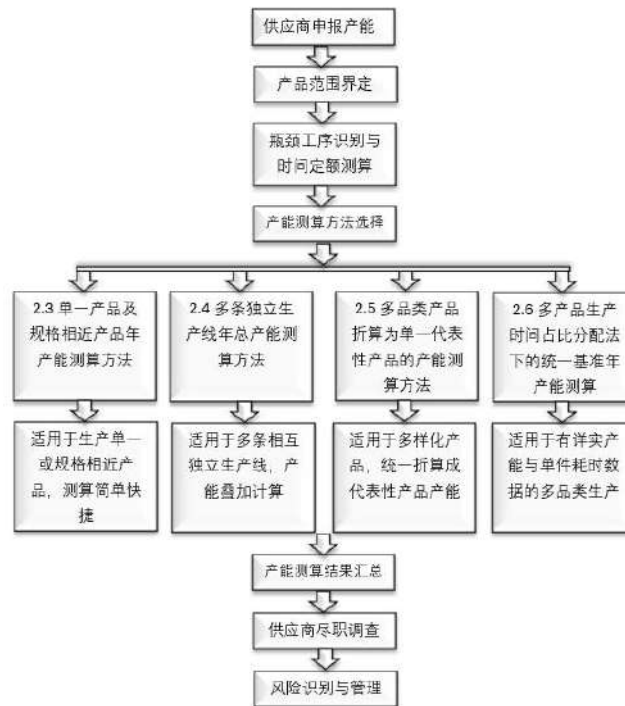
中国制造业作为全球消费品市场的重要支柱, 凭借优良质量和合理价格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 吸引众多国际零售商将中国设为主要采购基地。然而, 伴随采购规模扩大, 供应链风险日益凸显, 尤其是供应链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愈发严峻。^[1]具体表现为供应商虚报产能, 导致交货延期和供应链中断; 非授权分包普遍存在, 进而引发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及潜在的合规风险; 更有部分非授权分包链条涉及劳动权益侵害、环境污染及冲突地区原材料采购等严重问题。此类风险不仅影响采购效率, 也对品牌声誉和法律合规性造成重大威胁。

在全球供应链风险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供应商尽职调查已成为采购方风险管理的核心, 而准确的生产能力测算则是实现供应链透明、合理评估供应商能力的关键基础。构建科学、合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产能测算方法, 不仅能够有效支撑采购决策, 降低交付风险, 还能提升供应链整体的稳健性与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基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提出了一套适用于多产品企业的年产能测算方法, 覆盖单一产品、多生产线及多产品组合折算等多种场景, 在统一时间基准下实现可比性和准确性评估, 旨在为供应链尽职调查提供系统性的技术工具与决策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原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和国家有关规定,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企业每位员工年总工作时间为2416小时。该标准为本文的年生产能力测算提供了统一且合规的时间参数基础。

二、企业年生产能力测算原理与步骤

2.0 研究方法框架图



2.1 产品范围界定

根据企业的生产实际情况，产品范围可划分为以下两类：① 单一或相似产品。② 多品类差异产品。

2.2 瓶颈工序产能测算及动态调整方法

瓶颈工序是限制企业整体产能的关键环节，其时间定额是衡量该工序生产效率的重要技术指标，定义为单位时间（如每小时）内该工序可完成的产品数量。^[2]时间定额的测算主要依赖企业提供的生产数据和现场观察，重点采集单位时间（如每小时、每分钟或每秒）内的产出数量，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作为系统中的资源约束，瓶颈工序的最大产能受到线性规划中的资源约束限制，其数学表达为：

$$\sum_{j=1}^N a_{ij} x_j \leq b_i$$

其中： a_{ij} ：单位产品 j 消耗的瓶颈资源 i 时间（小时/件）； x_j ：产品 j 的计划产量（件）； b_i ：瓶颈资源 i 在一定期间的总可用时间（小时）。

该约束确保总资源消耗不超过瓶颈资源的可用时间，从而限定产品产能的最大值。时间定额可以从不同维度理解。单人时间定额指单个操作工在瓶颈工序单位时间内（通常以小时计）可完成的产品数量，反映人工作业效率。单机时间定额指单台设备在相同时间单位内可完成的产品数量，体现设备的生产能力。根据实际情况，瓶颈工序的总时间定额可分别按人员或设备计算。按人员计算：总时间定额 = 单人时间定额 × 工序操作人数；按设备计算：总时间定额 = 单机时间定额 × 设备台数。以上方法确保对瓶颈工序产能的准确量化，为后续产能测算提供关键参数。

表 1：总时间定额（件/小时）案例示例

生产方式	单位产能（件/小时）	单位数量	总产能（件/小时）
人工	20	200 人	4000
设备	20	200 台	4000

需要指出的是，瓶颈工序并非在所有时间段内均保持恒定不变，其受生产计划调整、设备维护、员工技能水平、原材料供应状况以及生产异常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动态变化和波动性。因而，单一静态时间定额难以全面、准确反映实际生产能力。为更合理地测算产能，应结合以下策略。1) 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通过持续监

测瓶颈工序的实际产出数据, 计算平均产能及其波动区间 (如标准差), 识别瓶颈的动态趋势和周期性波动。2) 预留安全裕度, 基于波动幅度, 适当降低测算产能, 留有余量以应对突发状况和生产波动, 避免过度乐观估计。3) 分时段测算, 对不同生产时段或批次分别测算瓶颈产能, 综合得出更加精准的年度产能估算。4) 动态调整模型设计, 应结合实时生产数据, 设计基于机器学习或统计模型的动态调整机制, 定期更新瓶颈工序的时间定额参数。^[3]该模型可包括异常检测、趋势预测及波动补偿功能, 以适应生产环境的变化, 提升产能预测的准确性和实用性。通过上述措施, 可以较好地兼顾瓶颈工序的动态性, 提升产能测算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避免因忽视波动导致的风险。

2.3 单一产品及规格相近产品年产能测算方法

针对单一产品或规格相近的产品, 其年产能可通过以下公式进行测算: 年产能 = $C \times$ 瓶颈工序总时间定额。其中: C : 年总工作时间 (小时), 依据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取值为 2416 小时; 瓶颈工序总时间定额: 以件/小时为单位, 反映该工序单位时间内的最大产能。1) 瓶颈工序总时间定额 = 单人时间定额 $\times$ 工序操作人数; 2) 瓶颈工序总时间定额 = 单机时间定额 $\times$ 设备台数。^[3]

案例示例: 假设某产品单件在瓶颈工序上的加工时间为 0.05 小时/件, 则单位时间定额为: $1 \div 0.05 = 20$ 件/小时。若该工序共有 200 名员工同时作业, 则瓶颈工序总时间定额为: $20 \text{ 件/小时} \times 200 \text{ 人} = 4000 \text{ 件/小时}$ 。该产品的年产能计算为: $2416 \text{ 小时} \times 4000 \text{ 件/小时} = 9,664,000 \text{ 件/年}$ 。此外, 若企业生产多种不同产品, 且需共用同一条生产线完成某一通用部件或工序, 当该生产线为瓶颈工序时, 其产能决定整体产能, 此时可直接采用上述公式进行年产能测算。

2.4 多条独立生产线年总产能测算方法

当企业拥有多条相互独立、分别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线时, 可以分别对各条生产线进行年产能测算, 然后将各条生产线的产能加总, 得到企业整体的年生产能力。具体方法如下: $x_k = T_k \times N_k \times C$ 。其中: T_k : 第 k 条生产线瓶颈工序中单个操作工的时间定额 (单位时间内单人最大产能, 件/小时); N_k : 第 k 条生产线瓶颈工序的操作工人数; C : 年总工作时间 (小时); x_k : 第 k 条生产线的年产能 (件)。企业总体年产能 X 则为所有生产线年产能之和, 满足线性叠加原理:

$$X = \sum_{k=1}^M (T_k \times N_k \times C)$$

其中: M : 生产线数量; X : 企业所有生产线的总体年产能 (件)。

假设企业拥有两条生产线, 操作工人数均为 200 人, 年总工作时间 $C = 2416$ 小时。生产线 A 单人时间定额为 $T_a = 15$ 件/小时, 操作工人数 $N_a = 200$; 生产线 B 单人时间定额为 $T_b = 7.5$ 件/小时, 操作工人数 $N_b = 200$ 。则各生产线瓶颈工序的总时间定额 (即整条生产线每小时最大产能) 为:

表 2: 各生产线瓶颈工序的总时间定额案例示例

生产线	单人时间定额 T_k (件/小时)	操作工人数 N_k (人)	总产能计算 (件/小时)
A	15	200	3,000
B	7.5	200	1,500

表 3: 所有生产线的总体年产能案例示例

生产线	总产能 (件/小时)	年总工作时间 C (小时)	年产能 x_k (件/年)
A	3,000	2,416	7,248,000
B	1,500	2,416	3,624,000
合计	—	—	$X = 10,872,000$

2.5 多品类产品折算为单一代表性产品的产能测算方法

对于产品种类较多且规格差异较大的企业, 为简化产能测算, 通常将多种产品折算为单一代表性产品, 进行统一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确定代表性产品的生产速度 T_0 (单位: 件/小时) 及其年产能; 获取其他各类产品 i 的生产速度 T_i (单位: 件/小时) 及对应的年产能; 对多样化产品进行分类, 建议选取企业内具有代表性的 3 至 5 种产品 (可依据产能、营业额或主推产品), 或通过归类合并, 将规格或属性相近的产品归为 3 至 5 类, 以简化品类, 提升测算的操作性; 计算各产品的换算系数 K_i , 定义为: $K_i = T_i / T_0$ 。该系数反映产品 i 相对于代表性产

品单位时间内的生产速度比例。生产速度越快，单位产品所需时间越短，时间资源消耗相对较少。换算时，将产品 i 的年产能乘以换算系数 K_i ，折算成代表性产品的等效年产能：折算年产能 $Q_{i,eq} = \text{年产能}_i \times K_i = \text{年产能}_i \times (T_i / T_0)$ 。企业总体折算年产能可为：

$$Q_{eq, total} = Q_0 + \sum_{i=1}^n Q_i \cdot \frac{T_i}{T_0}$$

其中： Q_0 为代表性产品年产能； Q_i 为其他产品年产能； n 为其他不同产品种类数量。

需要指出的是，换算系数基于单位时间产能（生产速度），生产速度越快，产品折算后产能越大，合理反映了其时间资源占用相对较少的事实；反之耗时长、速度慢的产品折算后产能相对减少。这种换算方法有助于统一不同产品在时间资源消耗上的等效贡献，便于多品类企业进行产能分析和规划。同时，换算过程中选取代表性产品及分类标准带有一定主观性，建议结合实际生产情况谨慎应用，防止误差影响产能判断。若企业生产多种不同产品，且需共用同一条生产线完成不同部件或工序，当该生产线为瓶颈工序时，其产能决定整体产能，此时亦可直接采用本节公式进行测算。

表 4：多品类产品折算为单一代表性产品的产能测算案例示例

产品	生产速度 T_i (件/小时)	年产能 (件)	换算系数 $K_i = T_i / T_0$	折算年产能计算 公式	折算年产能 (件)
代表性产品	3 (生产速度 T_0)	400,000	—	—	400,000
产品 1	3	800,000	$3 / 3 = 1.00$	$800,000 \times 1.00$	800,000
产品 2	5	1,200,000	$5 / 3 \approx 1.67$	$1,200,000 \times 1.67$	2,004,000
产品 3	6	2,000,000	$6 / 3 = 2.00$	$2,000,000 \times 2.00$	4,000,000
合计	—	—	—	—	7,204,000

案例示例说明：产品 2 和产品 3 生产速度更快，在瓶颈工序上每件产品所需时间更短，因此对时间资源的占用相对较低。折算后等效年产能高于其原始产能，合理体现了其在统一时间资源框架下对整体产能的更高等效贡献。

2.6 多产品生产时间占比分配法下的统一基准年产能测算

在实际生产运营中，企业往往在年度内同时生产多种产品。若已掌握各产品的历史产能及单件生产时间，可计算其年度总生产时间，并依据该时间占企业全年总生产时间的比例，将年度可用生产时间进行分配，从而在统一时间基准下测算各产品的年产能。企业总可用生产时间计算公式： $H_{total} = C \times N$ 。其中： $C = 2416$ （单个员工年可用工作时间，小时）； $N = 100$ （生产员工总数）。案例示例： $H_{total} = 2416 \times 100 = 241,600$ 小时。各产品过去 12 个月生产时间公式： $T_j = Q_j \times t_j$ 。其中： Q_j ：产品 j 年产能（件）； t_j ：产品 j 单件生产时间（小时/件）。

表 5：各产品年度生产时间消耗案例示例

产品	年产能 Q_j (件)	单件时间 t_j (小时/件)	生产时间 $T_j = Q_j \times t_j$ (小时)
A	200,000	0.5	100,000
B	150,000	0.8	120,000
C	100,000	1.2	120,000
合计			$\Sigma T_j = 340,000$

计算生产时间占比公式：

$$p_j = \frac{T_j}{\Sigma T_j}$$

其中： p_j ：产品 j 占总生产时间比例。

表 6：生产时间占比案例示例

产品	生产时间 T_j (小时)	时间占比 $p_j = T_j \div \Sigma T_j$
A	100,000	$100,000 \div 340,000 \approx 0.30$
B	120,000	$120,000 \div 340,000 \approx 0.35$
C	120,000	$120,000 \div 340,000 \approx 0.35$
合计		$\Sigma p_j = 100\%$

分配标准化年工时公式： $H_j = p_j \times H_{total}$ 。其中： H_j ：分配给产品 j 的标准化年工时（小时）。

表 7：各产品标准化年工时分配案例示例

产品	时间占比 p_j	标准化年工时 $H_j = p_j \times H_{total}$
A	0.30	$0.30 \times 241,600 = 72,480$ 小时
B	0.35	$0.35 \times 241,600 = 84,560$ 小时
C	0.35	$0.35 \times 241,600 = 84,560$ 小时
合计		241,600 小时

计算等效年产能公式： $Q_{j,year} = H_j / t_j$ 。其中： $Q_{j,year}$ ：产品 j 的等效年产能（件）。

表 8：各产品等效年产能测算案例示例

产品	标准化年工时 H_j (小时)	单件时间 t_j (小时/件)	等效年产能 $Q_{j,year} = H_j \div t_j$ (件)
A	72,480	0.5	144,960
B	84,560	0.8	105,700
C	84,560	1.2	70,467

计算企业总体等效年产能公式：

$$Q_{Total, year} = \sum_j Q_{j, year}$$

案例示例： $Q_{Total, year} = 144,960 + 105,700 + 70,467 = 321,127$ 件。

此方法基于统一的 2416 小时标准时间基准，消除了年度工作日差异和实际出勤波动的影响，便于跨年度、跨企业对产能进行比较和优化分析。通过按生产时间占比分配资源，合理反映了各产品对整体产能的贡献，为企业多品类产品的产能测算和资源分配提供了科学依据。

2.7 企业年生产能力测算方法适用性总结表

表 9：企业年生产能力测算方法适用性总结表

方法名称	适用场景	优点	缺点
2.3 单一产品及规格相近产品年产能测算方法	企业生产单一产品或规格相近产品，瓶颈工序明确	参数明确、计算简便，适合快速评估单一产品产能	不适用于产品多样化，无法反映多品类产能差异
2.4 多条独立生产线年总产能测算方法	企业拥有多条独立生产线，生产线间无资源共享瓶颈	逻辑清晰，适合多生产线并行测算，计算准确度较高	需详细分线数据，计算复杂度增加，忽略产品间资源共享影响
2.5 多品类产品折算为单一代表性产品的产能测算方法	产品种类多、规格差异大，需统一产能基准	便于统一产能指标，简化分析，适合多样化产品	代表性产品选择有主观性，换算系数可能带来误差，忽略产品复杂度
2.6 多产品生产时间占比分配法下的统一基准年产能测算	年度内多品类产品生产，有详实历史产能和单件耗时数据	基于实际生产时间分配资源，合理反映各产品产能贡献，精度较高	依赖历史数据准确性，假设静态，缺乏动态调整机制

使用说明：若企业生产单一产品或规格相近产品且瓶颈工序明确，推荐采用 2.3 单一产品及规格相近产品年产能测算方法，操作简便、效果快速。若企业拥有多条互不干扰的生产线，建议采用 2.4 多条独立生产线年总产能测算方法，适合并行计算。对于产品多样化且需统一产能指标的企业，建议采用 2.5 多品类产品折算为单一代表性产品的产能测算方法，便于整合分析。若企业具备详实历史产能及单件耗时数据，且希望基于时间占比精细分配，推荐采用 2.6 多产品生产时间占比分配法下的统一基准年产能测算，提高测算精度。

2.8 产能的周期性测算

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年产量测算方法。在实际供应链管理和供应商尽职调查过程中，采购方不仅需要了解供应商的年度生产能力，还需掌握不同周期的产能数据，如月产量、季度产量或特定订单周期产能，以满足生产计划与风险评估的多样化需求。基于年度产能测算公式，可将年度总工作时间及产量按周期进行分解。例如，将年度总工时除以 12 可得到月度工时，再结合实际生产节奏调整测算参数，从而获得不同周期内的产能估算。

在供应商尽职调查中的应用价值：周期性能测算可揭示供应商在不同月份或季度的产能波动，帮助采购方识别潜在的交付风险。例如，当某周期产能明显低于申报值时，可能提示生产瓶颈、设备维护或非授权分包问题。周期性能测算可评估供应商在特定周期内是否具备满足订单需求的能力，辅助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和交付安排。结合历史周期性数据，可建立供应商产能趋势分析和预警机制，实现供应链动态管理，及时调整采购策略或生产排期。周期性能测算提供更细化的数据支持，有助于采购方进行风险等级评估、优化供应商管理策略，并指导供应商在生产资源配置上进行改进。周期性能测算不仅继承了年产能测算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还直接服务于供应商尽职调查的核心目标，为风险识别、交付保障和供应链优化提供量化依据。^[4]

三、产能测算方法的应用与局限分析

3.1 供应商尽职调查中的产能测算应用

供应链尽职调查旨在全面评估供应商的经营合规性与实际生产能力，防范虚报产能导致的交期风险及非授权分包相关隐患。^[5]基于本文方法测算的供应商年生产能力，可辅助风险评估流程。风险识别阶段，通过与供应商申报产能对比，结合现场调研数据，判定是否存在虚报产能情况。判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申报产能明显高于通过瓶颈工序测算的最大产能；生产设备数量、工序布局与产能申报不符；生产线作业人数与申报产能不匹配；历史交付记录存在频繁延期或产能不足问题。核查重点应包括瓶颈工序的实际运行状况、关键设备利用率、操作人员出勤及技能水平、生产排班及设备维护记录、以及生产现场的实地观察与访谈，以判断产能申报的真实性。现场核查阶段，基于测算结果，重点核查瓶颈工序及关键资源利用率，确认生产能力的真实性。对异常数据和疑点进行重点询问，结合历史订单执行情况和生产计划，形成综合判断。风险等级评定，将测算产能与实际订单需求匹配，评估供应商交付风险等级，合理划分高、中、低风险等级，辅助采购决策和供应链管理。后续监控与改进，结合动态生产数据和生产异常反馈，调整产能预测模型，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及应变能力，推动供应商持续改善。

3.2 应用价值与局限性分析

基于企业年生产能力测算的方法在供应商尽职调查中，能够有效核实供应商的实际生产能力，从而降低因非授权分包所引发的供应链违规风险。该方法兼顾合规性和操作性，适合多数传统制造企业。然而，以下特殊生产模式可能存在局限，需谨慎使用或结合其他方法辅助评估。高度柔性制造企业，生产节奏与产品种类变化频繁，生产线经常切换，产能受多变工艺和小批量多样化订单影响，静态测算难以反映真实产能。季节性强企业，产能在不同季节波动明显，单一年度产能测算无法捕捉周期性变化，需结合分时段或动态数据分析。采用非传统工作制的企业，如实行轮班制、弹性工时或自动化无人值守工厂，综合计算工时标准及瓶颈资源定义可能需做特别调整。高度自动化及智能制造企业，产能受设备状态、系统联动及智能排产影响，传统基于人工工时的测算方法不完全适用。在此类企业中，产能测算可结合设备实时数据和系统排产计划进行修正。因此，采购阶段的产能测算更适合作为供应商能力的初步评估参考，实际生产排程应结合动态数据及具体运营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2]

结语

本文基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提出了一套操作性强、符合法规且适用于多品类产品企业的年生产能力测算方法。该方法为供应链尽职调查中的供应商产能评估提供了科学、规范的技术支撑，能够有效辅助采购方识别潜在风险，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和稳定性。

未来研究方向可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结合物联网（IoT）数据实现动态产能测算，利用传感器和设备联网采集实时产线运行数据、设备利用率及生产异常信息，构建动态产能模型，实现对产能波动和瓶颈变化的实时监控。智能制造与大数据分析融合，通过智能制造系统集成生产计划、工艺流程与人力资源管理数据，结合机器学习算法预测产能趋势，优化资源配置。多维度风险识别体系构建，将产能测算与质量、合规及环境风险等多因素综合分析，形成更全面的供应商风险评估框架。扩展适用范围至新兴生产模式，针对柔性制造、季节性生产及高度自动化企业，开发适配其特征的产能测算方法，提升方法的通用性和精度。综上，未来产能测算方法将更加依赖智能化与数字化技术，推动供应链尽职调查向更加精准和动态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Heizer J, Render B, Munson C.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13th ed. Pearson, 2020.
- [2] Slack N, Brandon-Jones A, Burgess N. Operations Management. 9th ed. Pearson, 2021.

- [3] Muchiri P, Pintelon 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using 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 (OE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08, 46(13): 3517–3535.
- [4] Chopra S, Meindl P.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trategy, Planning, and Operation*. 7th ed. Pearson, 2019.
- [5] Christopher M. *Logistics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6th ed. Pearson, 2016.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 Calculation Method for Assessing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Supplier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Working Hour Systems

Jie Ma¹

¹ *Universitario Tecnológico Universitam, 22044 Tijuana, B.C., Mexico*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consumer goods market,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is fac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challenges. Among them, supplier overstatement of capacity and unauthorized subcontracting have become major factors leading to delivery delays and compliance risks. Supplier due diligence is therefore regarded as a key mechanism to ensure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with accurate production capacity estimation as its foundat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working hours system, this paper develops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estimation method applicable to enterprises with single products, multiple production lines, and multi-product portfolios. The method centers on bottleneck process identification and time quota measurement, supplemented by multi-product conversion and time allocation strategies, to achieve capacity evaluation under a unified time benchmark while balancing oper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The study not only verifi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method in supply chain due diligence, but also explores its adaptability in dynamic production environments and its future integration with IoT, big data,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feasible technical pathway and decision support for buyers to detect overstated capacity,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hance supply chain transparency.

Keywords: Supply Chain Due Diligence; Capacity Measurement; Comprehensive Working Hour System; Bottleneck Process;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双能双效”导向的高校双师型教师动态培养机制研究

张程¹ 李建峰¹ 张蓉¹ 唐艺文¹ 牟灶燃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新文科建设对高校教师能力提出跨学科融合与技术转化新要求, 然而传统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面临技术响应滞后、学科壁垒难消、评价导向失衡等系统性挑战。本研究主要探索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双师型教师“双能双效”培养的有效路径, 破解能力培养与效能产出断裂的困局。基于文献研究和成都大学文科学院的实证调研, 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与政策文本分析, 创新性构建“双能双效”培养模型: “双能”指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协同发展; “双效”关注教师发展效能与学生成长效能的相互促进与反馈强化。研究设计并论证了以动态需求响应机制为核心的实施路径, 核心举措包括分层认定机制、校企协同机制、评价-激励联动机制及跨学科教学团队强制组建机制。该研究不仅为“实践共同体”理论在文科教师发展中的应用提供了新证据, 更通过制度化的动态响应机制设计, 为同类院校破解师资瓶颈、推动从“资格认定”迈向“能力赋能”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 双能双效; 动态需求响应机制; 新文科; 教师能力重构; 产教融合; 高校双师型教师; 分层认定

基金项目: 第二届成都大学师德师风建设示范项目—双能双效: 新文科背景下成都大学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研究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58

一、引言

(一) 背景

1. 国家战略驱动新文科建设纵深发展

新时代高等文科教育正经历结构性变革。2018 年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理念, 2019 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18 号) 首次将“新文科”纳入国家政策体系。2020 年《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 明确提出“促进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培养知中国、爱中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文科人才”。2021 年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体系”, 要求教师队伍“打破学科壁垒, 强化实践育人”。这一系列政策标志着新文科建设从理念倡导进入制度实践阶段, 其核心是通过学科重组、技术赋能和产教融合, 开展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协同相关部门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创新发展相融合的生态和组织机制^[1], 以重塑文科教育生态。

新文科建设的深入推进对教师能力提出三重挑战。第一、跨学科融合能力, 传统单一学科知识体系难以应对数字人文、知识数字化等新兴领域需求。第二、实践教学能力, 文科教育需从“书斋型”转向“场景型”, 要求教师具备行业经验转化能力。第三、技术应用能力, 人工智能、大数据正重新建构文科研究范式。202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与研究应用指南》, 要求教师“主动适应智能技术变革”, 文科教师需掌握数据可视化、自然语言处理等工具。技术革新可以助力赋能新式课堂, 实现协作式学习以提高教学效率与

[1] 范 (), 2025, 53(02): 119-124.

作者简介: 张程(1990—), 男, 博士,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汉语词类;

李建峰(1983—), 男, 博士,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人类学;

张蓉(1972—), 女, 博士,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党建;

唐艺文(2001—), 女, 成都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牟灶燃(2000—), 女, 成都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推进成果转化。

2. 新文科建设中文科学院面临的共性挑战

当前，国内西部高校文科学院在推进新文科建设过程中，普遍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技术迭代与知识体系更新的协调性有待加强。面对如超高清制作、AIGC 内容生产、非线性编技术、NLP 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文科专业在教学内容更新上存在一定滞后性。如能够独立开设融合前沿技术课程的教师比例不高，相当比例的专业课程仍在沿用较早期的技术案例，教学内容与产业前沿需求之间存在适配差距。部分院校相关专业课程中，近八成内容更新周期较长，未能及时反映技术变革。

第二、学科壁垒的消解与跨界能力的培养尚不充分。新文科强调的跨学科融合，尤其是文科与理工科的深度协作，在实践中仍存在提升空间。以文旅融合方向所需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复原”能力为例，具备相关技术指导能力的复合型师资相对稀缺。跨学院、跨学科联合研究课题数量偏少，有效的跨学科协作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学科间的实质性联动仍需加强。

第三、评价体系对实践性产出的激励作用需进一步优化。在现行教师评价体系中，科研成果（如论文、项目）通常占据核心权重，而产教融合成果、实践教学贡献等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这种评价导向客观上促使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科研活动，相对压缩了其在实践教学准备、企业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时间投入。如何更有效地平衡科研与实践导向，引导教师投入产教融合，是评价机制改革的关键。

这些挑战反映出，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如何有效促进教师能力持续更新、优化资源配置以支撑交叉融合、以及改革评价体系以激励实践创新，是高校文科学院普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成都大学文科学院在推进新文科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上述共性挑战。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在于探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路径与方法，并尝试为实践提供指导。我们以成都大学为具体案例，调研了教师工作部人员及相关文科学院的师生。核心目的是深入理解当前双师型教师建设中存在的关键难点，具体包括：厘清学生对“双师型”教师概念的认知状况及其对实践教学的真实需求，分析两者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考察现有教师评价体系（特别是职称评审）中科研成果与产教融合成果的权重分配现状及其对教师行为导向的影响；评估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更新技术能力的现状及其面临的主要障碍。基于这些分析，研究将构建“双能双效”理论模型并设计相应的机制和办法，力求为应对这些普遍性挑战提供切实可行的思路和操作方案。

其价值在于为提升高校文科师资队伍质量和人才培养实效提供参考。研究成果可为面临类似挑战的高校在推进双师型教师培养时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助力学校优化相关机制。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索有效的培养路径，本研究有助于促进文科教师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协调发展，特别是提升其将行业前沿技术融入教学、设计和实施产教融合项目的能力。最终，推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将有助于高校更好地适应新文科发展要求，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从而整体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就业竞争力的增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动态

1. 国外双师型教师培养范式比较与借鉴

全球范围内，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中“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已形成若干颇具代表性的范式，其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为我国新文科背景下的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丰富的镜鉴。德国“双元制”（Duales System）模式的核心在于将“企业培训”与“职业学校教学”视为两个既平等又互补的子系统，此举深刻塑造了其师资队伍**的构成。职业学校的教师（Lehrkraft）不仅需具备博士学位及通过国家考试的传统学术资质，更被强制性要求具备至少一年的企业实践经验，以确保其教学不与产业现实脱节。尤为关键的是，大量的实践技能培训由来自企业的“培训师”（Ausbilder）承担，这些培训师本身就是经验丰富的实践专家，他们通过 pedagogical 资格的认证后，即可承担

教学任务。这种“教育者”与“培训者”角色分离却又协同合作的模式，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双师结构”，而非强求个体教师成为全能型的“双师素质”载体（Euler, 2013）^[2]。其成功运转依赖于一套高度标准化的法律框架（如《联邦职业教育法》）以及行业协会的深度参与，确保了培训内容与职业资格要求的动态匹配。

相较而言，美国社区学院系统则发展出一种灵活且以市场为导向的“双师”路径。其师资队伍以庞大的兼职教师群体为显著特征，这些教师多数为来自行业一线的在职专业人士，他们将最前沿的技术、案例与实践经验带入课堂。专任教师虽需拥有较高的学术资格（通常为博士学位），但其聘任与晋升机制同样高度重视实践能力。许多社区学院将行业经验视为聘任的硬性要求，并通过“终身教职”（Tenure）评审中的“服务”（Service）维度，对教师参与产业项目、咨询、课程开发等实践贡献予以制度化认可（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2021）^[3]。此外，“计划性兼职”（Intentional Adjunct）策略被广泛采用，学院通过系统的教学法培训与 mentorship 项目，将优秀的行业兼职教师纳入教学共同体，有效缓解了专任教师实践知识可能滞后的问题，形成了专兼结合、动态更新的“双师”生态。

澳大利亚的“学校中的职业教育与培训”（VET in Schools）模式则提供了在中等教育阶段实现普职融合的独特范例。该模式要求为中学生提供 VET 课程的教师必须具备“双重资格”（dual qualifications）：即正规的教师资格证（Teaching Qualification）以及所授 VET 领域的高级职业资格证（通常为 Certificate IV 及以上等级）。这意味着一名教授 Hospitality 课程的教师，本身既是合格的中学教师，也必须是具备行业认可资质的厨师或酒店管理专家。其师资培养高度依赖与注册培训机构（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sations, RTOs）及企业的紧密合作，以确保教师技能与行业标准保持同步^[4]。这套全国统一的“培训与教育”（Training and Education, TAE）资格框架，系统化地解决了职业教育教师的知识融合问题，为核心素养与职业技能的协同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

英国的“继续教育”（Further Education）部门则呈现出鲜明的“资格导向”与“自主性”特征。其教师专业标准（如教育标准局 Ofsted 的评估框架）将职业能力与实践经验置于核心位置。教师通常需通过“职业教育教学资格证”（PGCE in Further Education）的认证，该认证过程极度强调教学与特定职业领域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机构推行“专业对话”（Professional Conversation）式的教师发展模式，鼓励教师通过反思性实践，将其行业经验转化为有效的教学资源，而非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双证”（Lucas & Nasta, 2018）^[5]。这种模式更侧重于教师内在能力的持续发展与转化，体现了从“资质认定”到“能力发展”的演进趋势。

综上，国际成熟模式对我国的核心启示在于：其一，制度性协同是根基，需通过法律、政策与行业标准构建稳固的校企合作生态，为教师实践提供制度化通道；其二，角色分工可多样化，不必拘泥于个体教师的“双师”化，构建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双师结构”团队或许是更可持续的路径；其三，评价体系是杠杆，应建立多元、包容的评价机制，将对产业实践的贡献纳入学术荣誉与职业发展回报的核心体系。这些经验为新文科背景下构建动态、开放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实践坐标。

2. 国内“双师型”教师研究综述

（1）关于“双师型”教师内涵界定与身份认同的研究

学界对“双师型”教师的本质特征已形成多维度共识。早期研究侧重“双证”（教师资格证与职业资格证）的形式界定^[6]，而近年研究更强调其能力融合与角色重构，亟待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具备一定理论水平、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专业人才^[7]。刘韧等（2025）通过扎根理论发现，“双高计划”背景下教师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其核心矛盾在于社会期待与自我效能感的割裂，表现为对实践教学能力的怀疑及产教分离导致的职业价值

[2] Euler, D. (2013). Germany's Dual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A Model for Other Countries? Gütersloh: Bertelsmann Stiftung.

[3]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2021). AACC 2021 Data Digest. Washington, DC: Author.

[4] 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NCVER). (2020). Austral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atistics: VET in Schools 2019. Adelaide: NCVER.

[5] Lucas, N., & Nasta, T. (2018). The Changing Shape of Further Education: Policy, Curriculum and Practice in the UK. London: Routledge.

[6] . " " [J]. , 2018, 30(4): 12-17.

[7] . 英 范 [J]. (), 2025, 53(02): 119-124.

消解^[8]。学界对于“双师型”教师内涵界定长期模糊不清,使得教师缺乏身份归属,出现群体性身份焦虑。薛寒等(2021)从技术哲学视角提出,其身份需兼具教育性、塑造性与人文性三重属性,主张教师通过“内外兼修”突破“工具化”定位,实现从“局外人”向产教融合“纽带”的转型^[9]。王琴(2022)进一步通过行为事件访谈法构建胜任力模型,提出基准性胜任力(职业精神、知识素养)与鉴别性胜任力(资源开发、自我发展)的二元结构,强调隐性素养对专业身份构建的关键作用^[10]。董照星等(2024)则立足职业教育现代化,提出“企业型教师”、与“教师型员工”的双重角色融合,要求以“德技并修”重构职业内核^[11]。“双师型”教师的身份认同及归属问题日益得到关注。

(2) 关于培养机制与实践路径的研究

培养模式研究呈现“多元协同、技术赋能”的双轨演进。校企合作机制成为核心路径:贾文胜等(2015)提出“校企共同体”框架,通过“人才共聘、资源互通”实现师资能力融合,典型案例包括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与教师脱产入企研发^[12]。制度创新层面,舒娟(2024)基于“1+X证书制度”构建托育专业“课证融通”培养体系,强调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团队模块化重组^[13]。数字化转型领域,李新等(2021)设计“双师型STEM教学模式”,依托线上教师提供“知识块”(理论讲解)、线下教师组织“知识串”(实践串联),实现跨学科能力整合^[14]。王陈欣等(2024)则在国际中文教育中验证“双师混合同步教学”的有效性,通过活动系统三角模型(线上教师-线下教师-学生)破解远程教学效能困境^[15]。此外,王屹等(2018)引入“实践共同体”理论,提出以“共同事业-共享技艺库-相互介入”三要素构建教师成长生态圈^[16]。

学校可以积极整合校内外实践教学资源,拓宽教师技能培训渠道。既深入企业、车间,又邀请业内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将课程与实践紧密结合,充分做到“走出去”、“请进来”^[17]。根据地方行业产业发展的技术研发要求和学校科技创新力量现状,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从而促进校企合作实现双向联动^[18]。

(3) 关于评价认证体系与标准构建的研究

评价体系研究从“资格认定”向“发展性评价”深化。标准构建方面,许建领等(2025)运用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建立市级“三环耦合”模型:专家子体系(行业企业专家库)、认定子体系(量化指标与动态跟踪)、知识子体系(地方产业数据库),强化标准的区域适配性^[19]。国际经验借鉴上,宋雅等(2024)解析美国社区学院评价体系,提出“四维融合”框架:发展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基础性与差异性标准互补、实践能力与应用能力并重、评价结果与职称晋升联动^[20]。量化工具开发领域,刁均峰等(2021)基于德尔菲法构建DECPOIR六维指标(教学设计、工程实践、创新研发等),涵盖19项二级、56项三级指标,为能力诊断提供实证依据^[21]。徐涵等(2024)通过对87项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揭示当前认定存在范畴边界模糊(如“双师结构”与“双师素质”混淆)、激励保障缺位、动态管理不足三大症结,呼吁建立国家-省-校三级分层标准体系。优化整合各项

- [8] , , . " " " " 艳艳 [J]. , 2025, 45(4).
- [9] , . " " 艳艳 [J]. , 2021, 33.
- [10] . " " [J]. , 2022, 34(3).
- [11] , . " " [J]. , 2024(10).
- [12] , . " " [J]. , 2015.
- [13] . 1+X " " 艳艳 [J]. , 2024(9).
- [14] , , . STEM [J]. , 2021, 31.
- [15] , , . " " 艳艳 [J]. , 2024, 45(9).
- [16] , . " " [J]. , 2018(5): 86-90.
- [17] . 英 范 [J]. , 2016,(12):149-152.
- [18] . [J]. , 2016,29(10):15-16.
- [19] , , . " " 艳艳 [J]. , 2025(3).
- [20] , . " " [J]. , 2024(6).
- [21] , . " " [J]. , 2021(10).

资源，克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瓶颈，以求实现高校人才差异化培养^[22]。

(4) 关于制度保障与政策演进的研究

政策研究聚焦“顶层设计-执行效能”的协同优化。从历史演进维度看，徐涵等（2024）将1995–2023年政策划分为三阶段：初步探索期（1995–2000，强调“双证”形式）、内涵发展期（2001–2010，侧重企业实践制度）、全面提升期（2011至今，注重标准系统化），指出政策从碎片化向制度化转型的趋势。制度效能验证中，杨涵深（2023）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证明：政策对高级职称教师群体提升效果显著（ $\beta=0.38, p<0.01$ ），“激励型”政策（如专项补贴）与“保障型”政策（如编制倾斜）存在协同效应，但“约束型”政策（如强制认定）效果不彰^[23]。区域实践层面，全守杰等（2023）基于“双高计划”院校案例提炼“三机制”模型：以综合素质为导向的准入机制（如企业经历量化评分）、激励与监管并行的保障机制（如双师津贴、薪资福利、职称评聘）、实践与培训联动的培养机制（如教师企业工作站、技能大师工作室），但也指出存在“企业参与动力不足”、“校本培训同质化”等执行梗阻^[24]。

总之，当前研究呈现四重转向：第一、理论深化，从身份认同、现代化理念等角度切入，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第二、方法交叉，大规模语料分析、政策计量模型等实证方法广泛应用；第三、标准精细化，市级认定体系、DECPOIR能力指标推动标准落地；第四、技术赋能，双师混合同步教学、STEM教育模式重构教学形态。未来需突破三大瓶颈：国际经验本土化调适不足（如美国发展性评价的应用场景差异）、长效政策激励机制缺位（如企业税收优惠配套）、数字化转型深度欠缺（如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建设）。核心命题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双师型”教师在产教融合中的“纽带”价值，实现从“资格认定”到“能力赋能”的范式跃迁。

(二) 理论基础

1. 新文科理论框架与教师能力重构

新文科建设以学科交叉性、技术嵌入性与价值引领性为核心特征（项久雨，2021），其本质是对传统人文社科知识生产范式的重构。从哈钦斯（Hutchins）的“学科互涉”理论视角看，新文科要求打破学科壁垒，通过“问题导向”的知识整合（如数字人文与计算社会学融合）回应社会复杂议题^[25]。技术赋能层面，舒杭（2022）提出“教育数字化转型”理论，强调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工具不仅改变教学方法，更催生“技术伦理决策力”等新型教师素养^[26]。价值维度上，新文科需锚定文化传承与创新，要求教师具备批判性文化阐释能力（张政文，2022）^[27]，这一理论框架为“双能”模型中理论能力的跨学科整合与技术伦理认知提供根基。这就要求教师在认识文科转型发展中明确专业理念的新定位。

2. 双师型教师发展的理论演进

双师型教师概念从早期“双证叠加”的机械认知^[28]，逐步发展为能力本位的动态成长过程。舒尔茨（Schultz）人力资本理论揭示：教师实践能力是职业教育核心资本，需通过校企协同实现价值增值^[29]。德国二元制“交替循环”模式证明，教师行业经验更新需依托制度化实践回炉机制^[30]。值得关注的是，莱芙（Lave）与温格（Wenger）

[22] 英 范 [J]. ,2021,40(05):109-113+118.

[23] " " 艳艳 [J]. , 2023(3).

[24] , " " 艳艳 " " [J]. , 2023(9).

[25] Hutchins,R.M.(1936).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6] [J]. ,2022,32(11):24-33.

[27] [J]. ,2022,(02):52-58+125.

[28] " " [J]. , 2018, 30(4): 12-17.

[29] 哈 [M]. 1990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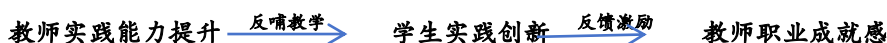
[30] , , , 艳艳 [J].

,2025,11(22):142-145+150.

的“实践共同体”理论指出,教师专业身份在“合法边缘性参与”中构建^[31],这为“校企协同平台”中企业导师与教师的互动机制设计提供依据。新文科视角下,双师型教师需超越技能传递,成为跨学科知识熔铸者与产教价值纽带/枢纽。

3. “双能双效”模型的协同育人逻辑

“双能双效”模型植根于三重复合理论:第一、能力本位教育(CBE)理论,强调以可观测能力目标导向培养(Norton, 1997),“双能”维度中理论能力(如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实践能力(如复杂问题解决)的指标化设计即源于此^[32];第二、教师效能循环理论,班杜拉(Bandura)自我效能理论揭示,教师能力提升触发教学创新动力,进而增强职业成就感^[33],形成“能力→效能”正反馈,此为“教师效能”维度的理论内核;第三、协同育人系统论,哈肯(Haken)协同学指出,系统演化由序参量支配^[34]。模型中“双能”作为序参量,通过课程项目化(如产教融合项目设计)、学习社会化(如双导师制)驱动师生效能协同跃迁,其作用机制体现为:



该模型创新性在于:将新文科特征(跨学科性/技术性)、教师发展阶段性(分层目标)、效能联动性(师生共成长)纳入统一框架,突破传统培养机制中“能力培养与效能产出割裂”的困局。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混合式研究法(质性分析为主导,量化数据为辅),混合式研究法首先通过定量问卷进行初步摸底,识别总体趋势与核心问题;随后依托质性方法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成因与机制,从而实现对高校“双师型”教师建设困境的全景式描绘与深层次阐释。

(一) 文献研究法

为厘清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研 究脉络与结构性症结,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 1975—2025 年间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政策文本及权威统计资料进行系统梳理与批判性分析。以 CSSCI 核心期刊库为数据源,以“双师型教师”“产教融合”等为关键词组合检索,经初筛与去重后共获得高度相关文献 125 篇;通过人工编码与主题聚类,将文献内容归入“内涵界定—培养机制—评价标准—制度保障”四大研究域,并对每域内的概念演进、理论视角与方法取向进行历时性比较。通过上述系统的文献梳理,本文将分散的研究发现整合为“问题—成因—对策”的逻辑链,为后续实证调研与机制设计奠定理论依据与问题锚点。

对 124 篇“双师型”主题文献的聚类结果显示(图 1):研究热点集中于“队伍建设”板块(13 篇),其次为“培养机制”与“能力标准”各 10 篇,而“评价认证”仅 7.5 篇。该分布提示学界已把主要精力投向宏观队伍建设与微观培养路径的建构,却相对忽视评价认证体系的精细化与动态更新研究;未来若能补足“评价认证”短板,将有望打通“培养—使用—激励”全链条,实现研究结构的再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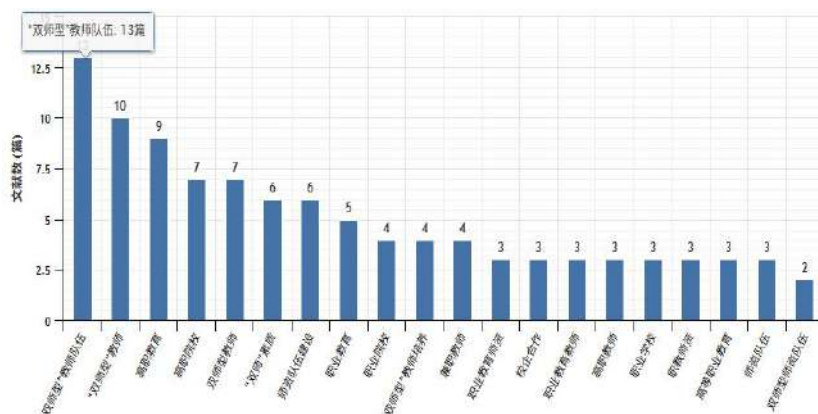
^[31] , . [J]. ,2025,(02):16-22.

^[32] Robert E.Norton, DACUM Handbook,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Employment, College Educ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1997.

^[33] Caprara G V, Di Giunta L, Eisenberg N, et al. Assessing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in three countries[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8, 20(3):227-237.

^[34] [] 哈 . 艳艳 [M]. : ,2005.

图 1：“双师型”主题文献的聚类结果



(二) 定量与定性混合研究法

首先，学生层面通过“问卷星”线上平台向汉语言文学、商务英语、广播电视学等文科专业本科生发放结构化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60 份，依据便利抽样结合专业覆盖原则，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130 份。问卷内容聚焦于：（1）学生对“双师型”教师概念的认知程度；（2）对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感知与评价；（3）自身实践能力获得感与教学满意度；（4）对强化实践教学的期望。

其次，教师层面采用深度访谈法。基于学生问卷初步分析结果及学院师资背景信息，有目的地筛选了 15 位来自不同文科学院（如文新、旅游、商学、法学等）的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核心围绕：（1）参与企业实践、技术更新培训及产教融合项目的实际体验、主要障碍（如时间冲突、资源支持不足、跨学科协作困难）；（2）对自身理论能力（跨学科整合）与实践能力（技术转化、项目设计）的评估与发展需求；（3）对构建“双能双效”模型及动态响应机制（如校企合作、能力考核）的可行性看法与具体建议。

在管理者及官网系统数据层面，研究深度访谈了教师工作部负责人以及 8 位文科学院（如文新、商学、法学院）分管教学或师资工作的副院长，深入探讨：（1）现行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培养体系与评价激励制度存在的瓶颈及深层次原因；（2）资源配置的关键矛盾（如跨学院协调、经费设备支持）；（3）设计并落实“双能双效”导向动态需求响应机制（如校企深度协作模式、跨学科团队规则、能力更新考核）所需的制度保障与可行路径。同时，系统收集并分析了成都大学七个文科学院（文新、马院、旅游、商学、法学、师范、外国语学院）的师资构成数据。鉴于各学院官网信息更新滞后且不完整，数据收集综合运用了网页资料检索、关键词抓取、词条内容分析等方法。收集的核心数据指标包括：各学院专任教师总数、经认定的双师型教师数量及比例、学历结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分布）、职称结构（教授、副教授等）、专业/方向分布、行业背景信息、近三年教师企业实践情况概览，以及校级和院级相关的双师型教师管理政策文本。此外，研究还收集了反映教师能力发展与教学改革的一手案例材料，如融合新技术的课程大纲修订稿、成功实施的产教融合项目方案、教师教学反思日志、学生参与企业实践的成果作品及相关企业评价证明，为后续研究提供实证支撑。

定性方法运用描述性统计系统分析 130 份有效学生问卷数据，清晰呈现学生对“双师型”教师的认知水平、实践教学能力感知、满意度及需求强度等关键维度的分布特征。其次，对收集到的七个文科学院师资构成数据（专任教师总数、双师型比例、学历结构、职称分布、专业覆盖等）进行结构化梳理与对比分析，客观描述队伍整体特征与内部结构性特点（如新兴与传统专业师资配置差异），并谨慎处理数据中存在的部分信息缺失问题。定性数据方面：对 15 位教师深度访谈记录、8 位管理者焦点座谈转录文本及收集的政策文件进行深入的主题分析。数据整合与解释严格遵循解释性设计逻辑：定量分析揭示的普遍性现象与问题（如学生认知模糊的具体比例、师资结构失衡的具体表现）为定性研究的深度追问（如探寻导致教师实践不足的制度性原因、理解认知传导失效的机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聚焦点；定性分析获得的丰富洞见与深层次理解则用于合理解释定量结果的成因（如评价导向如何影响教师行为、资源配置如何制约能力更新），并为构建“双能双效”模型及其动态响应机制提供了

直接、扎根于实践的依据。

四、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深度剖析

(一) 普遍存在的问题

1. 当前我国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规模性短缺与结构性失衡并存

据教育部数据，2018年全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占比仅39.70%，距离2022年“超过一半”的目标存在显著差距，且生师比达17.89:1，远超16:1的合格标准，扩招背景下缺口持续扩大。^[35]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情况更为严峻：截至2011年，全国260余所此类院校中“双师型”教师比例明显偏低，成为师资结构的“主要短板”；^[36]至2015年，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双师型”教师占比仍不足30%，远低于50%的政策目标。^[37]在队伍结构上，呈现“三高一低”特征：青年教师比例高（35岁以下占66.51%，教龄5年以下者占61.40%），^[38]学历层次提升快（硕士及以上学位者超50%），^[39]理论教师占比高，但具备行业经验的教师比例极低。以典型院校为例，福建某工科学院52%教师为应届硕博直接任教，仅9%来自企业一线；^[40]辽宁省高校中企业调入教师占比仅9%。^[41]这种“校门—校门”的单一来源模式（约占75%）导致教师普遍缺乏企业实践经历，形成结构性缺陷。^[42]

2. “双师型”教师能力短板集中体现于实践教学与技术转化层面

由于教师主体为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其知识结构存在“理论强、实践弱”的脱节现象：专业理论功底扎实，但现场问题解决能力不足，难以将隐性经验显性化并融入教学。^[43]据调研，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实验/实训指导教师占比不足20%，与理论课教师比例倒挂，且资源多集中于传统工科领域，新兴交叉学科师资缺口更大。^[44]更突出的矛盾在于，教师对企业技术更新与岗位标准了解滞后，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错位。这种现象源于实践机会匮乏：教育部虽规定专业课教师每5年累计不少于6个月企业实践，但因企业接纳意愿低、身份界定模糊及教学任务挤压，实际人均连续实践不足2周，挂职往往沦为“盖章工程”。^[45]此外，培训体系呈现“理论化”倾向：岗前培训中企业实践学时不足10%，继续教育以学历提升为主导，专业技能更新课程缺位，导致教师技术迭代能力薄弱。^[46]

3. 制度缺位是制约队伍建设的深层障碍

在资格认定方面，国家层面缺乏统一标准，各省校理解各异：教育部2004年《高职高专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提出“四类”认定口径，但未明确技能等级与成果级别量化指标；^[47]部分院校陷入“双证误区”，将“教师资格证+职业资格证”简单等同于“双师型”，忽视证书与实际能力的等价性，甚至催生速成培训与买证乱象。^[48]概念界定亦存在泛化问题，从初始“教师+工程师”衍生出“双证书”“双职称”“双能力”等多元解释，削弱政策

[35] 王英范, 范英, 范英. [J]. , 2020(8): 81.

[36] . 英 范 [J]. , 2011(4): 93.

[37] , . 英 范 [J]. , 2015(4): 45.

[38] . 英 范 [D]. : , 2018: 21.

[39] . 英 范 [J]. , 2011, 13(4): 93.

[40] . 英 范 [J]. (), 2007(3): 40.

[41] . [J]. , 2016, 7(2): 135.

[42] . 英 范 [J]. , 2010(1): 72-73.

[43] , , . 英 范 [J]. (), 2006(1): 81.

[44] , , , . 英 范 [J]. , 2015, 36(4): 46.

[45] , . 英 范 [J]. , 2012, 31(2): 32.

[46] , . 英 范 [J]. , 2012, 31(2): 31.

[47] , , . 英 范 [J]. (), 2006(1): 80.

[48] . 英 范 [J]. , 2006(1): 80.

执行力。^[49]评价机制则沿袭学术导向：职称评审以科研成果为核心指标（如省级论文发表），实践成果权重不足；薪酬体系未体现“双师型”岗位差异，实践教学津贴普遍低于同级理论岗。^[50]秦捷的调研揭示，辽宁省高校中“双师型”教师与普通教师薪酬福利相同，且与企业同类岗位差距显著，导致高技能人才引进困难。^[51]这种制度性激励缺位，使教师缺乏提升实践能力的内生动力。

4. 校企协同机制尚未突破资源壁垒

虽然部分院校通过共建实训基地、企业挂职等形式探索双向流动，但合作深度不足：企业因担忧技术泄密与生产秩序受扰，多仅提供观摩岗位，拒绝教师顶岗实操；政府配套政策如税收优惠、经费补贴尚未完善，削弱企业参与意愿。^[52]王桂琴的案例显示，合作企业常限制教师接触核心技术领域，导致实践内容与教学需求脱节。^[53]同时，兼职教师渠道不畅：对比美国社区学院兼职教师占比 60%—80%，国内应用型本科院校该比例严重偏低。^[54]人事编制壁垒是主因——企业编制人员转聘高校需重新认定职称，使具备注册建筑师等资质的专业人才难以流入教学岗；“事业编—企业编”身份障碍阻碍双向流动。^[55]尽管个别院校通过“专兼结合”模式聘请企业骨干（如 5 年内引进 129 名兼职教师），但因待遇缺乏竞争力、兼职时间难保障，稳定性不足。^[56]这种碎片化合作难以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使“双师型”教师培养缺乏可持续平台。

5. 培养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加剧了能力提升困境

职前培养环节严重缺失：招聘过度强调博士学位，对应届毕业生倾斜，挤压行业经验人才空间；职前培训侧重教育技术，缺乏企业实操训练，导致教师“零经验上岗”。^[57]职后培训则呈现“自发、零散”状态：校本培训内容单调，企业参与度低；培训经费匮乏（某校 300 名专业课教师年人均实践经费不足 300 元），且结果不与职称、薪酬挂钩。^[58]更关键的是，培养模式未能区分教师与企业人员的目标差异：教师实践应聚焦新技术跟踪与课程转化，但现行安排常与学生顶岗实习混同，缺乏针对性设计。^[59]邢赛鹏团队提出的“三类型”分级培养试点（理论教学型、实践教学型、应用研究型）虽使某校“双师型”比例由 27% 升至 38%，但高级人才占比仍不足 8%，反映系统性培养方案尚未普及。^[60]

综上，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普遍面临规模不足、能力脱节、制度缺位、协同乏力与培养失焦等多维挑战。其核心矛盾在于：政策目标强调“双能”融合，但制度设计仍受传统学术路径依赖，未能构建适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师资发展生态。破局需从标准统一、评价重构、校企协同三方面进行系统性制度创新。

（二）成都大学“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调研

1. 校院公开信息结构化诊断

聚焦成都大学文科学院，其现状剖析所依据的数据严格来源于对成大官网、成大新闻官网、成大党委人事处官网、成大党校官网及各文科学院（如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官网的系统检索与信息提取。

[49] . 英 范 [J]. , 2018, 30(4): 30-31.

[50] , . 英 范 [J]. , 2009(5): 235.

[51] . [J]. , 2016, 7(2): 136-137.

[52] . 英 范 [J]. , 2016(9): 125.

[53] . 英 范 [J]. (), 2007(3): 41.

[54] , . 英 范 [J]. , 2009(5): 235.

[55] , . 英 范 [J]. , 2012, 31(2): 31.

[56] . 英 范 [J]. , 2010(1): 74.

[57] . [J]. , 2016, 7(2): 136.

[58] . 英 范 [J]. (), 2007(3): 41-42.

[59] . 英 范 [J]. , 2018, 30(4): 33-34.

[60] , , , . 英 范 [J]. , 2015, 36(4): 48.

(1) 核心数据透明度缺失制约评估效能

学校层面在 2022 年 7 月展示全校“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已达 74%，法学院在 2025 年 7 月报告其比率超过 80%，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在 2022 年 1 月宣称比例达 90%，师范学院截止 2024 年 12 月其学院简介中展示双师型比例超过 70%。但检索结果显示，这些关键数据的具体内涵（如认定标准、统计口径）及其在文科学院内部的详细分布情况，在公开的校院两级官网信息中均未得到充分披露。尤为关键的是，针对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双师型”教师具体比例或详细名单，在现有检索结果中未能找到任何相关报告或数据信息。这种数据呈现的模糊性与选择性发布，使得外界乃至校内难以精准把握各文科学院“双师型”师资的真实规模、质量及其建设成效，阻碍了对建设瓶颈的准确诊断和政策调整的针对性。

(2) 教师实践能力要素呈系统性盲区

官网检索结果明确显示，各文科学院普遍存在师资信息公开不完整的问题。例如，商学院有 11 位教师的职称信息未明确标注；师范学院有 15 位教师的学历信息未公开。其次，对于衡量“双师型”能力至关重要的企业实践经历、行业资格证书持有情况、具体参与的产教融合项目及其成效等核心信息都未明确指出。这种关键信息的集体性缺失，导致难以有效评估文科教师是否真正具备深厚的行业实践经验及其向教学转化的能力，即“双师”素质的核心要素处于统计盲区。

(3) 兼职教师与实务导师实际贡献度难以衡量

检索发现，各文科学院普遍引入了一定数量的实务导师（兼职教师），如法学院有 12+1 位特聘实务导师，师范学院有 41+14 位兼职导师，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有兼职教师等。虽然这些人员理论上可以弥补校内教师实践经验的不足，但现有检索发现官网仅展示工作单位等简单信息，缺乏对其行业背景深度、参与教学的实质性程度（如授课量、指导项目、共建课程）、以及其作用机制的系统性描述。这种兼职师资的引入是否有效转化为“双师型”教学能力，其与校内专职教师的协作模式如何，均缺乏检索所得数据的支撑和效果评估，使得兼职队伍对“双师型”建设的实际贡献成为一个疑问。

(4) 校企合作与教师能力培养的深度关联性不高

官网检索数据显示，各文科学院均建立了数量庞大的校企合作单位和实习实训基地（如文新学院 19 个、旅游学院 25 个、商学院 31 个、法学院 18 个校地合作+16 个校企合作、师范学院 10 个、外国语学院 17 个）。然而通过我们的调研，这些合作关系的建立本身，有些企业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校内教师“双师”能力的提升。其合作项目未真正为校内教师提供了深入行业一线、参与实际项目、更新知识技能的机会（即教师的企业实践），以及这些实践经历如何反哺教学。并且检索结果中教师个体的企业实践具体数据也未展示，官网信息中未见将教师派驻合作单位实践锻炼或联合开展技术研发的详细报道。通过教务处的官网检索获得的教师培训信息（2024-2025）显示，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教学管理系统操作、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考试组织、教材申报以及较宽泛的“数字化素养”、“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方面，虽涉及少量智能工具应用（如计算机学院 AI 培训、智能制造专班），但缺乏针对文科专业特性、深度结合其合作行业（如传媒、法律、文旅、商贸、教育等）的、旨在提升教师本专业领域实务技能的专项培训记录。这表明，丰富的合作资源可能尚未有效转化为对校内文科教师实践能力系统化、常态化的培养机制。

(5) 师资结构失衡可能影响整体质量

依据检索汇总的师资数据观察，虽然部分学院（如法学院、旅游学院）宣称了较高的“双师型”比例或博士率（法学院博士率 80%），但结合其他数据，潜在的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例如，法学院拥有 40 名专任教师，其中副高及以上职称仅 8 人，正高比例相对不高（8+1 人），其宣称的高“双师型”比例与其高级职称比例之间是否存在张力值得探讨。外国语学院 127 名专任教师中（教师名录），已经拥有博士学位的不足 20 人，占比显著低于其他学院。师范学院 82 名专任教师中，有 15 人学历未公开，6 人仅学士学位，33 人博士学位，其高层次人才比例可能面临挑战。商学院虽具高博士率/副高率（83.4%），但同时存在大量职称、学历信息未知的教师。

这种学院间及学院内部在学历层次、高级职称比例上的差异,以及关键信息的不透明,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稳定性和均衡发展埋下了隐忧。

综上所述,基于对成都大学官方及院系官网的检索所得信息,其文科学院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上,面临核心数据不透明、教师实践经历信息缺失、兼职师资作用模糊、校企合作深度转化不足以及内部结构发展不均衡等多重现实挑战。这些现状表明,当前的建设成效更多体现在宏观比例宣示和合作平台搭建层面,而在教师个体实践能力精准画像、实践经历与教学的深度结合、以及基于详实数据的精细化管理和政策支持等方面,仍存在显著的提升空间。解决信息黑箱、建立教师实践能力档案、深化校企合作内涵、优化师资结构并完善配套的实践导向型培训体系,是突破当前瓶颈的关键方向。

2.校院治理机制深度解构

我们走访了教师工作部及部分文科学院核心管理层,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获取一手政策文本与实践案例。访谈内容涵盖行业实践能力界定、培养举措、转化机制、痛点分析及制度诉求五大维度,形成校院两级视角的交叉验证。基于访谈实录的质性分析,本部分从以下层面剖析现状:

(1) 行业实践能力界定呈现学科化差异,校级认定标准尚显粗放

校级层面对双师型教师的认定采取“入门级、通用型”标准,未针对文科特性制定差异化要求。这促使文科学院自主探索符合学科属性的实践能力内涵。F学院明确将“行业实践能力”细化为四大实务维度:参与地方立法论证与司法改革调研;担任政府法律顾问、陪审员等公共职务;主持社会治理类横向课题;从事兼职律师工作。其界定强调实务参与深度与社会影响力并重,并将政策咨询、智库报告等社会服务成果视为重要实践产出。相较之下,S学院虽未明确定义,但其考核激励政策实质认可了“政策批示采纳、案例库建设、指导学生双创获奖”等成果,体现出对知识应用与成果转化的侧重。

W学院基于其国家级一流专业(汉语言文学)与三个校级一流专业(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学、汉语国际教育)的差异化定位,将“行业实践能力”分解为三大核心维度:全媒体内容生产与运营能力:覆盖数据新闻可视化、纪录片创作、新媒体产品设计、AIGC内容生产等数字传播技能;文化传播与国际转化能力:强调中华文化阐释、城市叙事、跨文化传播及“成都故事”国际表达;前沿技术应用与伦理决策能力:要求掌握Python语言、舆情监测、智慧融媒技术,并能应对AIGC伦理挑战。

L学院紧扣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酒店管理四大专业群的应用型定位,将“行业实践能力”细化为四大核心维度:旅游全产业链运营能力:覆盖旅游规划策划(对接旅游管理专业)、景区智慧化管理(旅游管理)、目的地营销(旅游市场营销课程)及高端酒店数字化运营(酒店管理专业);文化创意产业化能力:强调文化IP孵化(文化产业管理)、演艺活动策划(演艺娱乐经营管理课程)与文创产品开发(文化产品开发与经营课程);会展项目全流程执行能力:包括会展策划(会展项目策划与管理课程)、空间设计(展示空间与设计课程)与商业会展运营(会展场馆经营与管理课程);国际化服务管理能力:突出国际酒店集团标准(酒店管理专业)、跨文化服务(旅游商务英语/酒店英语口语课程)及民宿/露营地新业态管理(酒店管理就业方向)。

各学院均未将“企业实践成果”与“社会服务成果”机械等同,而是依据自身文科属性拓展了实践外延。

(2) 培养举措以资源整合与制度激励为核心,形成多元实践路径

学院层面着力构建“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机制。F学院通过共建实体化平台(如与司法关联建实训基地)、推行双向挂职制度(教师赴法学会挂职、行业专家任兼职导师)、实施实践成果转化激励(横向课题纳入科研考核、职称评审加分)三大举措,形成“双师同堂”等教学模式创新。S学院则侧重双导师团队建设(业界专家与校内教师共带研究生)、依托区域性研究平台(成渝双城经济圈研究中心)开展社会服务,并通过“揭榜挂帅项目”专项支持案例库开发。

W学院构建了“政产学研用”多维联动机制,部校共建平台深度赋能:依托与成都市委宣传部共建的新闻学院,联合四川日报、成都广电等12家实习基地开展“双师同堂”(如《广播电视采访》课程由业界记者驻校授

课)；数字实验室驱动技术转化：通过省级哲学社科重点实验室“一带一路与巴蜀文化数字化工程实验室”，组织师生参与三星堆文物数字化解说等真实项目；国际项目反哺教学创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选派师生赴语合中心项目，开发“文化体验+语言教学”标准化教案；竞赛成果转化机制：将中国数据新闻大赛一等奖等获奖作品转化为《新媒体产品设计》教学案例包，要求教师带队复制赛事流程。

校级政策提供基础保障，如允许教师脱产实践 0.5-1 年并保障薪酬（教师工作部），但具体实施依赖学院设计。

(3) 实践成果向教学资源的转化初具形态，机制化建设待深化

学院均鼓励教师将行业经验反哺教学。访谈发现大多数学院通过案例汇编与实务工作坊实现情境化教学；如学院支持教师开发行业案例集，并采用“校外专家进课堂”模式（如组织与企业家对话等）。然而，此类转化多依赖教师个体能动性，尚未建立强制性的成果转化要求或系统化的校本案例开发机制，转化深度与广度存在提升空间。

(4) 核心痛点集中于评价困境与资源约束，校院协同求解难题

文科双师建设面临的核心障碍与普遍性问题高度契合且更为凸显：其一，实践成果量化难，政策建议、智库报告等软性成果难以纳入传统科研评价体系；其二，时间冲突尖锐，教学科研压力挤压持续实践时间；其三，专项经费匮乏，校企合作深度不足。对此，S 学院提出针对性对策：推行“弹性实践周期”（利用寒暑假集中实践）、探索“社会服务贡献评价”（按政策采纳层级、媒体转载量等影响力指标考核）、建立“双师型教师弹性考核机制”（将实践纳入工作量）。W 学院的矛盾呈现媒介融合特性：作品评价标准缺位，数据新闻、纪录片等新型传播成果在科研评价中难以量化（尤其影响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学专业教师）；技术迭代压力突出，AIGC 工具、智慧融媒系统等前沿技术应用能力更新速度远超传统培训周期；双师结构不均衡，汉语言文学专业双师型教师仅 4 人（占比 17%），与其国家级一流专业地位不匹配。

校级层面虽拟通过师德项目与教师发展项目提供经费支持，但未设立专项预算，资源瓶颈仍需突破。

(5) 制度创新诉求聚焦长效机制与跨学科协同

学院对校级支持的诉求超越经费层面，强调系统性制度设计：呼吁搭建全校性“文科双师资源对接平台”以打破信息壁垒（F 学院）；建议职称评审加大实践成果认定、开展“双师能力认证培训”并颁发行业资格证书（M 学院）。更深层的建议指向跨学科融合与双向认定机制：F 学院提出组建“文科双师跨学科团队”以突破单一学科局限，并建立“行业-学术成果双向认定”机制；W 学院的诉求强调技术赋能与评价破界，建立“融媒作品学术等效认定”制度，将省级以上媒体采纳的新闻作品、点击量超百万的新媒体产品等同核心期刊论文；设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工作室”，整合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教学）+网络与新媒体（技术呈现）+汉语言文学（文化阐释）师资开发数字文化产品。这些诉求直指新文科建设中知识整合与评价范式转型的核心挑战。

3. 学生群体认知调研分析

(1) 数据样本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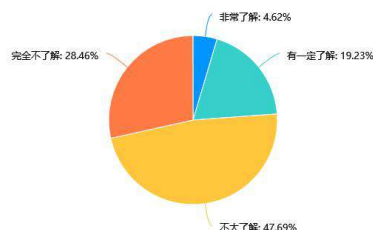
我们又从学生视角出发，围绕新文科背景下“双师双能型”教师建设机制展开调研，通过“问卷星”线上平台共回收有效问卷 130 份。样本采用便利抽样方式，覆盖了汉语言文学、商务英语、广播电视学等新文科专业的学生。调查内容包括学生对“双师型”教师的概念认知、教学作用评价、改进期望及教学质量反馈等方面，为优化教师培养机制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2) 建设现状与核心问题

调查显示，学生对“双师型”教师概念的认知水平整体偏低。其中，47.69% 的学生表示“不太了解”，28.46% 的学生“完全不了解”，而“非常了解”的学生仅占 4.62%。这一结果表明，多数学生对于双师型教师的基本内

涵、核心能力要求及其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关键角色缺乏清晰认识，反映出相关概念在学生群体中的普及与传播效能存在明显不足。

图 2：学生对“双师型”教师概念的认知状况



学生对双师型教师概念的认知薄弱，本质上折射出职业教育特色理念传导机制的欠缺。双师型教师作为衔接理论教学与实践技能培养的关键节点，其价值实现有赖于学生的充分理解。然而，当前的认知现状表明，学生对于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特定机制——如双师资质认定标准、实践能力的具体要求等——普遍缺乏基本了解。这种认知缺失不仅导致学生难以准确辨识和评估双师型教师的教学成效，更制约了其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导向”本质特征的深入把握，最终对达成既定人才培养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4. 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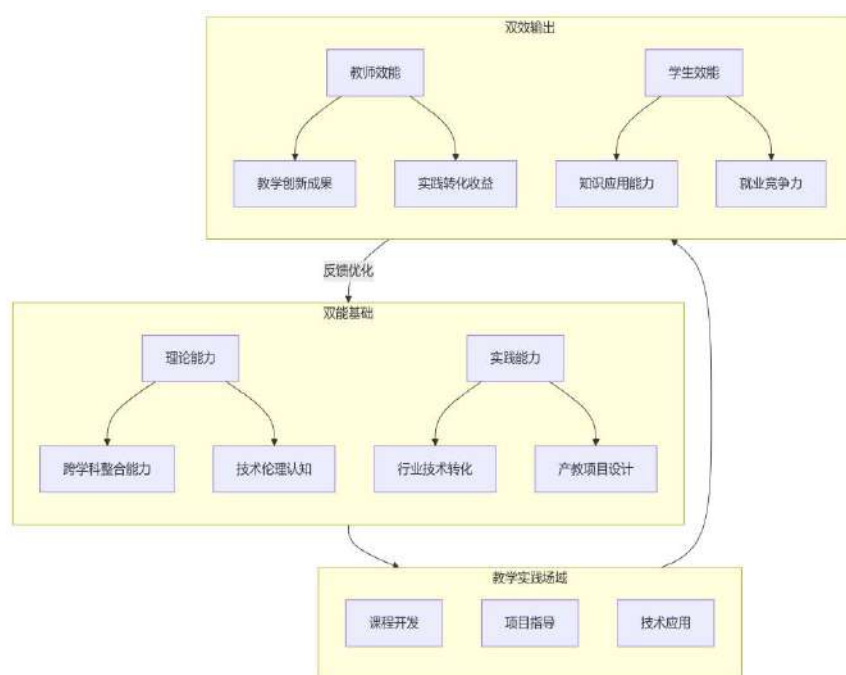
成大文科“双师型”队伍建设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仍面临三方面优化空间：校级层面公布的高比例数据（74%-90%）因缺乏配套的认定标准和统计口径说明，降低了成果的可验证性；教师企业实践经历、行业资质等核心能力要素在公开信息中的系统性缺失，反映出数据精细化管理的提升需求；尽管建成校企合作基地超 120 个，但教师深度参与行业实践（如派驻锻炼、联合研发）的实证记录不足，且培训内容与法律、传媒等文科实务需求的衔接度有待加强，凸显资源向能力转化的深化空间；而 76.15% 学生对“双师型”概念认知不足的调研结果，则提示育人终端价值传导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值得肯定的是，校院协同已孕育出富有学科特色的创新实践，如法学院构建的司法实践四维能力框架、商学院推行的“双导师+揭榜挂帅”教学转化机制等，为后续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未来若能在三方面深化协同：建立教师实践能力动态档案库以增强数据透明度，探索行业-学术成果双向认定机制以激活转化效能，将双师理念融入课程设计以弥合认知鸿沟，成都大学有望在“双能双效”目标引领下，实现从规模达标向质量升华的跨越式发展，为新文科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式。

五、双能双效模型及其视野下的培养机制和措施

（一）双能双效视域下“双师型”教师素质模型

面对产教融合纵深推进的需求，“双师型”教师素质不能再以静态“双证”为终点，而须形成可循环的“输入—转化—输出”链。模型因此设置三层递进结构（图 3），逐层承接、互为因果：能力储备提供原料，实战应用完成加工，效果验收反馈质量，由此形成螺旋上升的闭环。

图 3：“双能双效”分层框架模型



1. 第一层：“能力储备”首先解决教师“有什么”的问题

理论维度上，教师必须能够跨学科整合理、工、文、艺知识，例如将文学叙事与数据可视化技术并置，如语言学教师能设计“方言文化数据可视化”教学单元；同时须具备技术伦理判断，能在课堂中引导学生识别并矫正AIGC生成内容的偏见。实践维度上，教师不仅要熟悉企业级技术，更要具备把技术“课堂化”的能力——将短视频运营技巧、自媒体算法拆解为可操作的实训任务，并能独立设计校企合作项目，如带领学生为博物馆开发VR导览脚本。储备层的目标是让教师同时拥有“知识整合力”和“技术转化力”，为后续教学变革奠定基座。

2. 第二层：“实战应用”回答“怎么用”的问题

教师将上述储备注入真实教学情境：如语言学教师在既有课程嵌入“方言文化数据可视化”实操模块，让学生采集方言语料、清洗数据并完成交互式地图；同时以企业真实需求为牵引，指导学生为文旅公司训练AIGC文案模型，或策划线上艺术展览的全流程运营。此阶段的核心是把课堂转化为“生产现场”，使教师的储备能力在真实项目中得到淬炼，学生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同步成长。

3. 第三层：“效果验收”则追问“用得怎样”

教师效能以可量化的成果为标尺：教学创新通过开发并上线的前沿课程包数量、获批的技术教学专利件数来呈现；实践转化以横向课题到账经费增长率、技术转让实际收益为度量，如VR导览系统被博物馆正式采购；行业影响力则体现在教师受聘为技术顾问、参与制定“数字文旅解说技术规范”等实质性贡献。学生效能同样用“硬结果”说话：知识应用能力以企业真实项目完成率为准，例如文旅直播策划案被采纳并上线运营；就业竞争力则通过雇主满意度、起薪增幅等客观数据验证——参与项目学生的平均起薪较传统班级提高35%。这些反馈数据即时回流至“能力储备”层，触发下一轮教师培训与课程迭代，从而保证整个模型始终与市场脉搏同频。

(二) 培养机制与措施

承前所述，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供给、能力结构与培养路径上均暴露出“引进来”不足、“走出去”不深、“培训”失准等共性问题；为避免“问题—对策”的简单对应逻辑，下文以“双能（教学能力+行业能力）—双效（育人实效+服务成效）”为统摄框架，依托既有实证研究对“机制”与“措施”做一体化设计。

1. 机制构建

(1) 概念界定与分层认定机制

国家层面的“双师素质”四条硬标准（讲师及以上职称、行业中级及以上资格、累计两年企业实践、应用技术研究或实践教学成果^[61]）提供了底线规范，但在新文科语境下仍需校本化转译。成都大学文科学院可借鉴白政民提出的“个体双师—团队双师”分层思路^[62]，把认定对象由“教师个人”扩展到“课程教学团队”，并将文学、历史、艺术等专业课程群与文化创意、文旅策划、数字出版等岗位群进行映射，形成“课程—岗位—能力”三位一体认定矩阵。初级层仅要求具备教师资格证+职业资格“双证”；中级层需完成累计12个月企业挂职并产出一项可被行业采纳的文化产品或标准；高级层则必须在近三年内主持到账经费≥30万元的横向课题，并在省级以上文化创意赛事中指导学生获一等奖。由此形成阶梯式、可量化的能力成长坐标，避免“一次认定、终身有效”的静态陷阱。

(2) 校企协同的“旋转门”机制

刘彦林、郭建如的实证研究表明，院系“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每提升1个单位，教师挂职时长增加0.33个月；“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每提升1个单位，时长增加0.35个月^[63]。基于这一发现，成都大学文科学院可构建“6—12—24”递进式挂职链条：第1阶段6个月以文化企业调研、用户画像与需求分析为主，成果形式为调研报告；第2阶段12个月深度参与企业真实项目，成果须为可落地的文化产品或策划案；第3阶段24个月以“产业教授”身份顶岗，负责项目整体运营并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学校层面实行“集中派遣+经费包干”，院系层面负责过程管理，挂职绩效与岗位绩效“双轨”考核，确保教师真正“沉下去、带回来”。

(3) 评价—激励联动机制

传统职称评审重论文、轻实践的偏向已被多项研究证实是“双证”教师积极性低迷的主要症结^[64]。学院可参照“应用型教师系列”单列指标做法^[65]，建立“三维”评价体系：第一维为教学维度，重点考察课堂改革、学生满意度及课程思政成效；第二维为实践维度，将企业项目到账经费、技术专利、文化产品转化率等量化为科研等效分；第三维为社会服务维度，以行业培训、公共讲座、政策咨询等社会收益为衡量。绩效工资中设立占一定权重的“双师津贴”，并实行“低职高聘”——特别优秀的讲师可直接聘为副高岗位，聘期三年、目标考核，未达标者转岗或解聘。由此形成“能上能下、优绩优酬”的激励闭环。

(4) 资源整合与保障机制

研究指出，培训资源碎片化与经费投入不足是教师“走出去”不深的关键掣肘^[66]。学院需依托校长任主任的“双师型教师发展中心”跨部门协同^[67]，整合教务处、人事处、科技处与产教融合办资源，搭建“校—院—系”三级管理平台。经费方面，年度预算中单列“双师”专项，不低于师资总经费的5%，并设立“文化创意产业冠名基金”，用于教师企业实践、行业资格认证与海外访学。培训方面，借鉴“培训需求—课程菜单—企业案例”三位一体机制^[68]，教师可跨学科、跨学院自主选择培训包，培训学分计入职称破格条件，真正实现“资源围着能力转”。

[61] 教育部.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2-10-25 [2025-08-1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2210/t20221027_672715.html.

[62] 白政民.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2007(03): 16-17+28.

[63] 刘彦林, 郭建如.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2021, 20(5): 100-110.

[64] 刘彦林, 郭建如.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2021, 20(5): 100-110.

[65] 白政民.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2007(03).

[66] 刘彦林, 郭建如.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2021, 20(5): 100-110.

[67] 刘彦林, 郭建如.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2021, 20(5): 100-110.

[68] 刘彦林, 郭建如.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2021, 20(5): 100-110.

(5) 持续更新与退出机制

为避免“双师型”资格终身化导致的“能力折旧”，学院应建立“年度复查+五年一认定”的动态管理制度。复查内容包括企业项目更新率、学生评教连续优良率、行业资格证书再认证等，未达标的教师进入“能力预警”名单，需在一年内完成补修或再次挂职；连续两年复查不合格者自动退出“双师型”师资库，转回普通教师序列。通过制度化“退出通道”，保证“双师型”教师队伍始终保持与行业前沿同步的活力与张力。

2. 落地措施

综合前贤研究结果如“行动学习”^[69]、“三阶递进”培养^[70]、“混合式培训范式”^[71]、“企业实践计划”^[72]、“兼职教师蓄水池”^[73]及“科研反哺教学”^[5]等成果，我们将其措施综合并细化为五个连贯环节，形成教师能力持续迭代的闭环系统。

(1) 标准再界定

现有国家“四条硬标准”提供了底线资格，但在新文科语境下，还需把“隐性能力”显性化。如邢赛鹏（2015）等提出的“冰山模型”将教师素质分为显性（学历、职称、技能证书）与隐性（理论教学水平、实践教学水平、应用研究能力）^[74]，为能力指标再设计提供了直接依据。学院据此把“双能”操作化为三类可测项：其一，课堂维度——教师须提交一份基于真实行业案例的“项目化教学方案”，学生评教优良率须 $\geq 85\%$ ；其二，实践维度——在企业挂职期间须独立完成到账经费 ≥ 30 万元的横向课题，或以第一完成人身份取得已转化专利/软件著作权 ≥ 1 项；其三，服务维度——每年面向行业或社区开展继续教育培训 ≥ 24 学时，并出具企业或行业协会的培训效果证明。通过把隐性能力转化为可量化成果，解决了“双师型”认定中“重证书、轻实绩”的普遍弊端。

(2) 三阶递进、分类施策的培养方案

孙建波、张纪轩（2018）在J学院的“三阶递进”模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纵向路径，学校可将其嵌入文科学院培养流程。第一阶段（入职1年内）：岗前培训与导师制并行，导师由具有5年以上企业经历的“金牌双师”担任；教师须完成“课堂诊断—改进—再诊断”循环两次，形成不少于8000字的教学行动研究报告。第二阶段（第2—3年）：进入“企业挂职+竞赛+研修”整合期，挂职企业须与学院签署“一人一方案、一企一协议”，挂职结束须提交包含“商业计划书+课程资源包”的成果组合，成果直接对接校级一流课程建设指标。第三阶段（第4—5年）：以“骨干层”为目标，教师可选择攻读文化创意产业方向博士、赴海外知名高校完成6—12个月访学，或主持省部级以上文创课题；访学或课题成果须在校内公开示范课中进行教学转化，学生满意度 $< 80\%$ 则视为未达标。该纵向路径确保了不同生涯阶段教师的差异化成长，避免“一刀切”培训带来的资源浪费。

(3) 混合式、项目化、成果导向的培养范式

刘彦林、郭建如（2021）提出的“4+8+4”混合式培训范式为横向模块提供了精确模板。学院在此基础上嵌入“文化科技融合”场景：前4周校内理论由校内名师与行业首席策划人共同承担，以“文化IP生成与运营”为主题，完成需求分析、用户画像、脚本创作；中间8周进入企业真实情境，教师需在合作企业（如成都文旅集团、腾讯文创）完成从概念到原型的完整流程，企业导师负责技术路线，校内导师负责教学转化；最后4周返回校内开展案例复盘，教师须以说课+路演形式展示“产品—课程”双向成果，评审组由校企双方及学生代表共同组成，评分低于75分者需进入下一轮补训。整个模块结束后，教师获得“双师型”继续教育学分4分，直接计入职称评审量化指标。

- [69] , . 英 范 [J]. , 2018(6): 100-105.
- [70] , . 英 范 艳艳 J [J]. , 2018(06): 99-103.
- [71] , . 英 范 [J]. , 2021, 20(5): 100-110.
- [72][72] . 英 范 [J]. , 2007(03): 16-17+28.
- [73] , . 英 范 [J]. , 2018(06): 99-103.
- [74] , , , . 英 范 [J]. , 2015, 36(4): 45-48.

(4) 柔性引才与动态管理的双向通道

学校可面向出版传媒、数字内容、文旅演艺三大行业引进兼职人才，人才条件被严格限定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5年以上行业工作经验。兼职教师必须完成40学时教育理论、教学技能与课程思政培训，并通过试讲考核；教学过程中实行“学生评教—同行听课—企业反馈”三维评价，年度得分低于70分者即时退出，优秀者则续聘并上浮协议工资15%。该机制不仅弥补了文科学院编制紧张的问题，也能让行业最新理念与案例实时回流课堂。

(5) 以横向课题驱动教学升级

蔡海云、熊匡汉指出，行动学习的终极目的在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场景”。学校可据此设立“文创+科技”横向课题专项，教师须以到账经费 ≥ 30 万元为门槛，如围绕“巴蜀文化数字化”“成都城市IP孵化”等方向开展研究；课题结题时须同时提交三类成果：一是可嵌入课程的教学案例库，二是面向行业的技术方案或标准，三是学生可参与的真实项目任务书。横向课题成果在职称评审中与国家级项目等效互认，从而把“科研—教学—产业”三元张力转化为教师能力成长的可持续动能。

六、结论

本文以新文科建设对教师能力提出的融合性要求为切入点，系统回应了传统“双师型”培养范式在技术迭代、产教融合与评价导向三重张力下的进步困境。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以及对成都大学文科学院的调查，本文得出三点核心发现。其一，文科“双师型”教师队伍呈现规模性短缺与结构性失衡并存的显性矛盾；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仍受传统学术路径依赖的惯性支配，致使实践能力培养与行业需求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时滞与错位。其二，本文构建的“双能双效”模型首次将“能力储备—实战应用—效果验收”三层递进结构嵌入教师发展全过程，从而在概念层面打通了教师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双能）同教师发展效能与学生成长效能（双效）之间的价值传导链，突破了“能力—效能”二元割裂的长期困局。其三，围绕模型展开了具体落地措施的制定：涵盖分层认定、校企合作、评价激励联动、课程动态校准与跨学科团队组建五项核心举措。

在理论层面，首先，研究将新文科的跨学科属性、技术嵌入性与“实践共同体”理论进行整合，生成了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教师能力发展框架，为文科教师能力重构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其次，通过提出“师生效能协同跃迁”命题，本文进一步弥合了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之间的价值断层，使“教”与“学”在能力建构维度上形成闭环。在实践层面，研究设计的“6—12—24月递进式挂链链条”与“行业—学术成果双向认定机制”为同类型院校提供了可直接移植的操作模板；其中，职称评审“实践维度等效量化法”，为破除“唯论文”顽瘴提供了制度切口。

然而，研究仍有三方面局限亟待后续关注。第一，实证数据集中取自单一文科院校，样本的区域与学科局限可能影响结论的外部效度；第二，制定的具体措施也尚未展开实施，其长期可持续性与路径依赖风险仍需追踪评估；第三，跨校际、跨企业的资源共享平台尚未成型，资源联动的深度与广度仍有待拓展。未来研究可沿三条进路展开：一是开发“双师能力数字画像”工具，对教师实践能力进行实时监测与精准诊断；二是探索“新文科双师认证体系”的区域协作模式，推动资质互认与资源跨域流动；三是在“人文—技术”交叉新兴岗位（如AI伦理师、文化遗产数字化修复师）中验证模型的适配边界，以持续拓展理论的解释半径。

综上，本文通过“双能双效”模型与动态响应机制的系统设计，不仅为破解新文科师资培养瓶颈提供了从现实困境到能力建构的完整解决方案，更以制度创新激活了产教融合的“纽带”价值，推动高校教师发展范式从“资格认定”迈向“能力赋能”。这一框架与路径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新生态具有奠基意义，亦为后续跨区域、跨学科的实证研究预留了充分的对话空间。

参考文献:

- [1]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M]. New York: Freeman, 1997.
- [2] Caprara G V, Di Giunta L, Eisenberg N, et al. Assessing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in three countries[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8, 20(3): 227-237.
- [3] Hutchins R M.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 [4] Lave J, Wenger E.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5] Norton R E. DACUM Handbook [M]. Columbus: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Employment,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7.
- [6]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 [7] [德] 赫尔曼·哈肯. 协同学习: 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8] [美] 西奥多·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M]. 吴珠华, 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 [9] 刁均峰, 韩锡斌.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21(10).
- [10] 古翠凤, 喻晶晶. 产教融合背景下“双师双能型”教师团队建设[J].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 19(06): 10-14.
- [11] 贾文胜, 梁宁森. 基于校企共同体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
- [12] 李新, 李艳燕, 李巧英. 双师型 STEM 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 现代教育技术, 2021, 31.
- [13] 刘韧, 韩玉铭, 刘玉静.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形成机理与化解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5, 45(4).
- [14] 罗正红. 应用型高校双师双能型教师的培养路径[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6, 29(10): 15-16.
- [15] 马平. 新时代应用型高校“双师双能型”教师核心素养体系构建策略研究[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53(02): 119-124.
- [16] 全守杰, 张惠冰.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机制与优化路径——基于“双高计划”职业院校的质性分析[J]. 现代教育管理, 2023(9).
- [17] 舒娟. 基于 1+X 证书制度的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探索——以托育专业为例[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9).
- [18] 舒杭, 顾小清.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与行动框架[J]. 现代教育技术, 2022, 32(11): 24-33.
- [19] 宋雅, 万东升. 美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评价标准的关键特征及现实启示[J]. 现代教育管理, 2024(6).
- [20] 孙宏磊, 伍婷玉, 彭国军, 等. 新时代工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改革与探索——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J]. 高教学刊, 2025, 11(22): 142-145+150.

Research on a Dynamic Cultivation Mechanism for Dual-Qualified University Teachers Guided by the "Dual-Competency and Dual-Efficacy" Framework

Zhang Cheng, Li Jianfeng, Zhang Rong, Tang Yiwen, Mou Zaora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imposes novel demands on university faculty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However,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echanisms for dual-qualified teachers encounter systemic challenges, including delayed responses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persistent disciplinary barriers, and imbalanced evaluation systems. This research primarily explores effective pathways for cultivating "Dual-Competency and Dual-Efficacy" among dual-qualified teachers within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text, aiming to resolve the disconnect between competency development and efficacy outcomes. Drawing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ithin Chengdu University's liberal arts colleges, integrating survey questionnaire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olicy document analysis,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Dual-Competency and Dual-Efficacy" cultivation model. "Dual-Competency" denotes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while "Dual-Efficacy" focuses on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and feedback amplification between teacher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 growth outcomes. The research designs and substantiates an implementation pathway centered on a dynamic needs-response mechanism. Core initiatives include: a tiered qualification recognition mechanism; a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revolving door" mechanism; an integrated evaluation-incentive linkage mechanism; and a structured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team formation mechanism.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eory within liberal arts faculty development but also, through its design of an institutionalized dynamic response mechanism, offers a replicable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for peer institutions seeking to overcome faculty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and transition from mer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towards genuine "capacity empowerment."

Keywords: Dual-Competency and Dual-Efficacy; Dynamic Needs-Response Mechanism; New Liberal Arts; Teacher Competency Reconstruction; Industry-Academia Integration; Dual-Qualified University Teachers; Tiered Qualification Recognition

“四梁八柱”架构下现代产业学院构建路径研究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导向的实践探索

邹鸣民

(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 现代产业学院作为高等教育转型升级和产教融合的主体, 结构失衡、机制脱节、协同失效等是其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基于已有的“四梁八柱”组织模型, 结合典型高校常熟理工学院的推进路径进行结构组织、运转逻辑、适配障碍梳理, 得出企业参与浅、教师转变晚与适配弹性低等问题, 提出了以运行成熟度衡量、企业任务植入、适配性分层与工具化制度等优化路径, 得出聚焦“四梁八柱”模型由结构构建向系统建设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激励、教学协同与能力导向的深度融合, 为现代产业学院的深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样本。

关键词: 现代产业学院; 四梁八柱模型; 产教融合; 能力导向; 教学改革路径; 高等教育治理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59

1 引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 中国高等教育正步入由“大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变革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 全面推进,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助力国家创新驱动和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基于此, 作为产教深度融合主阵地的现代产业学院承担着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精准衔接的使命。

为落实国家深化产教融合发展决策部署,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1]《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2]等一系列文件。各省级单位也已开展产业学院建设试点, 以新的组织形式, 破解长期存在的高校与产业在“共育、共建、共享”方面无法很好地协调的难点、痛点。而在具体实践中, 大部分高校在探索建设产业学院时, 仍然存在着如下三个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定位不清、目标模糊。产业学院到底是教学改革平台、还是校企联合体? 是应用型专业升级版, 还是教育结构调整机制? 多数高校尚未形成清晰的战略认知, 导致功能交叉、职责重叠, 甚至演化为“换牌不换核”的传统学院。

二是体系不全、路径碎片。产业学院建设涉及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平台资源、治理结构、评价机制等多个子系统, 但在实际推进中, 往往缺乏系统架构, 处于“点上发力、线下断裂”的状态, 难以实现结构性突破。

三是协同不足、机制僵化。多数高校仍沿用传统“校内主导、企业配合”的教学思维, 企业参与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和成果评价的程度偏低, 教师“双师型”结构不足, 产教协同停留在形式层面, 缺乏制度保障。

对此, 需要研究形成一套基于系统化、结构化、可操作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模型, 指导高校科学开展产业学院的理念孵化、落地建设。面对这种实践卡点, 部分先发高校(常熟理工学院、广州城市理工学院等)提出以“四梁八柱”模型为主的建设思路, 尝试从组织架构着眼, 在功能定位、管理体制、协同机制、机制保障中构建以政策牵引、平台承载、能力导出为特点的现代产业学院组织形态。

“四梁八柱”模型以“融合产业、能力为本”为上位思维框架, 将支撑产业学院建设的四大关键要素——产教融合机制、产学双轮专业建设、“产教融合”课程体系、多向师资路径, 分解为四梁; 以政策服务保障机制、校企共建平台、融合产教协同教学改革、产业学院企业协同育人、融合“产教融合”课程教学、适应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多维协同育人路径与反馈机制、结构体系绩效反馈作为产业学院建设模型中八大支柱构建产业学院建设模型。不

仅为高校建设提供了全面而清晰的思路,也可以为教育主管部门项目评估、质量评估和财力支持提供架构参考^{[3][4]}。

因此,本文将遵循“四梁八柱”的整体模型来开展研究,综合国家政策规范与地方高校探索的实际经验,探索现代产业学院组织建设的形态优化与建设路径的重塑,期以回应以下关键性议题。

现代产业学院“四梁八柱”模型如何有效回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

不同类型高校在推动该结构模型过程中应如何匹配资源、协调机制、保障路径?

构建“四梁八柱”结构体系对提升教育治理效能与专业育人质量具有哪些推广意义?

本研究的目标是提出一套具有理论支撑、结构逻辑与落地路径的产业学院建设范式,推动产业学院从局部试点走向体系建构,从经验探索走向标准治理,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样本与制度参照。

2 理论基础与政策依据

产教融合深化、区域发展需要、教育治理变革等,是催生现代产业学院发展的现实政策逻辑,而系统化、协同性以及融合性,是产教融合建设理论成熟的教育理论基础。本文所构建的现代产业学院发展“四梁八柱”框架便是基于政策逻辑与教育理论交叉互渗构建的发展构架,是高等教育结构再造、协同机制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综合构架。

2.1 政策依据:国家战略与区域实践共同推进

2017年以后,国家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产教融合发展的相关文件为推进产业学院建设指明了路线图。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5]:明确提出要“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全覆盖,探索建设产业学院”,并强调“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理念。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要求“推动建立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高校参与、机制保障的产教融合新格局”,为产业学院发展设定了组织架构与治理方向。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新时代高教40条”)^[6]:强调“分类建设、特色发展”,倡导建立多元参与、多渠道协同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7]中提出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原则是:坚持产教结合。将人才的培养、教师的专业成长、实践实训、学生的创新创业、企业的服务和科技创新功能紧密结合,推动产教融合与科教融合,打造一个集产业、学习、研究、转化、创新、运用于一体,并且互补互助、互利共赢的实体性创新人才培养平台。

地方政策响应机制:例如,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等地出台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实施办法》《重点产业学院支持方案》^{[8][9][10]}等文件,推动地方高校结合区域特色探索多样化建设路径。

上述政策为“四梁八柱”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土壤:国家战略提供方向性顶层设计,地方政府提供操作性政策工具,院校在此基础上探索结构化实施路径。

2.2 理论依据:教育结构改革与治理现代化理论支撑

OBE(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以终为始”的教育理念强调围绕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素养,反向设计课程与教学过程^[11]。产业学院正是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目标,将人才培养全过程嵌入产业链需求逻辑之中^[12]。本文“四梁八柱”模型中的“能力本位导向”与“面向产出能力驱动”两大支柱,正体现OBE理论的结构嵌入。

CDIO工程教育模式:CDIO(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营-Operate)理念主张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完成全流程能力训练,强调跨学科协作、项目式教学与问题解决能力培养^[11]。产业学院以项目驱动课程体系建设、以工程型团队指导教学实践,正是CDIO的组织化落地^[13]。

教育治理现代化理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核心在于多元主体参与、系统结构治理与制度性协同运行^[14]。产业学院通过校政企行“四方联动”、组织共建、资源共用、责任共担,走出了传统行政主导办学向“共建共治共享”转型的实践路径^[15]。

组织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现代产业学院不是一个孤立的教学改革单位,而是一个“结构+功能”联动的综合平台。本文提出的“四梁八柱”结构正是从组织系统功能视角出发,明确各个支撑模块的目标、职责与协同方式,提升组织稳定性、适应性与进化能力^[16]。

2.3 研究视角融合：从“理念—制度—结构—路径”闭环推进

“四梁八柱”模型并非从单一维度提出，而是在理念、制度、结构与路径四层逻辑闭环中形成的。

理念层：融合业界、能力本位，明确办学核心方向；

制度层：依托国家政策、地方方案构建规则框架；

结构层：通过“梁”与“柱”的逻辑组合形成支撑体系；

路径层：在实践中形成动态优化的建设与评价机制。

这一多维耦合视角保证了“四梁八柱”既具理论逻辑，也具现实操作性，为高校提供了清晰的“组织搭建+功能集成+制度保障”全流程建设蓝图。

3 现代产业学院“四梁八柱”结构模型构建与解析

针对当前产业学院“结构模糊、体系破碎、路径不明确”的常见特征，本文基于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在重点分析当下的多所高校探索的“四梁八柱”组织模型基础上，针对其结构、功能与治理展开详尽分析。该模型作为一种引领现代产业学院体系建设、机制运行与治理协同重要实施框架，以顶层理念“融合业界、能力本位”作为价值导向，以基础平台“现代产业学院”作为基本载体，在建构结构上由“四梁”组成结构主轴，在展开功能上由“八柱”组成功能载体，形成目标引领、制度运行与实践推进全流程组织平台体系。

3.1 总体结构：理念引领下的系统构建逻辑

“四梁八柱”模型以“构建现代产业学院”为结构底座，以“融合业界”与“能力本位”为核心教育理念的顶层引擎，实现从结构到功能、从理念到实践的全面映射。其设计逻辑如下：

横向四梁：承担基础建设职能，分别是产教融合机制、专业建设体系、课程改革体系、师资队伍建设路径；

纵向八柱：对应四梁细化支撑功能，从多主体协同、资源共享、教学体系、认证标准、教学过程、能力导向、交流机制到政策引导，构成产业学院综合能力提升支点；

整体结构具备“稳定性+适应性+拓展性”三大特征，可适配不同高校、不同专业背景与区域政策环境。

3.2 四大结构主梁功能剖析

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制度梁）：构建政校企行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推动校企共建、共管、共享平台，形成产业学院日常运行的制度框架。例如设立“校企双理事会”“企业导师库”“协同育人专项基金”等制度保障^[17]。

双轮驱动专业建设质量体系（专业梁）：聚焦专业内涵建设与产业标准对接，形成“校内标准+行业规范”双轮并行，推进专业动态调整、复合化改造与工程认证对标，提升专业适应性与前瞻性^[18]。

产教融合课程体系（课程梁）：回归工程教育本质，重构模块化、项目化课程结构，嵌入企业案例、产业技术与真实问题，打造贯通“认知—实践—创新”的课程路径体系，实现“学做结合、知行融合”^[19]。

多元交流师资队伍建设路径（师资梁）：建立“校内+企业”的“双师型”队伍，教师去企业研修，企业工程师来上课，创建“产教一体化”的教研共同体，鼓励行业专家参与课程开发及教学评价^[20]。

3.3 八大功能支柱的结构与逻辑关系

上述“八柱”分别锚定结构基础与育人逻辑，在“梁柱结合”的整体架构中提供垂直支撑，使现代产业学院形成稳定、高效、适应性强的运行机制。

3.4 模型的适配性与应用价值

“四梁八柱”模型不仅是结构建构方案，更是具有战略引导与实践指导双重功能的系统范式，具备如下价值：

制度适配性强：可根据不同区域政策体系灵活调整四梁内容，形成校本化设计；

专业拓展性强：适用于工、管、艺、医等不同专业群落的教学组织逻辑；

实施路径清晰：各支柱明确责任单位与考核标准，便于任务分解与指标落地；

评价可嵌入：可与现代产业学院质量评估指标对接，形成“建设-运行-评价”闭环管理模式。

此外，“四梁八柱”框架论能够对现代产业学院从思想到制度再到实践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设计。“四梁八柱”逻辑多维支撑、模块系统组合以及治理导向设计，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及教育供给侧结构优化提供了良好的逻辑支撑。

4 典型案例应用与实践成效分析：以常熟理工学院为例^[21]

常熟理工学院作为国内江苏省的地方高校改革典型之一，在其多年应用型人才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首开“四梁八柱”结构模型地方化应用，具有实际意义与可推广借鉴的应用型高校办学模式。以江苏省“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试点单位”的资格领衔制定江苏省的行业标准，基本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规章制度和教育内容体系以及评价体系，从架构设计到落地实施基本完成“从无到有”循环的闭合过程。

4.1 顶层设计：政策牵引与任务引导的协同发力

常熟理工学院在 2020 年联合地方政府、行业龙头与校内教学部门，共同发布《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以“四梁八柱”为蓝图推动学院改革。学校党委将产业学院纳入年度考核目标与“十四五”发展规划，并由教务处、科技处、校企合作处、各二级学院协同构成专项工作小组，完成“顶层设计—任务分解—推进落实”的组织架构。通过建设“应急管理技术产业学院”“智能制造产业学院”等重点单位，学校探索了“校内资源聚焦+企业任务驱动+平台机制引导”的运行机制，构建起以“政策导向—任务协同”为核心的建设格局。

4.2 四梁结构落地路径清晰

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建立“校地企共建理事会”，明确学校、政府、企业职责分工；设立“企业导师机制”，企业参与教学设计、课程授课与学生评价；推出“协同运行方案”，将企业任务纳入课程实践项目^[22]。

双轮驱动专业建设：开展“专业诊改工程”，与行业协会共建产业标准导向专业群；引入专业副理事长制，每个专业设企业共建副理事长；推动产出导向认证，2022 年已有 3 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初审^[22]。

融合课程体系构建：推出“嵌入式课程模块”，将产业技术、岗位任务融入教学内容；建设“项目导向型课程”43 门，贯穿大二至大四全过程；建立课程共建数据库，企业与教师共享案例、设备、内容^[23]。

师资队伍协同发展：教师双岗制度推行，每年组织教师赴企业实训不少于 30 天；企业专家担任校外兼职教授、校企工作坊负责人；“教学名师+企业专家”协同授课成为常态化安排^[23]。

4.3 八柱支撑机制运行成效显著

学校围绕“八大支柱”建立系统运行机制：

多元协同治理：实行“多元参与+任务负责制”协调机制，学校将产业学院列为绩效考核单位，各参与方拥有明确权责；

平台共建共享：建成校企共享实训基地 5 个、在线课程平台 3 个、联合科研中心 2 个，支持多场景教学落地；

工程认证导向育人：构建“成果-标准-教学”三位一体的认证支撑机制，实现课程目标与产业能力无缝对接；

科教融合双向联动：教师项目承担与课程教学深度整合，科研成果转化进入教学案例转化流程。

4.4 实践成效与社会反馈

截至 2023 年, 常熟理工学院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取得了多项实质性成果:

建成 8 个校企深度融合的产业学院, 覆盖 10 余个应用型专业方向; 学生参与企业真实项目比例提升至 85% 以上, 毕业后半年内就业匹配度超过 90%; 在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产业学院建设典型经验评估”中获评全省第一; 多所兄弟高校借鉴“四梁八柱”模式开展区域推广, 形成“常熟模式”示范路径。同时, 常熟理工学院提出将“四梁八柱”结构推广至“专业集群—教学组织—人才认证—校政协同”多级系统, 逐步形成“产业学院—专业学院—应用型高校”的三级驱动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 常熟理工学院的“四梁八柱”落地实践, 对“四梁八柱”结构模型的配套性、系统性、可发展性进行了充分探索, 做到了提升了教育教学质量, 进而推动了组织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他的经验对全国的高校, 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高校都提供了可供参考、复制与推广的制度模式。

5 当前存在问题与反思

虽然“四梁八柱”结构模型的理论建构在某些高校的运行实践中体现出一定的组织逻辑、比较优势及实用功效, 但面对大的范围推进层面仍然存在结构性组织运行不顺畅、功能支撑作用欠缺、协同效应不明显等问题, 亟待系统思考和战略改善^[24]。

5.1 体制机制障碍: 企业角色边缘化与激励断层

企业深度参与是产教融合的要素之一, 但在产教融合模式下, 目前企业仍然更多属于“合作参与者”而非“治理参与者”的形态。尽管反复强调校企“共建”, 但高校主导权没有真正被突破, 企业在实质上缺乏参与权。企业制度化参与的途径尚未形成, 也没有明确的企业话语权, 利益未得到真实且实质性体现。在教学计划制定和学生评价过程中, 企业是“旁听者”而非“决策者”, 而往往在实际参与时流于“过场式”操作, 缺乏必要的制度化利益牵引、品牌激励、资源优惠等制度力保障, 使其企业投入的动力不强、行为主动性不强、合作的可持续性不佳。因此, 产教融合制度安排的“强联结”缺失是形成当前“四梁八柱”结构强强融合不充分的重要症结。

5.2 标准执行难度: 学科适配与结构移植的双重困境

“四梁八柱”结构模型的提出在工程类、应用技术类专业中获得了较好的实践反馈, 这类专业本身强调项目驱动、能力导向, 天然契合模型强调的“模块化教学”与“岗位对接”逻辑。然而, 当该结构在非典型专业中推广应用时, 其适配性问题迅速暴露。例如, 在传播学、设计学、法学等领域, 教学强调思辨、个体表达、体系建构等认知导向内容, 若一味套用“任务导向—项目驱动”路径, 往往会造成教学割裂与逻辑混乱。某些高校为追求建设统一, 简单“格式化”结构模型, 反而造成课程目标虚置、课程内容碎片化, 学生学习体验变差, 教师教学效果难以量化, 质量保障失效。

更为关键的是, 模型自身专业异质性考虑不多, 基础框架设定太多“技术工科”, 没有考虑管理类、艺术类、交叉融合类专业教学逻辑和能力层级等的专业异质性、弹性执行和可调整的规范要求, 造成员工教学“一刀切”的倾向, 在高校引起教工内部的教学管理矛盾和资源浪费: “一刀切”地让文科教师对接企业但是不知道对接什么, 或者文科教师对接企业课堂不知道如何实现对接; “一刀切”的课程开设注重结构平衡而忽略深度, 在校内造成“看上去规范到位, 实则教学重心飘忽的现状”。防止“看上去统一、实际上是教无对”的现象发生, 模型需要建立“标准契合层”, 在确保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能够允许不同专业根据教学需求和行业特色, 对框架课程内容进行新的重组。

5.3 教师能力转型: 结构推动难敌惯性掣肘, 教学理念与实践能力亟待更新

比学院建设的工程化设计和制度规则的外化构建更难推进的是教师主体素养之升级和理念之转型。因为这一

领域的困境,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主要聚焦于学院建设之软硬件之短板而主要聚焦于教师群体之内部调整。学院体制在学科改革、教学改革和育人改革的新规制下有志向而无动力,而对于学院制度所要求的“主动作为”的教师而言,其中最大的阻力则是来自于既有的认知利益格局。“大学教师评价体系依然是以科学研究为导向,教师更关注于在科技评价竞争规则下的出名和升迁,很少将更多精力用于教育教学改革与产学研合作中的产品与服务打造,更少的人愿为教学改革和产学研合作而“损失”科研成果与学术论文等科研利益”。正是在“价值理性”的认知利益之下,教师群体形成的“最大公约数”便是不爽于“赋闲”、不惯于“接受”,即便被迫接受而未获系统进修和修炼路径,以致于被企业“驻派”人员只“身在企业,而心系课堂”罢了。

其次是很多教师对于“项目导向教学”内涵不了解,更缺乏将企业任务转化为课程项目的开发能力。“产业学院教师既要担任上课老师,又是项目负责人,又是任务策划者,还是评价开发者。”这样的“复合型教学”能力,不是一两天的培训能够培养出来的,而是需要教师长时间、入“境”的体验和跨界化思考的能力。更进一步是教师工作量增加、“激励性薪资滞后”、教学资源不够支持等这些客观现状,这些因素叠加,最终使教师不是“积极改革”而是“被动改革”,在走过场的尝试中不能产生真正的变化。

如果教学真正变成了“任务驱动的应付”,怎么可能达到教学质量要求,怎么可能确保教师实际工程能力对课程内容被学生信任;如果没有教师层面的协同开发课程意愿,怎么可能有效建立项目教学的闭环。产业学院的这种系统设计优势失效,则形成“结构搭建好—功能运作慢”的“结构—功能脱钩”的典型困境。所以,教师能力转型不能完全依赖行政驱动力,也不能完全依赖理念宣贯,至少要通过“理念+结构+支持系统”的三元协同设计加以落实,比如对教师实践成长形成档案、构建企业联合教研制度、将教师项目成果纳入职称评价等方面。

6 优化建议:结构完善与机制重塑的双轮驱动路径

基于“四梁八柱”结构模型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制度漏洞、标尺不合适与能力不足的问题,现代产业学院的建构更应该从结构化和运作机制两个维度提出实现“持续性”“可适配性”“可落地性”的优化措施,下面提出四个切实的路径,即从评价组织、合作企业、专业适配和制度工具化角度实现从“形体塑造”向“系统演化”的转变^{[25][26]}。

6.1 构建“评价—反馈—调优”闭环机制,推动结构动态治理

结构须动态适应动态环境。笔者建议各高校在“四梁八柱”结构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结构运行评价体系,即不单对结构自身评价,还应对结构的运行情况、结构运行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协同度及产出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例如构建结构运行成熟度模型,把“产教协同频率、企业任务深度、课程融合度、教师工程经历”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将实际办学发展过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类。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到教管处,然后指导课程设置、机构和合作机理的调整,形成“建—用—评—改”的良性动态发展循环而非“建完”的静态工程。

6.2 推动“嵌入式企业课程+双导师制”协同教学机制常态化

破解企业“浅层化参与”的关键是角色重构和机制创新。建议从教学任务维度直接“嵌入”企业,固化“课程=项目、任务=教学”的观念,如设置“企业命题”项目课程,将企业中的真实问题拆解成多个教学单元,渗透于整个课程之中。一堂课程设立一位校教师和一位企业导师共同担负,达到“双导师制”,以企业导师负责任务导入和实际操作指导,校教师负责理论基础和评价考核,构建“理论+实践”协同教学模式。

为保障企业积极性,地方政府或高校可设立“企业参与教学专项基金”,给予参与课程开发与教学任务的企业财政补贴或研发积分支持。对于长期参与协同教学的企业,还可在政策评优、品牌宣传、职称评定中给予优先权,从而使企业在制度上形成“投入—产出—认同”的参与闭环。

6.3 搭建“分层分类”专业适配模型,推动个性化结构重构

“四梁八柱”模型在专业层面的适配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应基于专业属性与能力要求的差异,建立“分层分类”的适配机制,避免结构僵化导致教学失效。具体而言,可按“应用强度”将专业划分为三类:工程技术

术类（高强度嵌入）、管理经济类（中等强度嵌入）、人文艺术类（弱嵌入+延展性导向）。针对不同类型专业，分别设计适配路径。例如，在工程类专业中，“课程—任务—项目”路径应贯通全周期；在管理类专业中，可侧重“数据应用—组织分析—策略执行”导向，弱化动手操作，强化模拟实训；而在人文艺术类专业中，则应将“创意表达—场景设计—交互反馈”嵌入课程评价与教学过程之中，采用“主题式教学+案例反推”的方式实现“工程逻辑”的柔性迁移。这一分层模型可提升模型的通用性与包容度，缓解不同学科背景下的教学结构冲突。

6.4 推动结构工具化发展，实现从经验复制向制度治理升级

作为建设模型，“四梁八柱”的意义不应当仅仅停留于理论的或经验的层面，而是应该将“可复制的经验”升维为“可治理的制度”。为此，需要将模型转化为“工具化、手册化、指标化、平台化”的一揽子治理产品，并通过政策耦合、标准固化、绩效倒逼三条路径，实现由“学校自选动作”向“国家—省级制度导向”的跃迁。具体实施逻辑可概括为“1 套基础规范、3 级操作手册、4 类数字工具、5 项政策耦合、6 步治理闭环”。

1.1 套基础规范，将“四梁八柱”转译为“国标条文”：以教育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升级版为载体，将“四梁”（价值体系、治理体系、培养体系、评价体系）与“八柱”（校企协同机制、课程重构机制、项目制教学机制、师资混编机制、资源共享机制、质量保障机制、成果转化机制、持续改进机制）逐条写入“建设标准条文”。条文采用“功能描述+最低量化指标+可选高阶指标”三段式写法，既给高校留足特色空间，又为评估与认证提供刚性刻度。

2.3 级操作手册，让不同主体“拿来即用”：校级版《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操作指南（V2.0）》将以“任务清单+流程图+模板表单”方式呈现，共 100 个控制节点、37 张工具表单、12 份合同模板；省市版《区域现代产业学院集群建设指引》将聚焦“跨校共享、跨企协同、跨业融合”，提供产业链图谱、校企匹配算法、财政奖补测算表；认证版《产业学院治理绩效评估指引（试行）》将与工程教育认证、高水平专业群评价、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做指标映射，形成 6 大维度、28 项核心指标、5 级评分标尺，可直接嵌入专家进校考察工具包。

3.4 类数字工具，将制度“装进系统”：产业学院数字孪生平台将实时映射校企共建课程、项目、师资、设备等关键节点运行状态；“能力图谱”自动生成器将输入毕业要求即可自动分解为课程—项目—任务三级矩阵，一键输出课程地图；校企协同项目管理 SaaS 将内置合同模板、进度节点、绩效仪表盘，实现项目制教学全过程留痕；绩效评估小程序可以让教师、企业导师、学生三方在线评分，结果自动回传省—校两级质量监测平台。

4.5 项政策耦合，让“自选动作”升级为“制度刚需”：高水平专业群遴选将“四梁八柱”建设完成度设为 A 类门槛指标（权重≥15%）；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将校企联合课程占比、企业导师授课学时等核心指标纳入必选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在“持续改进”条款中增设“产业学院治理机制”观测点；省级财政奖补采用“基础补助+绩效奖励”双轨制，绩效部分以评估结果为准；学位授权审核：对依托产业学院申报的新工科或交叉学科学位点给予单列通道、优先支持。

5.6 步治理闭环，确保制度落地不走样：通过“在线备案—实时监测—入校诊断—绩效评估—整改闭环—案例迭代”六步闭环，将产业学院建设全过程纳入数字化、标准化、可问责的治理轨道，确保制度落地不走样、持续升级可复制。

通过以上“1+3+4+5+6”工具化与制度化设计，可将“四梁八柱”模型从“校内经验”升格为“国家—省级—校级”三级治理标准，真正实现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由“经验复制”迈向“标准治理”。

7 结论：从结构搭建走向系统治理的战略跃迁

“四梁八柱”结构模型的提出是对现代产业学院组织建构、功能构成及协同治理上的系统缺位，进行的一种系统性修复，以可操作、可借鉴、可推广的形式，针对高校开展结构稳固、机制封闭、功能闭环的产教融合平台体系建设提供了借鉴。该模型以横向的“四梁”来建构产业学院的运行框架，以纵向的“八柱”来实施功能的落实、协同的落地和路径的导引，同时嵌合互构，建构逻辑清晰，操作路径明晰，在系统与实用上兼具了“理念—制度—结构—路径”四位一体的系统化设计思维。

研究还认为，该模型的应用不仅仅是高等院校内部从“组建平台”到“系统治理”的实现，更为关键的是推动教学系统、师资系统与评价系统的一体融合，为我国高等教有院、高校在经济转型发展态势之下“推动结构变革”与“进行系统协同”奠定了具有可持续性的范例。

然而，任何结构模型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框架，其效果最终取决于运行机制是否顺畅、利益关联是否清晰、资源协调是否高效。正因如此，本研究特别强调模型的“适配性调优”与“动态治理”，强调应根据不同院校的资源禀赋、专业类型与发展阶段，建立因校制宜、因专业制宜的个性化运行路径，防止“标准泛化”“结构空转”的治理风险。

未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域产业政策等多元因素的持续搅动与影响，现代产业学院的结构调整与治理将迎来复杂的“三重门”。作为“四梁八柱”，“结构”需要持续地迭代进化，“进化”的路径会从“静态结构”转向“智慧结构”，从“人治经验”转向“数据算法”，从“理念、机制、制度”这三个层面的共同构建，无论是从理念上强调“以生为本、以能为纲”，还是从技术上引入智能平台、全过程数据跟踪机制，抑或是从制度上构造多主体协同、任务各方责任共担、成果可观可评的运行方式，现代产业学院才能真正走出“重建设、轻治理”“有结构、无机制”的窠臼，进入质量高、可持续、可复制的良性教育治理新模式。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Z]. 2014.
- [2]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Z]. 2017.
- [3] 余东华. 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N/OL].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4-25[2025-08-19]. <https://www.cssn.cn>.
- [4] 张跃先. 打造“四梁八柱一底座” 推动形成智能建造现代化产业体系[J]. 中外建筑, 2025(1): 10007.
- [5] 国务院.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Z]. 2019.
- [6] 教育部.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新时代高教 40 条）[Z]. 2018-09.
- [7]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Z]. 2020.
- [8]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本科高校产业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Z]. 苏教高〔2020〕1号.
- [9]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深化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内涵建设的意见[Z]. 2023-01-15.
- [10]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推进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实施方案[Z]. 鲁教高字〔2020〕4号.
- [11] SPADY W G.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Answers[M]. Arlington, VA: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1994.
- [12] 李志义, 王泽武. 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设计[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21, 37(3): 91-98+113.
- [13] 许婷华. CDIO 模式在软件测试技术课程中的探究与实践[J].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15(1): 32-35.
- [14] 褚宏启. 教育治理现代化：理论、制度与实践[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1.
- [15] 唐智彬. 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质量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12): 87-92.
- [16] 刘春红, 郝可心, 陈李红. 动态视角下组织韧性的形成机理与作用效果[J]. 管理评论, 2023(9): 143-156.
- [17] 黄景德, 战欣. 广东省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建设与实践[J].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2024, 13(4): 464-472.
- [18] 刘旺, 陈湘君, 李洁. 基于“双模块双轮驱动”的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护理与老年健康服务专业群案例[R]. 岳阳：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3-12.
- [19] 刘树青, 贾茜, 宗亚妹. 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本科项目化课程改革探究——以机械制造类专业为例[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2020(4): 32-36.

- [20] 谢永华. 构建人才队伍建设“四种”模式 激发教师创新创造活力[J]. 中国高校师资研究, 2023(11): 12-16.
- [21] 常熟理工学院. 现代产业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路径的探索与实践[R]. 常熟: 常熟理工学院, 2023-05-25.
- [22] 张晞, 张根华, 钱斌, 等. 行业学院模式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常熟理工学院光伏科技学院为例[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1(1): 65-71.
- [23] 罗兵. 科技助推现代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以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应用学院为例[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21, 35(5): 1-5.
- [24] 赵倩男. 多重制度逻辑下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困境及响应策略——以常熟理工学院为例[J]. 人大教育学报, 2025(7): 36-47.
- [25]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指标体系(试行)[Z]. 2023-06-28.
- [26] 玉林师范学院. 工程教育认证与产教融合共同驱动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R]. 玉林: 玉林师范学院, 2022-08-31.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within the "Four Beams and Eight Pillars" Framework—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Applied Talent Training as the Central Focus

Zou Mingmin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as key play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fusion of academia and industry, encounter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their advancement.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structural imbalances, disconnect in mechanisms, and failures in coordination. By examining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known as the "four beams and eight pillars" and 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a prototypical institution like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sues pertaining to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perational rationale, and impediments to adaptation are delineated. Identified problems encompass superficial engagement of enterprises, delayed faculty transitions, and limited adaptability. Propos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volve assessing operational maturity, embedding enterprise tasks, stratifying adaptation processes, and implementing instrumental systems. It is deduced that the pivotal shift in evolving the "four beams and eight pillars" model from structural establishment to systemic development hinges on incentivizing systems. The profound amalgamation of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mpetency orientation furnishes both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exemplars for the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Keywords: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College; Four-Beam and Eight-Pillar Model;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Competency-Based Approach; Educational Reform Strategy;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青少年家庭沟通、焦虑情绪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文献综述

于文丽¹ 陈安妮^{2*} 葛蒲³

(1.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2. 深圳市福田区天健天骄幼儿园 深圳 518000, 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近十年家庭沟通、自我效能感与青少年焦虑情绪的关联研究。研究表明，建设性家庭沟通（如高对话定向、情感温暖）通过增强家庭凝聚力与弹性显著降低青少年焦虑风险；相反，消极沟通模式（冲突、指责）则会加剧焦虑症状。自我效能感作为核心心理资源，对焦虑缓解具有双重价值：既直接缓冲负性情绪，亦通过促进社会适应能力推动个体发展。核心发现揭示：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沟通与焦虑情绪间存在显著中介效应。具体机制表现为，建设性沟通通过提供替代经验、社会支持及掌控性体验三条路径提升自我效能感水平，进而强化情绪调节能力并降低焦虑水平。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家庭教养方式（权威型/专制型/忽视型）与文化社会经济背景共同构成该中介路径的边界条件。本研究整合多维度证据链，构建“沟通方式—心理机制—情境调节”的综合框架，强调跨文化差异对干预路径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需深入探索自我效能感中介机制的神经内分泌通路及基于文化适配性的分层干预策略设计。

关键词：青少年；焦虑；家庭沟通；自我效能感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61

一、前言

根据 2022 年 WHO 数据，青少年焦虑障碍发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家庭开放沟通与自我效能感提升可能是关键保护因素，但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变量间的两两线性关系，未能揭示三者的动态交互机制，尤其缺乏对自我效能感中介通路的系统检验^[1]。焦虑症以持续担忧、紧张和恐惧为特征，影响情绪、社交功能并引发躯体症状。家庭沟通模式显著塑造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然而当前研究往往孤立探讨两两关系，忽视了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沟通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它既是沟通的结果，也是对抗焦虑的心理资源。本文通过综述现有证据，旨在揭示家庭沟通、自我效能感与焦虑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尤其关注家庭沟通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缓解焦虑的中介路径，并分析文化、社会经济与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为家校协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二、国内外近期研究进展

（一）青少年焦虑情绪研究现状

青少年是焦虑的易发人群，他们处于身心迅速发展时期，面临确立自我同一性、发展自我意识等诸多任务，同时承受着较大学习压力，容易出现心理整合的混乱^[2]，表现出情绪问题。比如，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课题组（2013）发现，29.1%的青少年常有焦虑情绪，其中 43.5%面临人际焦虑，43.6% 存在考试焦虑；近期元分析

作者简介：于文丽(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陈安妮(1996—)，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儿童发展；

葛蒲（199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通信作者：陈安妮

研究整合 2010 至 2020 十年间数据发现,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12.3%、27%以及 26.3%^{[3][4][5]}。2021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GBD 2021) 进一步揭示了焦虑症对青少年健康的深远影响:其疾病负担占青少年精神障碍总伤残调整生命年 (DALYs) 的 40.3%,在 15-19 岁年龄组达到峰值^[6]。性别差异方面,女性青少年焦虑症年龄标准化患病率 (4380.9/10 万人) 显著高于男性 (2632.8/10 万人),可能与青春期激素变化、社会角色期待及情绪表达方式相关。地区分布上,城市地区青少年焦虑患病率是农村的 1.6 倍,反映出教育内卷化、家庭结构变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6]。GBD 2021 报告的中国青少年焦虑症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 2.6%,进一步证实了焦虑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高发性。

从影响维度看,焦虑对青少年的危害已得到广泛证实。焦虑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认知能力、学业成绩和社会适应等多个方面存在消极影响^{[7][8][9]},严重干扰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并且会增加未来学业失败、药物滥用、自杀行为和不良家庭关系的可能性^[10]。总之,焦虑在青少年群体中较为常见,并且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存在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青少年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为缓解青少年焦虑提供科学依据。

(二) 家庭沟通研究现状

家庭是儿童的主要社会化场所,其对儿童的行为的影响贯穿一生^{[11][12]}。家庭沟通是家庭成员间交换信息、思想与情感的动态互动过程,其运作质量直接表征家庭功能系统的平衡状态^{[11][13]}。

家庭沟通模式理论指出,家庭沟通本身具有系统性特征,并与多重家庭变量(如家庭凝聚力水平、教养方式类型、价值传承模式、信息加工策略等)存在结构性关联^{[14][15]}。该理论特别强调沟通的学习性质,认为家庭互动经验会显著影响子女的沟通行为与能力。具体而言,家庭沟通模式塑造着子女在与父母、朋友及亲密伴侣互动时所展现的行为模式^[16]。例如,成长于高对话定向家庭中的子女,通常表现出更高的沟通能力与灵活性。这种沟通能力的优势,加之较高的情感智力^[17],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运用自我披露、关系维护等技巧来建立和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18]。因此,探究家庭沟通模式对个体(尤其是子女)的行为适应与心理发展结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家庭沟通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在性别差异上结论不一,而跨文化视角则揭示了更复杂的图景。在性别的影响作用上,研究结果存在显著分歧。具体而言,Masslam 指出,青少年的性别对家庭沟通无影响^[19];Noller 与 Callan 认为,男孩与父母的沟通更能使父母满意^[20];Smollar 与 Youniss 则认为,女孩与母亲沟通效果更佳^[21];Youniss 和 Ketterlinus 的研究则表明,母女之间的沟通比父女更开放^[22]。此外,Finan 等人以青少年群体及父母为研究对象发现,母女、父子之间的沟通可以预测成年后抑郁症状的减轻^[23]。

跨文化研究表明,与西方相比,中国家庭沟通更注重功能性而非情感表达。父母较少使用语言或非语言情感支持^{[24][25]},导致青少年抑郁/焦虑风险更高^[26]。例如,Finan 等 (2018) 发现,高质量亲子沟通(如母女开放对话)可预测成年后抑郁症状减轻,而低质量沟通与青少年情绪问题呈正相关^{[27][28]}。

综上所述,家庭沟通的影响因素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性别差异研究的结论分歧揭示了亲子互动的复杂性,而东西方文化中“情感表达与功能导向”沟通模式的差异,则进一步突显了社会文化背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些发现为深入研究家庭沟通与自我效能感、焦虑情绪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

(三) 自我效能感研究现状

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由社会认知理论创始人班杜拉提出并系统阐述,其核心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能否组织和执行一系列必要行动以达到特定目标的能力所持有的信念。这种效能信念关注的是对自身完成特定任务所需能力的评估,而非对行为结果的预期。现有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几个核心方向:其影响因素、形成机制(或前因)、产生影响(或后果)的效应机制,以及测量工具(量表)的研制。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已在社会适应、专业发展、创业过程及学习表现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Bandura^[29]的研究表明,个体自我效能感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过往行为成败经验(直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以及情绪和生理状态。其中,个体过往行为的成功经验会增强其对未来处理同类或相似任务的信心,从而显著提升自我效能感;类似地,观察能力水平相近者成功完成任务,也能增强个体对该任务的自信心,提高其自我效能感;至于言语劝说,虽然他人的鼓励或说服可以影响自我效能感,但其效果存在不确定性,易受劝说者专业水平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制约;最后,个体积极的情绪状态通常对自我效能感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强烈的负面情绪或不良生理状态则可能削弱该信念^[29]^[30]。

中国青少年自我效能感水平呈现显著群体差异与多维影响特征。在整体水平与群体差异方面,学业领域自我效能感偏低是突出问题:王丽杰 (2023)^[31]对 4286 名初中生的研究发现,其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常模 ($t=-4.72, p<0.001$),且与学业压力呈负相关 ($\beta=-0.31$)。城乡与性别差异亦值得关注:李强与张敏 (2022)^[32]通过

跨区域调查 5210 名青少年发现,城市青少年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 ($M=2.81$) 显著高于农村 ($M=2.49, p<0.01$),男生在运动效能上优于女生 ($d=0.42$),同时,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因经济限制导致成功经验积累不足,自我效能感普遍较低^[33]。

三、家庭沟通、青少年焦虑情绪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现状

(一) 家庭沟通与青少年焦虑情绪的关系研究

作为生态系统,家庭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既能作为保护性缓冲抵御不良心理问题的影响,又能降低此类问题发生的风险。León-Del-Barco^[34]强调了家庭环境在青少年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家庭内部的沟通方式和行为模式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深远影响^[35]。此外,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成员间的问题往往可追溯到家庭单位内部沟通不畅。消极的家庭沟通,如家庭冲突和沟通频率降低,会侵蚀家庭关系,引起不健康的家庭行为,导致青少年焦虑和抑郁^[36]。相反,积极的家庭沟通可以增强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联系,促进家庭凝聚力和弹性,是青少年焦虑的重要保护因素^[37]。多项国内相关研究^[38]^[39]均支持良好的家庭沟通能有效缓解青少年焦虑。周莉 (2024)^[40]和 张予思 (2025)^[41]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不同家庭教养方式的作用: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对焦虑呈负向预测作用,而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则与之呈正向关联。

因此,旨在缓解青少年焦虑与抑郁的家庭干预方案,应将优化家庭沟通氛围置于核心地位。父母需着力实践积极倾听与支持性沟通策略,同时显著减少批评指责行为。营造此种建设性的沟通环境,可有效降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风险水平,并增强其应对压力与情感挑战的韧性与适应性。

(二) 家庭沟通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家庭沟通质量与个体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Stubbs 等的研究证实,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更高的青少年,其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亦显著提升^[42]^[43]^[44]。进一步的多项研究^[45]^[46]一致显示,积极亲子沟通、权威型教养方式(以高情感回应和理性要求为特征)以及富含沟通互动的家庭社会资本,均能正向预测青少年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其作用机制涵盖提供情感支持、增强信任及促进有效行为示范。反观之,消极的亲子互动环境则显著削弱自我效能感的形成^[47]。

上述实证发现契合 Bandura (1997) 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框架。该理论强调,个体效能信念的形成植根于成败经验(直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及情绪/生理状态四大核心来源,且其强度受经验来源可靠性的深刻调节。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核心场域^[48]^[49],其特有的沟通模式、互动结构及决策过程,为成员(尤其青少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替代学习榜样(观察父母及家庭成员的应对方式)和持续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情感确认、信息指导和资源获取)。这些结构化要素直接构成塑造个体效能信念的高频次、高情境相关性的经验来源。

因此,基于坚实的理论与实证基础可断言:家庭沟通系统是塑造个体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关键情境变量。良好沟通通过提供高频次、高可靠性的替代经验与系统性社会支持,为效能感发展创造“经验强化回路”;反之,沟通功能障碍则通过阻断有效经验供给,成为效能感形成的显著风险因子。优化家庭沟通策略应成为提升青少年心理韧性与自我发展能力的核心干预路径。

(三) 青少年焦虑情绪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应对发展性挑战的核心心理资源,对青少年焦虑具有显著的缓冲-抑制效应。实证研究一致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通过双重路径影响焦虑水平:一方面通过负向预测焦虑强度^[50]^[51],另一方面通过促进适应性应对策略的生成与实施^[52]以实现焦虑缓解。这种作用机制根植于 Bandura 的效能理论框架:自我效能感本质是个体对自身能力掌控信念(应对生活事件)与情绪调节效能(处理事件伴随情绪)的整合性评估^[53]。低自我效能感个体易陷入认知-情绪负向循环——因预判努力无效而强化无助感,继而回避挑战并加剧焦虑^[54];反之,高自我效能感者更倾向调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通过增强应对灵活性打破焦虑循环。

在特定病理维度上,自我效能感低下与社交焦虑障碍呈现强关联性。其内在病理机制体现为:自我效能感缺失导致个体选择性依赖非适应性应对机制(如回避行为、安全行为),此类策略虽可暂时降低不适感,却因阻碍暴露与经验积累而强化社交情境中的威胁感知偏差,最终形成“低效能→回避策略→焦虑固化”的自强化闭环。值得注意的是,该闭环在社交焦虑中具有显著特异性:非但未能消解焦虑,反而通过剥夺个体实践社交技能的机会,系统性削弱其社交效能信念^[55]。故而,提升自我效能感构成干预焦虑的关键路径——通过重构个体的能力评估模式、优化应对策略库、阻断负向循环,最终实现焦虑症状缓解与社会功能改善。

四、争议与局限

尽管现有研究已初步揭示家庭沟通、焦虑情绪与自我效能感的关联，但仍存在以下争议与局限：

（一）样本选择的偏差与代表性不足

多数研究样本集中于特定群体（如医院就诊青少年或城市学生），缺乏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的覆盖。例如，周莉等^[56]的研究样本仅来自医院抑郁症患者，可能高估焦虑与家庭沟通障碍的关联性。刘启刚等^[54]虽纳入 1073 名青少年，但未细化城乡差异，导致结果外推性受限。此外，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中国家庭的“权威型沟通”可能与西方定义存在文化差异，需更多本土化样本验证。

（二）测量工具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现有研究多采用西方编制的家庭沟通量表（如 FACES IV）或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其维度（如“开放性对话”）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家庭的沟通特点，如“情感含蓄表达”“权威服从”等^{[57][58]}。曾小英等^[59]指出，亲子沟通量表在评估中国家庭时，对“非语言情感支持”的测量效度不足。此外，焦虑诊断标准的差异（如 DSM-5 与 CCMD-3）可能导致不同研究间患病率数据波动。

（三）因果关系推断的局限性

现有研究以横断设计为主，难以明确变量间的时序关系。例如，虽有研究提出“家庭沟通→自我效能感→焦虑”的路径，但缺乏纵向追踪数据验证动态因果链^{[60][61][62]}。张予思和汪颖霞^[41]指出，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可能随青春期激素变化而自然提升，需排除年龄混淆效应。此外，部分研究忽视双向因果关系，如低自我效能感可能反向抑制家庭沟通意愿，这种交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四）文化特异性机制的研究空白

家庭沟通的文化调节效应在自我效能感形成中呈现显著东西方分野。西方研究强调言语互动维度（如自我表露、平等对话）的核心作用，而中国家庭则更依赖非言语支持系统——通过物质关怀、代际责任履行等具象化行为传递情感支持。这种文化差异折射出自我效能感培育的双路径模型：西方侧重语言交互中的能力确认，东方则倚重责任共担中的实践效能积累。

在焦虑的性别差异解释上，文化期待差异导致显著的理论张力。WHO（2022）报告指出西方女性更高焦虑患病率与情绪表达社会化（鼓励女性情感外露）密切相关；然而中国研究发现，城乡社会经济梯度对焦虑水平的影响显著超越性别差异。这种解释冲突揭示出文化变量的深层调节作用：西方性别角色期待通过强化情绪表达差异加剧焦虑性别化，而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压力（如户籍制度衍生的资源分配差异）可能覆盖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此矛盾亟待通过文化敏感的理论框架重构与跨文化比较研究予以解析。

（五）干预研究的时效性与生态效度

现有干预多聚焦短期家庭沟通训练，缺乏对“双减”政策、数字化沟通（如微信亲子互动）等新兴场景的适应性调整。例如，陈嘉晟发现，线上家校互动对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效果有限，需结合线下情感支持。

五、小结与展望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核心三角模型——家庭沟通系统、自我效能感与焦虑情绪——构成动态发展的神经社会框架，通过双向反馈回路共同塑造心理适应轨迹。家庭沟通经由情感传递调控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后者又影响焦虑情绪的管理，而焦虑则反向调节家庭互动模式，形成闭环系统。家庭沟通通过双路径产生影响：建设性沟通增强情绪韧性并缓冲应激反应，破坏性沟通则抑制效能感并触发生理应激。教养方式作为文化调节枢纽，其要求性与回应性维度影响沟通效率，尤其在东方文化中，非言语支持具有独特作用。自我效能感在模型中起生物心理转化作用：高效能感促进积极应对与神经可塑性，低效能感导致回避行为与默认网络过度激活，且其发展具有文化情境敏感性。基于模型动态特性，应构建三级干预生态：家庭层面通过沟通训练优化环境；个体层面借助经验设计与归因重构提升效能信念；系统层面开发家校协同的模块化课程与生态化技术嵌入。未来研究需采用动态建模捕捉日水平波动，分析基因—环境交互的敏感期，并建立文化适配模型，探索异质性调节机制，验证整合干预方案的实际效能。

[1]Gecer E, Yıldırım M, Akgül Ö, et al.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mong Vaccinated Turkish People[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pen, 2023.

- [2]林崇德.(2018).发展心理学,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3]黄潇潇,张亚利,俞国良.2010~2020 中国内地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22,30(05): 953-964.
- [4]于晓琪,张亚利,俞国良.2010~2020 中国内地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22,30(05): 978-990.
- [5]张亚利,靳娟娟,俞国良.2010~2020 中国内地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22,30(05): 965-977.
- [6]Zheng, Y., Li, X., Wang, Y., ..., & Liu, Y. (2025).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Data from GBD 2021.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 45, 100987.
- [7]de Lijster J M, Dieleman G C, Utens E M W J, et al. Social and academic functioning in adolesc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s: A systematic review[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8, 230: 108-117.
- [8]Roest A M, Martens E J, De Jonge P, et al. Anxiety and risk of inciden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2010, 56(1): 38-46.
- [9]石耀慧,麻超.特质焦虑对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21,(10): 77-84.
- [10]Woodward L J, Fergusson D M. Life course outcomes of young people with anxiety disorders in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01, 40(9): 1086-1093.
- [11]Olson D. FACES IV and the circumplex model: Validation study[J].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011, 37(1): 64-80.
- [12]Koerner, A. F., Schrod, P., & Fitzpatrick, M. A. (2018).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 theory: A grand theory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In D. O. Braithwaite, E. A. Suter, & K. Floyd's (Eds.), *Engaging theories in family communica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2nd ed., pp.142-153). Routledge.
- [13]Olson D. FACES IV and the circumplex model: Validation study[J].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011, 37(1): 64-80.
- [14]Koerner, A.F., & Fitzpatrick, M. A. (2016).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theory: A social cognitive approach. In D. O. Braithwaite, E. A. Suter, & K. Floyd (Eds.), *Engaging theories in family communica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2nd ed., pp. 50-65). NewRoutledge.
- [15]Schrod, P., Witt, P.L., & Messersmith, A.S.(2018). A meta-analytical review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ehavioral and psychosocial outcomes.*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5(3),248-269.
- [16]Ledbetter, A. M. (2009).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relational maintenance behavior. Direct and mediated associations with friendship closenes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1),10-147.
- [17]Keaten, J.,& Kelly, L. (2018).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s a mediator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reticence.*Communication Reports*, 21(2),104-116.
- [18]Ledbetter, A. M. (2009).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relational maintenance behavior. Direct and mediated associations with friendship closenes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1),10-147.
- [19]Masslam V J.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the nature of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90,19 (4):349~362.
- [20]Noller P, Callan V J.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the nature of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90, 19(4): 349-362.
- [21]Smollar J, Youniss J.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 in adolescents whose parents are divorced[J].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985, 5(1): 129-144.
- [22]Youniss J, Ketterlinus R D.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edness in mother-and father-adolescent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87, 16(3): 265-280.
- [23]Finan L J, Ohannessian C M C, Gordon M S.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adolescence to emerging adulthoo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peers, and sibling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8, 54(8): 1555.
- [24]Li J B, Delvecchio E, Lis A, et al. Parental attachment, self-control,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and Italian adolescents: Test of a mediation model[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5, 43: 159-170.
- [25]Zhang Q, Wills M. A US-Chinese comparison of affectionate communication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016, 33(4): 317-323.
- [26]Wu C, Chao R K.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dissonance i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and

- d European American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1, 47(2): 493.
- [27]Finan L. J., Ohannessian C. M., Gordon M. S. (2018).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adolescence to emerging adulthoo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peers, and sibling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 (8), 1555-1567.
- [28]Ioffe M, Pittman L D, Kochanova K, et al. (2020).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on anxiou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9 (8), 1716-1730.
- [29]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 (2): 191.
- [30]吴小青.高三学生情绪智力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和干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3.
- [31]王丽杰. 初中生学业压力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 39(2), 256-263.
- [32]李强, 张敏.中国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城乡差异与性别特征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30(4), 891-895.
- [33]黄凯斌.低收入家庭青少年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小组介入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22.
- [34]León-Del-Barco B, Fajardo-Bullón F, Mendo-Lázaro S, Rasskin-Gutman I,Iglesias-GallegoD. Impact ofthe familiar environment in 11-14-year-old minors'mental health.*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8;15(7):1314.
- [35]Morelli NM, Hong K, Elzie X, Garcia J, Evans MC, Duong J, Villodas MT.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conflict and child behaviorproblems in families at risk for maltreatment. *Child Abuse & Neglect*.2022;133:105832.
- [36]Ioffe M, Pittman L D, Kochanova K, et al.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on anxiou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arly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20, 49(8): 1716-1730.
- [37]Gecer E, Yldrm M.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the era of COVID-19 pandemic: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J Fam Issues*.2023;44(1):203-19.
- [38]潘峰,孔祥静.居家学习对大学生焦虑的影响:家庭沟通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J].温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4(01):54-62.
- [39]曾小英,史秀玉,林国业.高职大学生焦虑与抑郁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亲子沟通及家庭环境的预测作用[J].心理月刊,2024,19(11):95-97.
- [40]周莉,李小红,李红芳,等.归因训练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J].心理月刊,2024,19(07):135-137.
- [41]张予思,汪颖霞.网络游戏行为对于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J/OL].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19[2025-07-20].
- [42]Stubbs N S, Maynard D M B. Academic self-efficacy, school engagement and family functioning, among postsecondary students in the Caribbean[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7, 26: 792-799.
- [43]Murphy E L, McKenzie V L. The impact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chool connectedness on preadolescent sense of mastery[J]. *Journal of Psychologists and Counsellors in Schools*, 2016, 26(1): 35-51.
- [44]Cherewick M, Hipp E, Njau P, et al. Growth mindset, persistence, and self-efficacy in early adolescents: Associations with depression, anxiety, and externalising behaviours[J]. *Global Public Health*, 2023, 18(1): 221330.
- [45]Hemati Z, Abbasi S, Oujian P,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elf-efficacy in adolescents with parental substance abuse[J]. *Iranian journal of child neurology*, 2020, 14(1): 49.
- [46]Liu Y, Ngai S S. Social capital, self-efficacy, and healthy identity development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s[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20, 29(11): 3198-3210.
- [47]Eisenberg N, Zhou Q, Spinrad T L, et al. Relations among positive parenting,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J]. *Child development*, 2005, 76(5): 1055-1071.
- [48]范中杰.家庭教育方法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J].湖北社会科学,2008,(01):73-75+80.
- [49]漆仲明.现代家庭教养对青少年社会化的作用[J].教育探索,2015,(06):103-109.
- [50]赵兴蓉,许秀峰,李娜.医学生焦虑、心理控制源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月刊,2023,18(08):26-28+31.
- [51]李守龙,李晓芹.艺术类高中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焦虑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7(05):617-618.
- [52]姜萌,郭斌,边文静.批判性思维与医学生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月刊,2022,17(12):41-43.
- [53]Bandura A , Freeman W H , Lightsey R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J].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1997.
- [54]刘启刚,周立秋,梅松丽.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情绪调节的影响机制[J].中国特殊教育,2011,(12):82-86.

- [55]Bandura, A. (1988). Self-Efficacy Conception of Anxiety. *Anxiety Research*, 1, 77-98.
- [56]周莉,李小红,李红芳,等.归因训练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J].心理月刊,2024,19(07):135-137.
- [57]Olson D. FACES IV and the circumplex model: Validation study[J].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011, 37(1): 64-80.
- [58]Schwarzer R. Optimistic self-beliefs: Assessment of general 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thirteen cultures[J]. *World Psychology*, 1997, 3(1): 177-190.
- [59]曾小英,史秀玉,林国业.高职大学生焦虑与抑郁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亲子沟通及家庭环境的预测作用[J].心理月刊,2024,19(11):95-97.
- [60]Bekker H L, Legare F, Stacey D, et al. Is anxiety a suitable measure of decision aid effectiveness: a systematic review?[J].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03, 50(3): 255-262.
- [61]Bekker H L, Legare F, Stacey D, et al. Is anxiety a suitable measure of decision aid effectiveness: a systematic review?[J].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03, 50(3): 255-262.
- [62]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ommunication, Anxiety and Self-Efficacy of Adolescents: A Review

Yu Wenli¹ Chen Anni^{2*} Ge Pu³

¹Jilin Sport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2

²Tianjian Tianjiao Kindergarten,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518000, China

³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mily communication, self-efficacy and adolescent anxiety in the past decade. Research shows that constructive family communication (such as high dialogue orientation and emotional warmth)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risk of anxiety among adolescents by enhancing family cohesion and resilience. In contrast, negative communication patterns (conflicts, accusations) will exacerbate anxiety symptoms. Self-efficacy, as a core psychological resource, has a dual value in anxiety relief: it not only directly buffers negative emotions but also promote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y enhancing social adaptability. The core findings reveal that self-efficacy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anxiety. The specific mechanism is as follows: 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 enhances self-efficacy through three pathways—alternative experiences, social support, and mastery experiences. This, in turn, strengthens adolescents'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nd reduces their anxiety levels.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family parenting style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neglectant) and the cult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jointly constitut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is mediating path. This study integrates multi-dimensional evidence chains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communication style -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 situational regulation", emphasizing the regulatory role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on intervention pathways.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deeply explore the neuroendocrine pathways underlying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of self-efficacy and the design of differentia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cultural adaptability.

Keywords: Adolescent Anxiety; Family communication; Self-efficacy

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三重逻辑

梁涛¹

(阿坝师范学院, 四川 汶川 623002)

摘要: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 虽然存在育人理念与目标一致、文化同源内容互补以及情感共鸣等内在逻辑。然而, 融入的过程面临着教育理念偏差、课程设计与资源整合不足、教学形式与方法单一, 以及新媒介与多元文化的冲击等问题。因此, 需要通过更新教育理念以彰显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优化课程设计以构建完善的教学体系、革新教学方法以深化思想政治学习体验, 以及重塑教育语境以筑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等措施予以解决, 从而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关键词: 红色文化;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 立德树人; 课程建设

基金项目: 南充市社科规划项目南充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专项课题“算法推荐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样态重构研究”(NCQSN25B122); 甘孜州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甘孜红色文化研究中心2025年度项目“甘孜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学习样态构建研究”(GZHSWH2025ZC07); 绵阳社科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专项课题“博物馆教育与研学旅行融合发展的路径与策略研究-基于中国羌族博物馆”(WLFZ2024YB03); 绵阳社科四川基础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专项课题“乡土视域下绵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体系构建研究”(MSJJ24-C11)。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64

2024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 “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 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1]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小学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 发挥着铸魂育人的关键作用。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所创造的先进文化, 蕴含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厚的育人价值, 将红色文化融入学科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精神和意义被学生所体悟和践行。但在融入过程中, 不少教师还存在理论认知的短板与低质融入的实践困境。因此, 深入剖析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内在逻辑关联、实际面临的问题并探讨有效地融入策略, 对全方位、多层次地释放其独特的育人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内在逻辑: 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契合原理

(一) 育人理念与目标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3]在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引领下,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不仅承载着塑造小学生道德品质与法治素养的关键使命, 还致力于引导学生构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为他们奠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红色文化, 作为党引领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丰富的育人元素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助力学生树立“四个自信”, 特别是文化自信方面高度契合。通过融入红色文化中的爱国情怀、革命精神和传统文化元素, 不仅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感, 增强了对民族精神与革命历史文化的认同, 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 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文化同源, 内容互补

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4]红色文化同小学道德与法

治课程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一致,还在文化上同源、内容上互补,二者均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土壤之中,都强调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弘扬、对民族精神的坚守与践行。例如,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的行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时期的继承与创新,如今,它以中国革命道德的内涵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转化为对学生品德培养的核心要求。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红色文化是近现代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创新,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则梳理传授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价值理念,二者在文化内涵上同根同源。在内容层面,红色文化同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展现出显著的互补性,红色文化是中小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6]红色文化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实例与深刻的内涵,同时,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也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搭建了系统的教育平台。通过对红色文化内容进行整理、筛选与融入,实现了对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弘扬,丰富了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内容体系。

(三) 情感共鸣

情感共鸣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6]将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是建立在情感共鸣基础之上的。从历史渊源而言,红色文化承载着近现代民族的奋斗历程,与中华儿女命运紧密相连。例如,抗战时期中华儿女英勇御敌的事迹所蕴含的爱国情感与民族大义,契合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倡导的对国家民族热爱忠诚的培养目标。从价值观传递的层面来看,例如“半条被子”的故事彰显了对人民关怀、无私奉献的精神,与课程关爱他人、乐于助人、秉持公平正义等价值导向相契合,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小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并有助于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自我进行道德观念塑造。从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方面看,长征时期的战友、同志等情谊,包含关爱、互助等跨时代年龄的情感元素,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培养学生品德情感素养相关,小学生能从故事情感关系中找到与自身生活情感体验的连接点,如战友情似同学情、老班长关爱像师长父母的照顾,这种情感共鸣有助于推动自身情感成熟,为核心素养的培养筑牢情感根基。

二、问题逻辑: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现实困境

虽然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存在着有利的内在逻辑,但在实际的融入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融入困境,这些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文化融入的深度与广度。

(一) 教育理念的偏差

在教育实践中,部分教育者未能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的全面育人价值,忽视其对学生道德修养、健全人格和责任意识等核心素养培养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例如,在教学时只是机械地讲解红色故事与历史事件,未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道德修养、健全人格和责任意识等元素的积极作用,导致教育教学流于表面。同时,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部分教育者习惯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进行知识灌输与应试技巧训练,忽视了学生自主探究与创新思维的培养,这不仅与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相悖,也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产生情感共鸣。此外,部分教育者还局限于“教材本位”与“显性课程”的范式,忽视了对当地红色遗迹、革命先辈鲜活故事、红色文艺作品及校园红色文化建设等丰富、生动课程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教育理念的滞后进一步加剧了教育实践与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脱节。

(二) 课程设计与资源整合不足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在红色文化融入方面存在课程设计与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其一,在课程设计与资源整合时,未能充分依据二者融入的内在逻辑与价值链条构建完整教学体系,还存在课程目标设计缺乏层次性与连贯性、内容编排缺乏系统性与逻辑性、教学环节设计缺乏创新性与吸引力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在设计红军长征相关的课程内容时,只是按照教学资料孤立地呈现长征途中的几个重要时空节点,既没有深入挖掘这些节点之间的关联,以及长征背后所蕴含的战略转移、坚定信念等深层次内涵,也未能呈现相对完整且有梯度的认知情境,容易使学生仅获取零散的知识碎片,无法构建整体性的知识框架。其二,教学资源匮乏与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问题同样突出。现有教学资源形式单一且缺乏灵活性,难以满足学生学习的多元化需求。加之,学校与教师对周边革命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丰富资源以及网络红色文化数字资源的开发整合能力薄弱,课程资源整合与利用的不足进一步制约了红色文化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深入融入和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

(三) 教学形式与方法单一

在将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实践中,教学形式与方法的单一也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在教学形式方面,项目式学习、合作学习等方式应用不足。同时,缺乏高质量的多媒体教学资源、虚拟技术以及线上互动学习平台对教学的支持。在教学方法上,过度依赖传统的灌输式讲授与单纯的文本阅读,在教师主导课堂的影响下,学生多被动接受知识,缺乏自主思考、交流互动以及深度探究的积极性。例如,体验式教学、情境教学等教学法少用、浅用的现象明显,学生缺少实地参观红色遗址、参与红色主题角色扮演或情景模拟等能

让他们深度沉浸其中的学习方法和实践活动的引导,而传统的讲授与讨论法难以点燃学生学习热情,也难以有效地引导学生深刻领悟红色文化的魅力与价值。此外,学科协同的联动育人机制还不健全,内容杂糅、拼盘式的学习现象还较为明显,学生失去了从跨学科学习的角度全面探究红色文化丰富内涵的机会,影响了学生对红色文化全方位的认知与实践。

(四) 新媒介与多元文化的冲击

当前,信息化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猛发展,新媒介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网络游戏等丰富形式,以便捷性、娱乐性和强大交互性快速、深度融入学生课余生活,流行文化、娱乐文化、网红文化等以新奇且契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的方式吸引着学生。新媒介与多元文化的冲击给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带来诸多困境。新媒介传播信息的碎片化与红色文化的系统价值观和深厚历史底蕴要求形成反差,习惯碎片化娱乐信息的学生难以集中注意力深入领会红色文化内涵。例如,由于缺乏情境和实践的参与,学生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便存在困难。而且多元文化经商业营销炒作极具吸引力,例如,一些商业动画或影视作品以夸张情节吸引眼球,抢夺关注,致使学生对红色文化与道德教育的关注度与学习热情下降。此外,新媒介社交互动模式也对其产生影响,网络社交中的娱乐话题盛行,严肃的红色文化与道德教育话题就容易被边缘化,这不仅难以形成良好的传播与学习氛围,也极大地削弱了红色文化的教育影响力。

三、实践逻辑: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有效策略

(一) 更新教育理念,彰显红色文化育人价值

教育理念的重塑是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关键所在,而“立德树人”则是这一过程的核心要义。教师作为“立德树人”等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执行者,在教学目标上需从单纯知识传授转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以避免目标浅层化。在教学内容方面,教师需突破教材本位的局限,树立大课程观,积极融入地方与时代资源,以贴近学生生活并丰富其学习体验。同时,树立校园文化、师生关系等隐性课程建设的课程内容观,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确保教学内容的拓展与深化始终符合立德树人及教学目标要求,避免内容融入碎片化。在教学方法选择的理念上,教师应摒弃单向灌输模式,积极采用互动式、体验式、项目式教学等方法,以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在教学评价理念上,通过多元评价的激励、导向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此外,学校管理层面需要形成课程整合与管理的内在逻辑与价值观,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整体规划与实践,一方面,通过针对性培训和高效管理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素养;另一方面,要强化校园文化与制度建设,积极为校内外的合作育人机制的构建与效能发挥提供便利。

(二) 优化课程设计,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首先,需明确教学目标,依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将红色文化融入的具体目标细化为不同年级段的具体要求,确保教学目标的针对性、层次性与连贯性;同时,深化内容编排,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中的关键节点和深层次内涵,构建连贯、系统、有逻辑的知识体系;在教学环节设计时,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角色扮演、情境模拟、小组讨论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提升教学的吸引力与实效性;在课程评价方面要进行科学评价标准和方式方法的设计,以便于对红色文化融入的教学效果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估,同时,也便于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课程设计。其次,加强教师资源整合与开发利用能力,丰富教学资源形式,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提升教师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识别、筛选、整合和开发能力,并充分利用周边的革命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丰富资源以及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建立长期、稳定、高效的资源共享与交流平台,合力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三) 革新教学方法,深化思想政治学习体验

首先,应充分考虑学生年龄与学习风格的差异,通过推广项目式学习、加强合作学习、创新主题班会、举办红色文化节、推动家校共育等丰富教学形式的方式,同时引入高质量的多媒体教学资源与线上互动学习平台,利用虚拟现实(VR)等科学技术手段,以及推广体验式教学和情境教学,组织学生实地参观红色遗址、开展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等活动,多维度地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与互动性,为学生提供直观、生动且深入的学习体验,让学生在多样化的实践活动中学习和体验红色文化。其次,在革新教学方法方面,还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内容和学生特点,建立学科协同机制,加强跨学科资源整合与协同教学,鼓励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设计、开发、实施跨学科教学活动,进而形成跨学科的“研-教-学-评”教学体系,让师生从多个角度全面探究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例如,语文与美术结合,让学生通过绘画来描绘红色故事场景并配以文字描述,数学可以计算红色革命时期的物资调配数据等方法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效果。跨学科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效果,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从多个角度全面揭示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使学生在探究和学习的过程中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和认同。

(四) 重塑教育语境, 筑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在新时代背景下, 为有效将红色文化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 筑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教师应积极引导, 学生正视新媒体与多元文化带来的挑战, 避免商业文化炒作的干扰。通过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的魅力与时代价值, 依据历史脉络串联红色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 精心设计、整合课程内容, 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资源为其注入新活力, 进而构建符合小学生认知规律的课程与教学体系。以部编版四年级上册《网络新世界》为例, 教师可在教学中巧妙融入红色文化, 引导学生探寻革命先辈如何利用有限的通讯技术传递情报、开展革命宣传等感人故事, 并鼓励学生在班级专属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感悟。此外, 教师还可以组织“红色文化与网络安全知识大比拼”的线上知识竞赛, 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巩固所学知识, 同时增强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活动, 不仅能在学生心中筑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还能将社交平台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播的新舞台, 从而进一步重塑契合新时代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语境, 切实提升红色文化在课程中的影响力与渗透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中国教育报, 2024-09-11(1).
- [2] 教育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8.
- [3] 习近平.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EB/OL].(2023-03-17)[2024-09-18].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303/t20230317_1051349.html.
- [4] 张西平.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价值[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07-28)[2024-10-07].<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728/c143843-29435543.html>.
- [5] 教育部.关于印发《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的通知[EB/OL].(2021-01-19)[2024-09-20].<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102/t10110203-512359.html>.
- [6] 苟爽.情感共鸣:文化场景建构的内生动力[J].中华文化论坛,2018(04).

The Triple Logic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Primary School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urriculum

Liang T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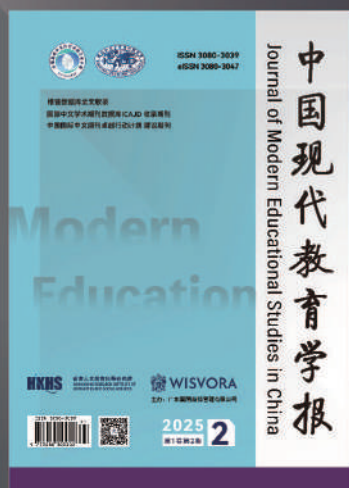
Aba Teachers College, Wenchuan, 623002

Abstract: The primary school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cours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 Although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the primary school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course has internal logic such as consistent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goals, complementary content from the same cultural origin,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faces problems such as deviations in educational concepts, insufficient course desig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monotonous teaching forms and method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and diverse cultures. Therefore, measures such as updating educational concepts to highlight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red culture, optimizing course design to build a complete teaching system,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to deepen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reshaping the educational context to consolid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sition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reby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

Keywords: Red Culture; Morality and Law Curriculum in Primary Schools;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是一份聚焦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学术期刊。期刊以推动教育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实践创新为核心使命，重点关注课程改革、教育政策、教学理论、教师发展教育技术等重大议题，致力于在新时代教育变革背景下，探索更加科学、高效、人本的教育路径。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